

中日关系:2017——战略对峙中的转机

胡令远 等

弁 言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在相继推出《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多层面和中长期战略的视角》(2014年)、《中日关系:2015》、《中日关系:2016——低位徘徊与嬗变》三本报告书之后,《中日关系 2017——战略对峙中的转机》今天又面世了。

2014、2015 两年的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课题组成员清一色为复旦大学学者,主要是出于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林尚立教授立志于打造国际关系研究之“复旦学派”的宏愿。但在实践中我们逐步体会到在军事、商贸方面存在着先天的短板,所以去年特别邀请了中国军事科学院江新凤研究员、商务部宋志勇研究员加盟课题组,得以使对日本安全保障方面的军事态势、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变化,可以考察和认识得更加真切和清晰;另外,要深入了解日本社会的变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也需要近距离感知与分析,复旦大学校友、旅日资深学者汪鸿祥教授加入课题组,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今年新加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团队的王广涛青年副研究员,为课题组注入了新鲜血液。

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和热情参与这一工作,做出了独特贡献。庆应大学田岛英一教授、早稻田大学青山瑠妙教授皆在中日关系研究领域卓有建树,2016、2017 年的报告书,由于他们的参与而增色良多。

这四年的中日关系报告书中,都包含有一个重要观点:即直面日益崛起的近邻中国,虽然日本在经贸领域总体上视之为使自身走出经济低迷期的战略机遇,但在安全保障、特别是作为海洋国家的海上通道安全方面,却产生了严重的战略性疑虑和担忧;而中国宣示和践行的和平发展理念,对日本来说,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印证。从近年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实态来看,这一战略疑虑,正逐步衍化成在战略上与中国相拮抗的国策,并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如何化解日本的战略疑虑、防止其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目标。就需要中日两国共同探求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新的战略平衡点,两国根本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持续深入的交流和共同探索过程中,不断积累共识,冀以趋利避害,平稳度过战略失衡期,谋求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关系的长足发展。

基于此,2016 年的报告书提出以机制化的智库交流为探索和积累这种共识的主要平台之一,并具体阐述了其成立的理由。我们殷切希望和期待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参与撰写这一《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能成为一种因缘,在此基础上,构建与打造上述平台。

2017 年的中日关系,出乎人们的意料,战略对峙中出现了转机。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次的回暖与转圜,是不可逆的根本性质,还是一时的战略需求所致?人们依然疑虑重重。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三月份举行的中国“两会”期间,一方面表示将于5月访问日本,同时也以中日关系“乍暖还寒”表达了他的担心。本报告书对前述人们的疑虑做出了分析与解读。在总结和评估2017年中日关系的基础上,对2018年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的面世是必要和适时的。

2017年度的报告书依然采取了请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所撰写的内容做评论的方式。两国学者“不谋而合”“所见略同”的共识,与2016年度一样,可以说所在多有;同时,不少地方意见相左也是自然的,甚至一些歧见比较大而尖锐。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从认识论上,基于民族立场的单向性思维很难全面客观把握认识对象,作为学者需要换位思考,才能深刻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第二,中日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如何把握其中的主要因素至关重要,所谓纲举目张。第三,日本是一个多元社会,不能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中国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从理念到实践,需要对中国有全新的认识。

“兼听则明”——善于倾听对方的意见,本就是中国的古训。正是在仁智之见的碰撞和辨析中,中日关系的症结才能真正明晰,良方才能从中获取——这从两国学者对中日关系如何建设性发展的具体建言献策中,可以得到印证。

复旦大学年度中日关系报告书,由林尚立副校长的初心初志,在尝试中不断前行,积累经验,不断成熟。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吴心伯院长一直致力于推动和指导本课题组的工作,期待在学校和研究院领导、各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使这一工作能够日臻成熟,达成预期目标,为中日关系的真正转圜和长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我们准备明年出版一本5年的报告书合集,其间既可展现中日两国学者对中日关系发展之认识的轨迹,也可窥探之所以形成此种认识的底奥所在。

总论:2017年的中日关系:特点与趋势

一、2017年中日关系总体态势:从全面对峙到一线转机

从2010年“撞船事件”再到“购岛闹剧”,中日关系急剧恶化。2012年安倍梅开二度重登首相宝座后,基于其保守的政治理念、偏狭的对华认知观,加之接受首次执政失败教训从而表现出更加老练的政治手腕,在重新执政的5年间,实施“俯瞰地球仪外交”,即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挑战中国;在安保领域,解禁集体自卫权,其潜台词是“中国威胁论”;在经贸领域,殚精竭虑力推TPP,从游戏规则制定及其效能两方面图谋排斥、削弱中国;在海洋等热点问题上,插手包括菲律宾仲裁案等在内的南海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与蔡英文政权各种形式的频繁互动,挑战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底线。

以上种种,使原来主要由东海领土主权争议这一特定领域两国关系紧张的局面,上升到在国家战略层面中日形成全面对峙、战略抗衡的态势。由局部问题的性质,演变成全面对抗,并且呈深刻化、长期化趋势——中日关系的这一嬗变,是安倍首相执政5年来的客观事实。

正所谓世无常态、物极必反。2017年,安倍政权遭遇内外困局乃至危机,使其不得不重新检视近年来对华战略的利弊得失。从结果看,那就是必须有所收敛与调整。

所以,人们看到,安倍主动出席中国驻日使馆举办的国庆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酒会,作为日本首相这是一种罕见行为。7月8日,安倍首相利用习近平主席在德国出席

G20 峰会机会,主动要求会见;此后,安倍又分别在越南、菲律宾会见了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中日高层互动出现新气象。安倍首相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进而表示日本政府有条件地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与此前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此外,历史空前的日本经济界大型访华团来中国谈合作,中断多年的大批日本中层官僚来华参访研修,中日海洋事务磋商级别提升并就避免海上冲突达成共识。同时,民间的交往扩大,两国相互的好感度有所回升。这由中国外文局与日本言论 NPO 所做的权威舆论调查可以佐证。

由此,2017 年的两国关系被普遍认为“回暖”,也即由安倍重新执政以来形成全面战略对抗的中日关系出现一线转机。

二、中日关系出现转机的主要因素

(一)国际格局的变化

首先,世界局势特别是美国自由贸易理念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微妙影响。在逆全球化及民粹主义浪潮中,特朗普政权推波助澜,以“美国第一”为宗旨,大量“退群”。特别是其退出 TPP 及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举措,让资源匮乏因而须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很受伤,损及其根本及战略利益。而中国不仅在理念上高举自由贸易大纛,在实践上则佐以“一带一路”,这不仅与关涉日本战略利益的理念相吻合,同时对日本也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因此,在经贸领域,无论从 TPP 到 CP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欧 EP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日本奉行的方针,与战后以来形成并固化的日美关系规则,出现了一种“二元”现象。即无论日本参与何种区域合作形式,一般都要借助于美国并在原则上奉行美国的旨意。现在,日本不得不或者说更乐于“单干”。虽然与美国的离心离德并不一定意味着必然向中国倾斜,但势单力薄的日本与中国全面抗衡的底气则必然会受影响,CPTPP 对中日两国的意义,毕竟不同于 TPP,相应的调整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日美关系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蝙蝠效应”。以商人秉性为特质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给传统意义上的日美基轴带来很大冲击。安倍在包括建立与特朗普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内的对美外交方面虽然倾注了全力,但并未导致美国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做出进一步有利于日本的重大政策调整,反而抬高了对日本的要价。加之棘手的中东问题以及与大西洋伙伴频发龃龉,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行动能力。因此,日本精英阶层普遍感到日美关系增加了不确定性,需要重新检视和调整过度依赖美国、全面抗衡中国的既往战略。

第三,日本认为朝核问题的发展使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凸显,成为改善与中国关系的重要现实抓手与平台。随着近年特别是 2017 年朝核问题的发展变化,国际社会的担忧普遍上升并采取了相应措施。特朗普上台后,美朝之间围绕朝核问题等的博弈迅速升温,一时更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美国加大了对朝施压的力度。在这一背景下,安倍政府及日本精英阶层认为中国近期在朝核问题上的举措,具有前所未有的力度与重要作用。如果中国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将会对朝核问题的解决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更好地在朝核问题上合作,这有利于日本的安全利益。

第四,在东南亚、南亚、欧洲等地区,日本制衡中国的举措未能如愿。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之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变化以及中菲关系的快速改善对于安倍政权的南海战

略形成重创。越南虽然有意于加强与美日等国的关系,一方面获取经济和安全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对中国进行牵制,但是其本身并没有在南海问题上进一步采取攻势的意愿和能力。同时中越经济关系紧密,政治关系难以出现破局。在缅甸,日本对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所做的工作并没有达到期待的成果,加之昂山素季在对待国内问题上的务实举措,使得日本发现,缅甸难以成为所期待的“亚洲自由之弧”中的一个支点。中印关系虽然发展不顺,不仅两国边界划分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且2017年还发生了印军非法越界事件;同时,印度因为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到自己在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的地位而显得越来越焦虑,但是印度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在相关地区对中国开展全面围堵。中印双方领导层也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发生严重冲突。欧洲内部矛盾重重,加之总体力量对比的下降,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全球影响力已今不如昔。尽管日本强调自己所谓在价值观上与欧洲一致,2017年也进一步加强了与欧洲在经济乃至安保方面的合作,但欲借重欧洲来制衡中国,不要说欧洲自身的意愿,但就从能力而言,无论日本还是欧洲,显然越来越力不从心。

(二)日本国内因素的变化

首先,日本国内的对华认知发生微妙变化。毋庸置疑,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中日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变量。中国的发展对日本而言是威胁还是机遇,或者两者并存?这在日本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命题。就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军事力量而言,中国近年军力发展较快,但也非常明确是根据保卫国家主权权益和海外合法利益的需要而已,并不是要谋求霸权而无限扩张。虽然中日之间实际存在钓鱼岛主权及东海相关权益争议,但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协商解决,为中日海上紧急联络机制等危机管控举措的建立积极努力,并取得进展。日本一直担心的海上通道问题,并未发生任何由中国引发的问题。因为中国实际上本来就没有以军事力量威胁日本的想法,而是秉持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付诸实践,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威胁论”在日本也越来越难以立足。而安倍却出于偏狭的对华认知,其政府采取的与中国全面抗衡的战略,越来越显现出其实际上是以主观臆测为前提的本质,并必然有损日本的根本国家利益。

其次,日本国内政治情势及经济因素。安倍5年来赢得了5次国政选举,打的都是经济牌,实际上“安倍经济学”充其量只是差强人意。虽然因为诸多复杂因素多数选民把票投给了安倍,而安倍心里也非常清楚,国民把票投给他更多地是出于无奈。因而他亟需好的经济成绩单,才能延续政治生命。此外,其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制定保密法、打压对其不利的媒体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对战后日本民主制度的挑战及专横,特别是以权谋私所致的数个丑闻,使其在国民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并且对其执政基础形成冲击。因此,2017年的大选,安倍非常紧张,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可以说是借助了在野党——主要是小池百合子、前原诚司的失误才得以涉险过关。因为其执政基础的不稳定状态,加之2018年9月又有自民党总裁选举,要想顺利连任,除了政治上的举措之外,在经济业绩方面也面临很大压力。“一带一路”本来对日本意味着巨大商机,但安倍政权一直持反对、消极态度,引发日本经济界的不满。安倍执政5年来中日经贸关系虽然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但主要指标均成下滑态势,且是均质性下滑,与中日两国本来应该具有的经贸水平相去甚远。这都与安倍奉行全面对抗中国的战略有关,而要摆脱面临的国内政治、经济严重困局,及时调整对华关系,也就成为安倍政权的选项。

(三)中国的理念与稳定发展

中国政局稳定,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以及践行这一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多地获得世界的认同和参与。以此相对照,日本所奉行的全面制衡中国的战略,则越来越显得孤立、另类与不合时宜。路越走越窄,若不时调整方向,无疑就走入了死胡同。

三、回暖态势并不稳定,改善之路仍处于摸索之中

对于中国而言,中日关系改善的目标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可以接受的中日关系或者称为较为稳定的中日关系。其主要特征是:

1、恪守四个政治文件与四项原则共识。

2、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采取(或者实际采取)搁置争议、协商解决的方针。

3、双方各自尊重对方和平发展的权利;中国理解日本有关海路安全的关切;日本不介入南海争端,不采取任何使南海问题复杂化的举措。

二是理想的中日关系。其主要特征是:

1、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双方按照尊重事实、维护正义的原则达成广泛共识;日本通过制定国内法或者其他有约束力的文件,禁止一切在公共场合肯定过去对华侵略,或者否定存在侵略事实的行为,从而永久性地解决历史认识问题。

2、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双方同意搁置争议、通过谈判解决争议,并以此为前提视必要开展互利合作。

3、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以积极的姿态对待中国统一问题。

4、在安保方面,建立双方都乐意接受的有效合作机制,消解双方的安全担忧,特别是开展海路安全合作。

就上述两个层面的目标而言,显然,现在的状况不仅距离理想的中日关系路途遥远,而且没有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在中国看来,日本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并不稳定,言行之间存在矛盾。

第一,在历史认识问题上,2017年“8.15”当日虽然日本内阁成员中只有总务相高市早苗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但是日本国家领导人尚未做到在行动上充分顾及作为侵略受害国中国的国民感情。

第二,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不仅将台湾视为“与日本共享价值观和利害关系的重要伙伴”(安倍晋三语),而且小动作不断,如2017年1月1日,将作为日本对台窗口单位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3月下旬,日本政府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以观光推荐为借口访问台湾。这些活动表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正在逐渐公开其“一中一台”的政策倾向,继续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牵制。

第三,在遏制中国方面,日本由原来的“全球出击”转向“重点推动”,从“舆论塑造”进一步走向“机制构建”。2017年,日本和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高调推动所谓“印太战略”的实施,军事合作水平提高。在东南亚,日本以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为重点,通过提供军事装备等方式,增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并且试图挑动这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持续和进一步对抗。日本还极力加强与英国、法国、加拿大等所谓传统“价值观盟友”在军事领域的关系,开展海上安全合作等。

第四,在钓鱼岛和海洋权益争端方面,日本仍然继续利用日美安保条约体制,试图通过军事手段维持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2017年,日本的空降兵首次与美军举行联合夺岛演习,日本为成立水陆两栖部队,派遣骨干成员赴美开展了联合训练。

四、2018 年的中日关系:机遇与挑战

(一)主要机遇之窗

1、两国领导人实现工作或正式互访。

2、加快共同推动区域经贸合作机制建设步伐;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优势互补,把包括第三方合作在内的中日经贸合作落到实处;在节能环保、社会保障、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以及下一代关键技术领域深化互利合作。

3、利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40 周年纪念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进一步加强两国政府、政党、议会间的交流,增强相互理解;加强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人文交流,进一步改善国民感情,巩固回暖的民意基础。

4、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加强合作。

(二)面临的主要挑战

1、中日美关系的新变数。2017 年的中美关系虽有磕绊,但总体平稳。但 2018 年的中美关系包括经贸、海洋问题、台湾问题等一般预测将面临很大风险。如果日本将此视作联美制华的机会之窗,中日关系回暖的势头必将受到重创,乃至戛然而止。

2、日本在推动印太战略、强化与南海问题相关国家以及欧美的军事合作,也即打造围堵中国的多层网络方面走多远,也势必为回暖的中日关系带来重大负面影响。

3、安倍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的举措,也势必会对回暖的中日关系带来微妙影响。

五、促进中日关系继续回暖的几点建议

1、如果安倍政府依然把中国视作战略对手乃至假想敌,那么中日关系的回暖就不可能行稳致远。换言之,2017 年日方推动中日关系回暖的举措只能被认为是策略性行为。问题的关键是日方对一个日益发展和强大的中国如何认知?虽然中国自证和平发展需要时间,但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日方以零和博弈的观念来看待和应对中国,将是一种危险游戏。安倍政府应该在对华认知上进行纠偏,这是中日关系得以根本改善的前提。

2、中国应对日本的安全关切特别是海洋通道安全予以高度重视,创造条件逐步展开两国安保交流,做好增信释疑工作。

3、最大限度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展和深化两国经贸合作,将两国关系负面因素对经贸合作的影响降到最低,做大做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4、双方应就中日关系的长期愿景如何进行顶层设计开展积极探索。为此,应该通过继续改善双边关系,积累善意,为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正式访问创造条件,使中日关系回复到正常发展轨道,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繁荣与和平做出应有贡献。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一)2017 年中日关系总体态势:从全面对峙到一线转机

(1)本报告书题名为“战略对峙中”,此题目说中了目前中日关系的状况。

(2)有关安倍本人的对华认识,本文指出他有“偏狭的对华认知观”,所以在他执政的五年间推行“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挑战中国”的战略。但是,日方的一般观点不一定相同。虽然安倍本人在 2012 年的众议院选举时明显地表现出保守思想,但是他当首相以后,安倍政权站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中间,保持了一些平衡感,对华政策也不一定依据“其潜台词是中国威胁

论”。

在安保上,日本确实跟美国和澳大利亚在西太平洋建立新的安保圈,以及其三国跟印度建立“印度—太平洋地区合作框架”。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这些国家,也同时都希望跟中国建立安保上的联络体制,以及舰艇交流等和平和友好措施。

在经济上,虽然以前的日本民主党说过 TPP 是制衡中国经济发展的有效体系,但是安倍政权在一定条件下,对“一带一路”表示了肯定,并且欢迎中国保持自由贸易原则。所以特别是在经贸秩序上,安倍政权不一定敌视中国。

(3)有关安倍的性格,我们应该把他本人的思维和安倍政权的性格分开。本报告书有时候提到他本人的性质,但是有时候讨论的是安倍政权,两者不是一回事。

(4)有关台湾问题,此报告书说“与蔡英文政权各种形式的互动频繁,挑战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底线。”但是,可能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部门也了解,日本政府对台湾的政策在 2017 年前后有相当大的区别。虽然 2017 年前半年,有日本政府副部长级的人员访台等事情发生,但是后半年安倍政权的台湾政策并不积极。

(二)中日关系出现转机的主要因素

(1)国际格局的变化

笔者赞同美国的不确定性和朝核问题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及“一带一路”等中国对世界各地的投资也让日本经济界比较期待的主张。但是,“第四,在东南亚、南亚、欧洲等地区,日本制衡中国的举措未能如愿”之部分,跟日本的主流认识有所不同。中国对周边国家或“一带一路”沿线的影响力已经完全超越其他国家,很多国家在经济上依靠中国,不希望政治外交上跟中国冲突。菲律宾、越南等国家虽然跟中国有领土问题,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也依靠中国,所以在政治外交上一定会跟中国妥协。日本政府也了解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所以向中国提出一些条件,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了肯定的评价,安倍首相所提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也对中国开放,他主张寻找“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和“一带一路”的共通点。

(2)日本国内因素的变化

(3)中国的理念与稳定发展

在本报告书所述的国内因素中,最大的疑问是在分析日中关系时,中国方面往往中国是稳定的,而日本是经常变化的,因此经常把原因归结到日本国内。有意思的是,日本方面的学者则往往将原因归结为中国方面的变化,这也是分析中日关系变化时的一个特点。

本报告书指出“中国威胁论在日本也越来越难以立足”,我认为这可能是基于日本国内的舆论做出的判断。2017 年到处可以听到“中国崩溃论的崩溃”等言论,主张应该基于现实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恐怕这也是导致安倍政权转换对华方针的一个重要背景。但是,2017 年的大选,以及 2018 年即将进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会给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何种影响,还是未知数。

其实有必要将对华政策的变化,同修宪的动向结合起来。安倍首相本人确实有意动议修改宪法,但是也不想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的过多批判,因此缓和对华关系也是一个选项。另外,安倍政权的对俄罗斯外交以及对朝鲜的外交都没有取得较大效果,对于执政 5 年之多的安倍政权而言,无论如何都需要像样的“外交成果”。那么,对华关系的改善或许也可以成为一项重要的“外交成果”。

(三)回暖态势并不稳定,改善之路仍处于摸索之中

笔者虽然认同部分观点,但是有一些观点在我看来还值得商榷。首先,“1、恪守四个政治文件与四项原则共识”,日本方面对“四个政治文件”不持异议,但是对于“四项原则共识”,日本方面也有观点认为该“原则共识”只是2014年这一阶段的原则性共识。所以可见日中双方对“四项原则共识”的认识并不一致。另外关于南海问题,文中主张“日本不介入南海争端,不采取任何使南海问题复杂化的举措”——其中“介入”、“采取复杂化的举措”等表述究竟该如何定义和理解?或许需要日中两国通过协商方式来解决。如果是中国单方面来定义的话,日本方面势必会产生龃龉。

关于“理想的中日关系”这一部分,本报告指出“禁止一切在公共场合肯定过去对华侵略,或者否定存在侵略事实的行为”,这在日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该主张与日本国宪法中言论自由等条目相抵触。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尊重日本社会的主流认识,关注少数不同见解,但不能将其视为日本社会整体的言论。第二,“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以积极的姿态对待中国统一问题”这一主张恐怕也存在困难。关于该问题,1972年9月发表的“日中共同声明”中,日方对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立场“理解并尊重”,日本政府有必要继续遵守这一共识。

关于“言行之间存在矛盾”这一部分。本报告指出,“第一,在历史认识问题上,2017年‘8.15’当日虽然日本内阁成员中只有总务相高市早苗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但是日本国家领导人尚未做到在行动上充分顾及作为侵略受害国中国的国民感情”,但据我所了解到的信息显示高市早苗总务大臣已经于8月3日辞任,^①事实上2017年8月15日日本内阁阁僚并无人参拜靖国神社。所以,该部分的表述前提不存在。

关于台湾问题,如前所述,日本政府在2017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政策差异明显。如果能够基于这一政策差异来考虑或许会更有参考价值?另外,“在遏制中国方面”,本报告指出日本“通过提供军事装备等方式,增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但应该区分“海上保安能力的提升”与“军事力量的提升”。例如,日本对菲律宾提供的巡视舰算是“军事装备”吗?根据日本方面的认识,这是提高东南亚各国海上安保能力的行为,并不是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当然,其前提是日中两国在领土问题的立场上存在异议。

(四)2018年的中日关系:机遇与挑战

关于“(一)主要机遇之窗”,我基本同意报告书的见解。当然,是否可以更进一步致力于新型关系的建构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进行了调整,正如习近平主席对“生态文明”的重视那样,这对日中关系而言是一个好契机。对于接下来的首脑会谈,是否可以“生态文明”为基轴来摸索新型的合作架构呢?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贫富差距等民生领域,日本拥有相关经验和教训,对此可以将中国内政的大转换同日中关系改善有效地进行衔接。

关于“(二)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非常理解中国方面的认知和主张,把所有的问题都追究到日本或者其他国家,中国自身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种姿态恐怕日本方面未必能够接受。日中关系是受到日中双方以及国际因素影响的,当然中国国内也有影响或者“挑战”日中关系的因素存在。

(五)促进中日关系继续回暖的几点建议

关于这一部分,我认为主要是中国方面对安倍政权抱有一定程度的猜疑心态。如报告书中所述,“问题的关键是日方对一个日益发展和强大的中国如何认知?虽然中国自证和平发

展需要时间,但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日方以零和博弈的观念来看待和应对中国,将是一种危险游戏”。那么,日本社会要做出何种回应才能够让中国感到“满足”呢?中国方面是通过何种手段来衡量日本社会对华认知的变化的呢?今后日中两国之间不妨尝试一些可以有效测评双边国民感情以及相互认知的渠道。毕竟在缺乏互信的基础上相互怀疑对方只会导致日中两国陷入自说自话、各执一词的怪圈。

二、田岛英一 教授

拜读报告之后的第一感触,是感叹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对日本研究涉猎之广泛。本报告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保障、社会状况等各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而且这些分析在日本人看来也非常正确且中肯,我认为是一部值得高度评价的报告书。

唯一的问题点在于立场的不同。人们因为其所处位置的不同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这个问题不是说开阔一下视野就可以解决的。因此,本报告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中国研究者基于中国的立场在观察日本时所呈现出的“中日关系”的面貌。

那么我本人则基于日本的立场,对“日中关系”的面貌做如下简单的评论。

当前的日本诚如本报告书所言,面临着人口减少、老龄化加重等问题。向外国人介绍日本了不起的地方等电视节目的流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恐怕是自信丧失的一种反证。美国籍艺人(本职是律师)K.基尔伯特的著作《被儒教所支配的中国人与韩国人的悲剧》,在讽刺批评中国和韩国的背后,实际上他本人并没有认真地研究过中国和韩国。但是作为一名外国人,通过嘲讽中国和韩国来抬高日本,毋宁说恰恰满足了部分日本国民的诉求。

反观中国,其经济增长率长期维持在6%以上,日中两国之间国力的差距越拉越大。日本的大街小巷充斥着前来观光的中国游客,他们以令日本人瞠目的气势大量购买日本的产品。安倍政权在2015年提出了“一亿人总参与、实现GDP600兆日元”的口号,但是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附和者寥寥。不得不说当前的日本人至少从心理上而言,是以弱者的姿态来看中国,如果无视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政策建议恐怕未必具有现实性意义。

基于这样的前提,目前中国的军费仅就可以掌握的数据就已经是日本的4倍,日本、韩国、印度三国加起来也难以匹敌。即使日本的自卫队有侵略中国的意图,在前线部队还没有登陆之前,恐怕中国的战略导弹就已经到达东京。更不用说,日本侵略中国只是一种愚蠢的妄想,当然中国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中国在军事领域大动作不断,航空母舰、核潜艇的建造不曾停歇,甚至派遣军舰越过列岛线、战斗机在日本海域附近巡航,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2016年日本航空自卫队针对中国军机紧急出动1200次,是对俄罗斯军机出动次数的4倍。中国于2013年获得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去年又获得斯里兰卡汉班托特港的使用权,而在吉布提则获得了被认为是永久性的补给基地。如果以上所有动向都以“防卫”的目的进行说明,恐怕对当前弱者心理明显的日本人来说未必能够行得通(即使对于强大的中国而言,也很难接受韩国方面“萨德是基于自主防卫”的主张)。相较于“中国威胁论”这种程式化、理论化的主张,“恐心理”似乎更能反映日本的对华认识。基于此,如本报告书中“中国不会谋求霸权”等认识,虽然是中国方面改善日中关系的认知前提,但是日本从一开始恐怕不会认为这是先验的前提。

再有就是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日本国民对该问题的不安已经达到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状态。这对安倍政权来说也是修改宪法、增强防卫力量的绝好机会。“大隅”、“摩周”、“日向”、“出云”等大型护卫舰最早被认为是舰载直升机型航母,对此政府还遮遮掩掩。但是现在,连

防卫大臣本人也已经开始公开表示要将“出云号”改造成航母了。有关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防卫合作的强化、武器装备的海外出口等问题,似乎在国内也没有遭受特别的舆论压力。在过去 1955 年体制下,这种超出“专守防卫”范围的军事举动是断然不允许的,然而在今天,却已经变成了平常现象。

本报告书特别指出了安倍首相本人对中国的认识问题。毫无疑问,安倍本人在对华认识方面确实存在某种偏见。但是更应该注意的是,比起安倍本人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安倍等保守派政治家长期以来对日本国家定位的追求,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得以成真。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的一些举动,助长了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大跨步。虽然中国强调和平崛起,但在日本国内客观上造成了“中国迫使日本购买武器装备”、“中国如果行动则大和武士之国也应有行动”等耸人听闻的言论。

本报告书还认为安倍政权主打的经济牌是其政权得以长期存续的主要原因,但是,日本国民对经济恢复毫无实感。倒不如说导致安倍政权长期执政的诱因是无能的在野党、以及让日本有一种不安全感的朝鲜和中国。

关于一带一路,本报告书特别强调了双赢的一面。但是这一认识似乎在日本国内没有普及。当然更多的还是不安,对于作为弱者的日本而言,仅有的一点强项似乎也有被中国吞并的危险。

那么对于致力于产业结构转型的中国而言,经济结构又如何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遭遇瓶颈,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也不能用卓有成效来形容。2014 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 2025”行动纲领,该纲领计划在十年之内打造几个世界级的中国品牌。但是纵观近些年的发展情况,我认为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想要同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恐怕要等到本世纪中叶。

即使该纲领所提出的计划如期推进,也会衍生出各类问题。首先,中国一直致力于通过增加货币流量、降低利息等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仅就公开发表的数据显示,2011 年货币供给量是 GDP 总量的 1.74 倍、2015 年则增加至 2.03 倍。但是企业方面的投资并没有实现稳定增长,结果造成资金大量闲置囤积。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潮有所减退,多数投资都是国有企业的政策性投资。

这种不合理的投资政策,已经造成了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失衡。最近的报告显示,就国内经济的纯利润归口而言,美国约 20%是金融界创造的,而在中国有 80%的利润是金融界创造。实体经济的 GDP 占比,从 2011 年的 71.5%滑落到 2015 年的 66.1%。

闲置的资金要么流向房地产市场,要么流向股票市场,这些导致房价、股票价格的暴涨暴跌。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混乱也降低了人民币的信用,部分中国人通过香港等地抛售地产和股票,这种现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稳定的迹象。

基于如上种种,中国的投资方向已经开始从国内向国外转移,近十年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近 10 倍。2016 年中国对国内的投资较去年增加了 8.3%,而对外投资则增加了 55.3%。关于这些对外投资,日本方面一般认为是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构想的附带效应。中国针对欧亚大陆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趋势明显,这其中固然有经济方面因素的考量,但同时也在政治外交领域强化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意图难以否定。特别是这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中国国内经济的增长,从而实现“一石三鸟”的效果。

如果日本方面基于上述逻辑思考的话,恐怕要认真衡量“一带一路”究竟是机遇,还是被中国所利用来均摊投资风险亦或者是给中国的倡议提供智力支持的伙伴,这才是日本所真正关心和担心的。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安全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本报告书中所提出的认识前提其实在日本国内并没有获得共鸣。换句话说,以当前中日关系的脆弱性而言,这种认识前提不足以抵消日本国内的不安心理以及对中国意图的困惑。在我看来这是最本质的问题,而其他各类问题只是其具体体现。

当然,两国间的信赖关系即使在过去也未必充分。但是,在 40 年前,中日两国都有对抗苏联的共同政治外交动机,而后十几年经济上占优势的日本以及接受援助的中国在经济动机上找到了比较好的契合点。但如今强大的中国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日本了,在动机弱化的情况下,想要增加两国的信赖关系的确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困难。

这种信赖缺失的原因可以从很多侧面去寻找。就日本而言,历史认识问题不容忽视。当然很遗憾的是,日本国内依然存在否定日本战争罪行的声音。作为一名中国研究学者,我理解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中国也正在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深入改革。但中日两国毕竟政治体制不同,相互理解并非易事。日中两国所面临的问题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短期内很难出现变化。第二,只有公民社会越发成熟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日本方面可能条件更加有利一些,例如日本的乒乓球运动员张本智和这种归化日籍的中国人后代、日中通婚夫妇的后代、以及长期滞留日本的中国人后代等还有很多。日本在过去的某一时期国际通婚率一度超过 8%,目前基本维持在 4% 左右,也就是说每 25 对新婚夫妇中至少有一对是跨国婚姻。这些外国人配偶中,中国籍配偶占比 4 成,中国人的后代日后可能成为增强交流、相互理解的重要群体。

既然短期内不能指望根本性的解决,当前只能采取对症疗法。要减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只能够通过全方位增加相互间的交流来实现。但是,我想说的是比起数量来更应该重视质量。大量日本人进入中国,日本人的行动逻辑必会超出中国人所能够理解的限度,所以会产生混乱以及引发中国人的反感。以 2004 年亚洲杯为例,日本队的小组赛在重庆举行,大量悬挂或手持日章旗的日本球迷涌入赛场。重庆在战时惨遭日军蹂躏,看到这么多手持日章旗的日本人在重庆出现,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不满,在亚洲杯决赛之后也发生了针对日本球迷的暴力行为。当然,日本人也对当前中国游客在日本的“爆买”以及不文明行为颇有微词,日本人的不满也在层层郁积。坦白说,中国游客在日本并不受到好评,如果仅仅是因为考虑经济驱动而片面强调数量上的“交流”,结果反而适得其反。

对此,我认为应该优先年轻人、学者、企业家等对两国关系改善抱有积极态度的人们通过多种渠道来推进交流。关于首脑外交,只要中国方面不排斥,当然能够自然扩大最好不过。对于安倍政权而言,拒绝同中国对话得不到任何实际利益。无论是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对话以及围绕“一带一路”的两国合作问题,可以分阶段积累信赖关系并逐步推进。“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用在这里恰到好处。

三、青山瑠妙 教授

正如本报告题目所呈现的那样,日中关系虽然仍处于战略对峙状态,但是已经开始出现好转的趋势,而 2017 年恰恰可以说是关系转换发生的元年。基于这个视角来看,本报告书可以说正确地把握了日中关系的整体趋势,不仅仅在学术研究上,同时也为理解当前的国际关

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报告书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向以及日中关系等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同时也为推进日中关系发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政策建议。

本章分别从国际体系要素(美国退出 TPP 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势头的出现、日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朝鲜核武器开发问题、日本在东南亚 / 南亚 / 欧洲等区域围堵中国政策的失败等)、日本国内因素(对华认知的变化、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化)、中国的新理念以及稳定发展等三个方面指出了导致日中关系好转的原因。同时,报告书也指出日本领导人的历史认识、日本政府的台湾政策、对华对冲政策以及在海洋权益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仍旧是可能导致日中关系不稳定的诱因。

基于日中关系面临的上述状况,本报告书提出如下政策建言。如果安倍政权不改变其对华认知、仍旧以中国为假想敌国的话,日中关系没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当然,中国也应理解日本对其海洋通道的重视,通过加强两国在安全保障领域的交流、强化经贸关系等途径来深化双边关系。

对于对方所关心的议题领域相互理解,是两国关系改善的第一步。从这个视角来看,我认为本报告书的建议充分理解日本方面的担忧是值得高度评价的。

日本作为海洋国家,海上通道是国家的生命线。随着中国对海洋问题关注度的增加以及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日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高度警惕中国的海洋活动。中国方面如果能够理解日本的这种警惕感,其实对缓和两国关系、改善日本的对华感情以及促进两国民间的相互理解是有促进作用的。

中日关系在安全保障领域的缺乏互信以及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都呈现出了变化的端倪。以当前之现状来看,中日两国相互之间对对方关心议题的理解还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改善双边政治关系和国民感情的瓶颈。基于此,本报告书的建议对清除横亘在日中两国间的一大障碍大有助益。

另外,诚如本报告书所言。在当前日中两国依然在安全保障领域缺乏互信的状况下,通过强化经贸关系来稳定日中关系的建议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专题一:2017:涉险过关的安倍政权

2017 年,虽然自民党在东京地方议会选举中“遭遇滑铁卢”,主要在野党合纵连横,显示出欲取代自民党实现“政权交替”的势头:因为加计学园、森友学园等“丑闻”的影响,安倍政权支持率一度下滑。但从 10 月份众议院选举的结果来看,安倍政权呈“震荡上行”走势,而日本国内政治生态依然维持基本格局。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安倍政权的“三根支柱”,即选择政党的民众、选择领袖的政党、选择伙伴的美国及与之相关的日美关系,依然比较稳定地支撑着安倍政权。尽管 2017 年日本政局动荡不安,安倍政权出现梅开二度以来的最大危机,但其仍能涉险过关,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

一、自民党的执政地位难以撼动

2017 年 3 月 5 日,第 84 次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大会通过决议,延长党章中规定的党总裁任期,由“最长两届 6 年”延至“最长三届 9 年”。因此,安倍晋三可以在 2018 年 9 月再度寻求连任,若能如愿以遂,将成为二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

2017年10月,日本众议院再次经历大选。在总共465个议席中,执政联盟自民党和公明党分别获281席和29席,新组建的立宪民主党获54席,选前被认为是自民党主要“对手”的希望之党获50席,共产党获12席,日本维新会获11席,社民党获2席、日本之心党未获1席,其他无党派议员等获26席。

过去一年,日本民意调查的数据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曾多次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安倍内阁接连曝出丑闻以及内阁成员对丑闻的“失忆”,对民众“失信”的做法令民心离散。2017年7月,安倍内阁支持率曾一度降至29.9%,首次跌破30%,不支持率上升至48.6%,创下新高。对此,安倍以“让民众进行选择”的姿态表示,“想要恢复民众对内阁的信赖,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不仅在2017年两次改组内阁,安然度过“危机”,而且“心想事成”地使各项政策顺利得以推行。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在日本政坛,自民党根本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政治对手,以至于安倍对在野党的轻视溢于言表,甚至不屑于营造徒有其表的“朝野和谐”气氛,令在野党只能诉诸媒体发泄对安倍政权的不满,而媒体为了“博眼球”也乐意刊登“黑安倍政权”的报道,包括对“丑闻”的追踪报道。但是,这并不影响自民党和安倍执政。因为,除了自民党,日本民众别无选择。一个自民党大佬曾公开表示,“我们自民党树大根深,已经执政50多年,与那些执政过几个月、几年甚至从未执政过的在野党相比,就好比大学生与小学生的关系。有成绩优异的小学生从3年级跳级到5年级甚至6年级,但你见过从小学生跳级到大学的吗?只要我们自己不出现全党大动乱,要想从我们手里夺得政权,起码还得再学习几十年!”

二、自民党派系及其对华立场

目前尚没有明显迹象显示“后安倍时代”即将来临,但未雨绸缪却不无必要。

2017年8月3日,安倍再次改组内阁。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强调,内阁改组不会接受自民党各派系的推荐。和以往首相在组阁时必须兼顾派系力量的平衡相比,安倍政权的派系色彩确实较淡。但是,自民党的政治传统并未消失,而各派系的对华政策存在明显的传承性,值得了解。

目前自民党内存在八大派系,依议员人数(实力)排列,依次是:1、“清和政策研究会”,因领袖是细田博之而通称“细田派”。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是该派领袖。自森喜朗以来,除麻生政府以外,历届自民党政府基本由该派系主导,包括森喜朗、小泉纯一郎、福田康夫、安倍晋三。其对华政策和立场因人而异。2、“宏池会”,以现任自民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为首,被称为“自民党内的公家集团”,即不掌握最高权力却在党内拥有广泛人脉、掌握各种要职,是负责在各派系之间折冲往返的缓冲势力。3、“平成研究会”。首领是曾任防卫厅长官、财务大臣等多项要职的额贺福志郎,故称“额贺派”。该派曾经是影响力首屈一指的“田中(角荣)派”,但近年影响力急剧下挫,2018年初还发生倒额贺福志郎的“政变”。4、“为公会”。以麻生太郎为首的该派系发端于吉田茂旧自由党中最基本的力量,属于“保守本流中的本流”。5、“志帅会”。现任首领是二阶俊博。该派“始祖”是主张日本在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的鸠山一郎。1982年后连任三届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继承了这一路线,非常重视中日关系。6、“水月会”。由石破茂创立。2012年9月安倍险胜石破茂,石破茂曾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安倍在执政根基稳固后,即排斥石破茂及其派系成员。7、“近未来政治研究会”。首领是石原伸晃(石原慎太郎之子),以立志修宪著称,被认为是自民党内的“强硬保守派”。不过,石原伸晃对中国的立场比较温和,与其父亲不同。8、“番町政策研究所”。领袖是山东昭子而称“山东派”,源于三木(武夫)派,属于党内偏左势力。此外还有以谷垣禎一为首的“有邻会”,以及无所属议员约

80 人。

在上述派系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宏池会及其首领岸田文雄。上世纪 80 年代,岸田文雄的父亲岸田文武曾在中曾根内阁担任总务省政务次官和文部省政务次官。岸田文雄本人则获得与中国高层有着良好关系的前自民党干事长古贺诚的支持。2012 年,岸田文雄继古贺诚出任宏池会长,成为“岸田派”领袖。安倍再度出任首相后,岸田出任外相。有自民党官员指出,“起用岸田是对中国发出的讯息”。2013 年 1 月 6 日,岸田文雄公开呼吁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沟通,解决钓鱼岛问题,美国媒体甚至以《与安倍唱反调、日本新外相成“中国内应”》发表评论。岸田文雄在担任了三届安倍内阁的外相后转任自民党“三架马车”之一的政调会长,被认为是“迈向首相的一个台阶”。不久前,岸田文雄曾对外透露有意成为“后安倍时代”的政治首领。其次,“志帅会”首领二阶俊博主张对华友好,并在对华交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因为如此,2015 年 5 月,日本 3000 人访华团和 2017 年 4 月日本参加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峰会,均由二阶俊博率领。

然而,这些对华相对友好的派阀领袖却未必在自民党内部有稳定的执政基础。岸田文雄作为“保守本流”中的自由派政治家,虽然有问鼎首相的想法,但是却没有得到党内公开的支持,再加上长期在安倍政权下担任外相一职,他本人的政策主张更加模糊化,很难从安倍本人的阴影中走出。石破茂作为另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也在觊觎首相宝座,而安倍晋三有可能采取利用岸田和石破两人的竞争关系从中渔利的策略进行破解。另外,对华友好的二阶俊博公开支持安倍三选,也让安倍在党内的执政基础比较稳固。

三、日美关系的现状及趋向

战后迄今强化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不变的轴心。日美关系主要靠“两条腿走路”:防卫和经贸。2017 年,这两方面均出现了微妙变化并直接影响中日关系。

防卫合作方面,奉行“美国优先”战略的特朗普一上台即公开要求日本提供更多驻日美军费用,时任日本防卫大臣的稻田朋美当即予以反驳。但是,鉴于日本处于夹在中俄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同中俄不仅历史上兵戎相见,而且现实中有领土争端,日本绝不可能动摇日美同盟。

但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为了加强自身防卫,自安倍再度执政后的 2013 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出了将奉行“独立强军”路线,防务费用因此逐年攀升。同时,日本还着力强化美日澳印四边关系。2017 年 10 月 25 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表示,希望建立日美澳印四国首脑级战略对话,以南海经印度洋至非洲为中心,推动实现自由贸易,顾及防卫合作。

目前,日印关系已从“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上升为“战略性全球伙伴特殊关系”,针对中国的意向明显。按照《读卖新闻》的评论:“随着日印双方进一步将眼光聚焦在正在东亚不断崛起的中国,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似乎到了绽放的时刻。”2017 年 7 月,中国和印度“洞朗对峙”期间,美日印三国在印度孟加拉湾举行了“马拉巴尔”首次航母联合军演。

在和澳大利亚加强防卫合作方面,2018 年 1 月 18 日,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访日的重点,是商谈缔结《访问部队地位协定》。协定如果达成,澳大利亚将成为继美国、联合国维和部队之后,首个被允许在日本临时驻军的国家。日本与他国“安全合作”将有重大突破,并对中国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经贸方面,2017 年初特朗普上台伊始,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没有

了美国的 TPP 何去何从？目前,在日本的积极推动下,除美国之外的 11 国已将 TPP 更名为 CPTPP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即“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日本和美国发生贸易摩擦,尤其是汽车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却因此大大增加。2017 年 11 月 13 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向日本汽车厂商要求加强在美生产,减少对美出口。罗斯批评称:“虽然日本和其他亚洲各国反复说在推进自由贸易,但是保护主义比美国还要严重得多。”如果日美发生贸易摩擦,中日发生贸易摩擦的危险将会降低。

与日美关系相关的中日关系,还受到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影响。表面上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实质上强调“维持台湾海峡现状”即“不统不独”,是日美的共同立场。日美外长+防长的“2+2”安全协商机制,就是在 2005 年 2 月“台海危机”的背景下建立的,其目的是“通过有关台湾问题的对话,促使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其实是阻止中国武力统一台湾。蔡英文上台后,一直不承认“九二共识”,致力于发展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值得警惕。

“朝鲜半岛像一把匕首指向日本列岛”,因此,朝鲜半岛局势始终是日本的现实安全关切重点。2017 年 4 月 26 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杉宪治与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对推进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的挑衅行为加强制裁。日方希望中方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包括限制朝鲜从中国进口石油。如何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中国的影响力,回应日本的安全关切,需要中国显示更大的智慧。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首先,基本赞同开头部分有关安倍政权的分析。确实,2017 年安倍政权尽管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但总的来说没有可以代替安倍政权的其他选择。不过这种分析略显欠缺的一点是没有认识到日本社会“对安倍政权的支持率”和日本社会“对自民党的支持率”,这两者的不同。目前,日本社会对安倍政权的支持率高于对自民党的支持率,但是如果二者发生逆转,那么安倍政权想要维持下去就会变得困难。

其次,基本赞同有关自民党各派系的分析。但是,过去的派系政治和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必须要注意的是现如今,下一任首相并非是由各派系人数的多寡决定的。并且除了石破茂,岸田文雄,西村康稔、野田圣子等人也表现出了对继任首相大位的兴趣。

对于日美关系,从防卫和经贸两个角度去分析,十分合理。该报告书注意到了美国特朗普政权退出 TPP,也必须留意特朗普政权在防卫方面的动向。过去的奥巴马政权不仅仅重视日美两国间的防卫合作,也重视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同盟关系,同时注重同盟国之间防卫合作的关联性。与此相比,特朗普政权在防卫合作方面则重视双边防卫合作关系,并不像奥巴马政权一样注重多边合作框架。因此,安倍政权在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等概念的同时,也在促使特朗普政权对多边防卫合作框架产生兴趣。

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经济层面和区域合作层面,2017 年秋的东亚峰会上,安倍首相对特朗普总统循循善诱的初衷便是在此。在经济方面,美国退出 TPP 对日本来说是重大打击。但是在目前日欧 EPA 磋商取得进展、CPTPP 生效的情况下,美国方面也希望与日本达成日美 FTA,2018 年日美经济磋商或能成为一个大的聚焦点。

另外,在日美关系的防卫合作方面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美国方面对于出售日本武器有着

强烈愿望,但是与此同时日本却对此尚未回应。特朗普总统抱着非常急切的心态,希望日本能够更多地购买美国的武器。到 2018 年年末为止,日本政府将筹划制定新的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这两者中,美国方面的要求究竟能够多大程度地反映出来,这对于日中关系也是重要的一点。

另外,除了 CPTPP 和日欧 EPA,日本对于 RCEP 以及早先的日中韩 FTA 也非常关心。在这些层面上,日中之间在 2018 年或许有更多合作的可能。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章对安倍政权的三大支柱,即舆论、政党与派阀政治以及日美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对当前派阀政治重要性日趋下降的自民党政治进行了比较中肯的阐释。

专题二:2017:日本社会的变化与中日关系的改善

2017 年 12 月 1 日日本皇室会议决定明仁天皇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退位,次日德仁皇太子继位。这意味着 1989 年开始的平成时代即将落幕和“新时代”即将来临。在日本社会辞旧迎新的转换期,有必要对日本社会进行客观的研究。本专题首先分析日本社会的热点问题,其次考察日本社会的基本走向,进而探讨日本社会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一、日本社会的热点问题

日本社会的变化涉及广泛领域,本专题仅对若干热点问题略作分析。第一,少子老龄化的“国难”引起关注。2017 年 12 月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17 年日本出生人口数将仅为 94.1 万人,2017 年死亡人数估算值为 134.4 万人,人口自然减少首次超过 40 万。数据显示日本少子化现象更加严重。同时,日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男性平均寿命 80.98 岁,女性平均寿命达 87.14 岁。也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厚生劳动省统计,2025 年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增加到 3500 万,其中 75 岁以上后老龄人口将达 2179 万。2016 年达 27.3%的人口老龄化到 2025 年将超过三分之一。2065 年老龄人口将超过 40%。根据厚生劳动省 2017 年 4 月的人口数预测,日本人口将在 2053 年跌破 1 亿,2065 年降至 8808 万。少子老龄化不仅导致劳动力短缺、消费低迷、通货紧缩、地方凋敝等后果,而且财政越来越不堪重负。安倍晋三在 2018 年 1 月国会施政演说中惊呼:少子老龄化成为日本“国难”。日本针对少子化制定了各种政策来提高出生率,譬如改革劳动制度,对生育孩子提供更多补助。针对老龄化提出了促进老年人再就业、鼓励延期领取养老金、提高生活品质、增强健康等措施,并完善了老年社会福利服务体系。

第二,“低欲望社会”问题引起关注。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调查报告,日本 18 至 34 岁女性中 39%的人还是处女,18 至 34 岁男性中“处男”的比例高达 36%。而且 18 至 34 岁的女性中一半人没有男朋友,35 至 39 岁的年龄段中 26%的女性和 28%的男性从未有过性经验。这一报告引起各种反应。有人认为这说明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了“低欲望社会”。“低欲望”不只是反应在性问题上,也反映在社会各个方面,譬如没有炒房炒股的欲望、没有结婚生子的欲望、没有购物的欲望,宅男宅女越来越多,谈恋爱觉得麻烦,上超市觉得多余,一部手机便框定了自己的生活。日本研究者大前研一写了《低欲望社会》一书,感叹:年轻人无欲望、无梦想、无干劲。物价虽降低而消费得不到刺激,银行信贷利率虽调低而年轻人购房数依然下降,年轻人对买车兴趣下降,对奢侈品消费嗤之以鼻,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就

行。但有人对统计学上的处女率或处男率质疑,认为低欲望就其本质而言只是改变生活方式而已。许多人追求一种“小确幸”,将自己的幸福融于日常的有趣生活里,个性化代替了多年的共性化,不乏一种不求大欲的幸福感。看似无志向的社会,或许是要追求一种“轻”文明社会形态。

第三,社会阶层的分化引起关注。近年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升高,相对贫困率已居发达国家的高位。日本的“中间层”正在出现“上流”与“下流”的分化,社会差距扩大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早稻田大学教授桥本健二的新作《新日本的阶级社会》针对差距扩大的现状,指出个人年收入5亿日元与186万日元的差距已经不是阶层差距,而是形成了新的阶级。惊呼“超过900万人的新下层阶级诞生了”。新下层阶级大多是“非正规劳动者”,约占就业人口的15%,月收入约15万日元,贫困率达38.7%,男性未婚率达66.4%。同时,日本的老年贫困问题呈现加重态势。依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增加,国家财政预算中养老金比重加大,而不参保及拖欠保费的人增多,导致养老金水平难以提高,而且社会保险的个人负担比例提高,增大了低收入老年人的生活压力。厚生劳动省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老年人贫困的时间跨度和贫困率都甚于其他年龄层,其中女性贫困率又高于男性。接受生活保护的人群中的老年人口比例呈上升趋势。日本对老年贫困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老年贫困状况不容乐观。

二、日本社会的基本走向

日本社会变化中的问题引起各种议论,出现了日本“走向风险社会”,日本“趋于衰落”,日本“右倾化日趋严重”等看法。如何看待日本社会的基本走向?需要实事求是的分析!本专题仅对日本社会的特征、发展和倾向略作考察。第一,日本社会的基本特征。根据日本实情,与其说日本“走向风险社会”,不如说日本社会呈现出“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社会的特征。一是对经济高速增长不那么关心。不少日本人认为日本已度过了需要高速发展的时期,追求高速发展是新兴国家的事,日本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精致度,可持续性 & 创新方向努力。二是对政治不那么关心。日本社会出现了非意识形态化的现象,形成庞大的无党派,选民中无党派层占一半左右,这表明民众渐渐远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2012年前日本连续6年几乎年年换首相,但日本社会仍然相当稳定,反映了日本社会的高度自律性,这种内在自律也是对政治不关心的原因。三是当政治开始侵犯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时,社会则通过选举和舆论等方式对政治家进行规范。安倍晋三加速推进修改宪法的行径引发民众的不满,加计学园和森友学园问题的丑闻更使其支持率大跌。这反映了后现代社会的民众对政治的制约。正确认识日本社会的特征,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日本,也有益于改善对日的认知。

第二,日本社会的逐步发展。有人认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20年是“失去的20年”,日本社会有不少人因泡沫经济崩溃而形成内倾、保守型行为范式,年轻一代竞争意识薄弱,有些年轻人既不上学也不工作,成为十足的“自由人”。这种内倾、保守、不愿竞争的心理反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泡沫经济崩溃并不意味着日本“趋于衰落”,这段时期不是“失去的20年”,而是日本实现经济软着陆并着手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20年。日本依然是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力和科技力的大国。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认为这段时期是“日本脱下浮躁的经济发展外衣,进入沉淀期的一段时间”,“在这个20年里面,日本人较全面地构建了一个三安社会:安全,安心,安定”。日本社会发展形成了方便的生活环境、洁净的自然环境、安全的社会环境、多元的文化环境。近年失业率创新低、交通死亡率创新低、景气指数创新高。而且健全了应对地震等灾害的有效制度,完善了环保领域的政策和制度,日本社会正在逐步发

展。正确认识日本社会的发展,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中日社会经济的差距,有利于中日广泛开展社会经济的合作。

第三,日本社会的整体倾向。强调日本“日趋右倾化”的看法也有失偏颇。从小泉纯一郎到安倍晋三的自民党主流的确在右倾化,但这种右倾化并没走向极右,也不是整体。石原慎太郎在 2012 年挑起“购岛”风波后试图通过成立新党问鼎首相宝座,然而其极右倾向并没获得日本社会的认同,其本人在大选失利后退出政坛。这说明极右思想在日本社会没有市场,反映了后现代社会民众对政治家走向极右的内在约束。安倍晋三第二次组阁后其内政外交的保守主义色彩强烈,但他不仅受到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的牵制,也受到日本社会的民主和平势力的制约。日本社会并非只有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民主主义和平主义思潮和中道主义思潮依然产生影响。日本政治右倾化不等于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不能把部分右倾势力的动向当作日本社会整体的倾向。日本社会整体倾向不是右倾化而是多元化!近年来在西方世界蔓延的民粹主义并没在日本社会发生。正确认识日本整体倾向,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日本,增进中日互信。

总之,日本社会经过各种改革,建立了一系列与现实比较相适应的后现代社会的制度和政策。日本社会转型成功的话,有可能在精密、尖端领域进一步迈进,同时在养老、医疗、机器人等方面引领世界。从软实力角度来看,日本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在 2011 年大地震时得到充分展示。联合国公布的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排名中,日本国民素质连续多年排名世界第一;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世界最佳生活品质排名中,日本长期居于首位。要用平常心来看日本。唱衰日本并非明智之举!客观地清醒地全面地认识日本社会,将有利于我们积极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三、日本社会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华文媒体列举了 2017 年中日关系十件大事:1、习近平与安倍晋三于 7 月德国 G20 峰会和 11 月越南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谈。2、李克强与安倍晋三互致贺电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并于 11 月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会谈。3、安倍晋三出席中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表明改善关系的愿望。4、访日中国人数量继续增长,2017 年突破 700 万人,中日人员往来跨入千万人次新时代。5、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峰会,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会,习近平接见二阶一行。日本三大经济团体年末组织最大规模代表团访华,李克强接见。6、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日本的歌舞伎和芭蕾舞访华公演;中国的歌剧和舞剧赴日公演;《汉字三千年》展巡展日本。7、中国制造业收购日企风生水起。海信收购东芝彩电,联想收购富士通电脑,中国系均胜电子收购高田气囊。8、中国新型互联网服务业进军日本,支付宝、微信支付、途家、携程、滴滴出行、共享单车等涌入日本。9、大熊猫香香 6 月 12 日在东京上野动物园诞生,作为友好使者增进了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10、日本 APA 连锁酒店在客房内放置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籍遭曝光,引发中国民间的抵制。通过这十件大事可以窥见 2017 年中日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还反映了日本社会依然存在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势力。可以说 2017 年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势头,但是乍暖还寒,尚需共同努力。

需要开创新时代。中共 19 大确立了习近平为核心的新领导体制,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日本平成时代即将结束,“新时代”即将来临,而且 2017 年 10 月安倍晋三第三次赢得大选,日本内阁进入新的时期。这意味着中日两国在今后数年内将会有比较稳定和强

有力的政治领导层,为中日关系新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从日本社会的广阔视野来审视中日关系,可以看到中日关系绝非仅仅限于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日关系不仅涉及到政治领域,更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日关系不仅是政府间的关系,更涉及到广泛的社会民间的各种关系。中日两国在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的需要可以协商签订新的政治文件,实现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新发展。

需要丰富新内涵。近年中日两国民众交流规模持续扩大,尤其赴日中国游客连年大幅增长,2017年超过700万人,日本赴华游客也小幅回升,中日人员往来跨入千万人次新时代。同时,随着日本对海外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在日工作的中国劳动力有增无减。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0月底,在日外国劳动者中来自中国的多达37万多人,约占整体的三成。日本通过外国人来弥补劳动力短缺的格局日趋突出。同时日本社会中的高端中国人才日益增加,在经济贸易界、教育文化界等都有不少中国人或日籍华人在积极发挥作用。中日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前更需要发挥民间交流的优势和传统,努力消除误解和偏见,进一步加强两国社会、文化、教育及青少年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日关系赋予新的内涵,真正构筑起中日世代友好的稳固社会基础。

需要开拓新领域。中国同样面临少子化的严峻问题。日本的出生率目前是1.4,而中国是1.2。2017年中国新出生人口比2016年减少了60万,放开二胎政策没能实现提高出生率的预期目标。中国老龄化问题也不可轻视,中国60岁以上老人比例为17%。虽然目前两国老龄化程度不同,但是上海等大城市的老龄化已超三成,今后中国老龄化将趋于严重。日本2017年度国家预算用于社保的比例高达32%,而中国社保的比例大大低于日本。今后中国社保领域的需要将加重国家财政负担。中国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日合作共同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新课题。同时,中国也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的严峻现实,了解日本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其对策,对于中国建立公平社会也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中日关系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复合关系模式。当前中日关系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发展的历史关头,尽管面临不少复杂敏感因素,但总体上逐步呈现回稳改善的趋势。中日两国应该不断促进互信、妥善管控分歧、实现互惠双赢。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第一节“日本社会的热点问题”中提及的高龄化、低欲望社会以及新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等,确如所指,对日本社会而言都是大问题。不过,报告书尚未分析到“日本再兴战略”等安倍政权的发展战略。^②“安倍经济学”并非是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解决包括人口问题和社会问题在内的发展战略的一环。“工作方式改革”等政策也与这一战略相关,“女性活跃社会”政策也是其中一环。当前,日本女性的总生育率已经恢复到1.4。当然,日本社会并非全盘支持安倍政权的这番发展战略,褒贬不一。

第二节“日本社会的基本走向”部分有关日本社会的理解,可以说在日本也能够被广泛接纳。特别是报告书提出的“正确认识日本社会的发展,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中日社会经济的差距,有利于中日广泛开展社会经济的合作”,使人产生共鸣。正如前述,以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生态文明”为线索,或许能够摸索出日中之间新的合作契合点。

第三节“日本社会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部分,提出了改善日中关系的举措,而关于“需要开拓新领域”部分的内容,我们对上述有关拓展“生态文明”等新领域合作的观点表示欢迎。此外对于不同年龄层、不同地区,两国相互认识的不同等问题,日中双方需要更为细致的社会分析,所以需要补充指出具体细节上改善关系的措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有关日中双方共同改善国民感情的措施,除了推动旅游和青少年交流等手段之外,还存在其他哪些可能性,也要纳入到一个更为严肃的讨论过程中去。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章主要介绍了当前日本社会发生的变化并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社会整体上右倾化的主张有失偏颇”、“日本社会整体上不是右倾化而是多元化”,可以说是对日本社会做出了十分中肯的评价。只有在充分理解日本社会变化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制定对日政策,从这个角度出发,毋宁说本章所揭示的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专题三:2017 年日本军事发展动向及其特点

2017 年,是日本实施“新安保法”的第二年,也是日本实施《2014-2018 年度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的关键一年。安倍政府一方面加紧推动修宪,为发展军力松绑,另一方面借朝鲜核导危机和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加大经费投入,加速提升军事能力,尤其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值得关注。

一、持续增费扩员,为打造强大军事力量夯实基础

根据日本 2017 年版《防卫白皮书》和 2016、2017 年度防卫预算公布的数据,日本 2017 年度防卫预算为 51251 亿日元(含美军整编费等),加上数次追加的“补充预算”1769 亿日元,实际防卫开支为 53020 亿日元。这是安倍首相自 2012 年底第二次执政以来连续五年增加防卫预算,也是日本防卫预算 2015 年度以来连续 3 年超过 5 万亿日元。日本防卫省在 2018 年度防卫预算案中提出 51911 亿日元的防卫预算(含美军整编费等),比上年度增长 1.3%,^③ 实现防卫费“六连增”,再创历史新高。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安倍政府不断增加国防开支,为强化“统合机动防卫力量”、打造强大军事力量提供支撑。

日本自卫队实际员额也开始出现增长。自卫队现役编制员额近年保持 247154 人,但 2017 年度防卫预算首次提出增加实际员额,陆海空和联参等机关分别增加 58 人、128 人、118 人和 6 人,共计 310 人。^④ 2018 年度防卫预算案提出将继续增加 700 人,其中陆海空和联参等机关分别增加 198 人、273 人、198 人和 31 人。^⑤ 增加实际员额主要用于增加防空反导力量、组建两栖作战部队、在西南诸岛部署地面部队等,目的是为了提升防空反导能力,加强西南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提高应对各种事态的快速反应能力。

二、大力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全面提升联合机动作战能力

2017 年度,自卫队继续加大对武器装备的投入,重点发展海空、反导等武器装备,提升海空作战、岛屿作战、反导作战等能力,以期夺取周边制海制空权,全面提升联合机动作战能力,并拓展太空、网空等新型领域能力。

一是重视发展侦监装备,提升战场感知能力。采购 1 架“全球鹰”无人机,为 2 架 E-767 预警指挥机升级电子战支援装置,为冲永良部岛和宫古岛的 FPS-7 雷达增加反导功能等等。

二是大力发展海上作战力量,提高制海作战能力。建造第2艘性能超过“苍龙”级的3000吨级新型潜艇,同时延长“亲潮”级潜艇的使用寿命,至2018年中期潜艇数量将达到22艘;三是加快发展空中作战力量,提升制空作战能力。采购6架F-35A战斗机,提前一年完成“2014-2018年度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确立的28架采购计划。四是大力发展海空投送与两栖作战装备,提升快速投送和夺岛作战能力。采购3架C-2运输机、4架MV-22型“鱼鹰”运输机、6架CH-47JA运输直升机,以提升快速投送能力。五是继续发展反导力量,进一步提升防空反导作战能力。继续升级“爱宕”级“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并引进“标准-3”BLOCK II A型海基拦截导弹和“爱国者-3”MSE型陆基拦截导弹系统,提升海基和陆基反导作战能力。

日本2018年度防卫预算案显示,日本出现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如:2018年度日本将引进2套配备“标准-3”Block II A型拦截导弹的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以建立攻防兼备的多层反导体系,提升反导作战能力;自主研发日本版“战斧”巡航导弹,发展对敌基地远程打击能力;引进美制JASSM、JASSM巡航导弹和挪威制“联合攻击导弹”(JSM),分别搭载在F-15和F-35A战斗机上,以提升日本空中远程打击能力。另据媒体报道,日本还可能将“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改造成可搭载F-35B战斗机的攻击型航母,以实现海空一体化作战。这些表明,日本武器装备正在向进攻型方向突破,日本将发展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其目的是为了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谋取主动优势,夺取制海制空优势。这不仅违背“专守防卫”政策,也突破宪法第九条的限制。

三、优化体制编制,加强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能力

为了加强一元化指挥,日本将在2018年3月底前在朝霞基地设立“陆上总队”,对陆上自卫队五个方面队进行统一管理和指挥,同时撤并中央快反集团,将其主要部队并入“陆上总队”。这不仅有利于陆海空自卫队之间的协同,也有利于日美联合作战。据报道,日本将加强网络战力量,将“网络防卫队”的规模由110人增至1000人,并将新设统管太空、网空及电子战部队的司令部,级别与“陆上总队”相同。^⑥该司令部(名未定)将成为职能与陆上总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相当的新型力量司令部,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能力,争夺新型领域制高点。

四、进一步加强西南方向力量部署,强化“应对中国”的态势

首先是加强西南方向空中作战力量部署。继2016年1月驻那霸的第83航空队扩编为第9航空团之后,日本于2017年7月将西南航空混成团升格为西南航空方面队,同时增加日本西南方向的F-15战斗机数量,加强西南方向的空中作战力量,以应对“活动日益频繁的中国军机”。^⑦二是加强西南方向地面力量部署。2018年3月,日本自卫队将在佐世保部署规模约3000人的两栖作战旅,以提升离岛作战能力。2016年3月,在与那国岛部署约160人的303沿岸监视队。今后日本还将在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部署警备部队,并陆续部署中程地空导弹和岸舰导弹部队。^⑧三是加强东海方向海空警戒监视力度。在海上,日本海保厅巡视船对中国执行钓鱼岛维权执法任务的海警公务船进行严密跟踪监控。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相互配合,共享情报,常态化派出舰机在包括我国钓鱼岛海域在内的东海海域实施不间断的警戒监视任务。^⑨在空中,日本航空自卫队强化紧急起飞应对中国军机的态势,执行拦截任务的F-15战斗机从过去的“2对1”增加到“4对1”,以至于增加一个F-15飞行队后仍然捉襟见肘,由航空总队由全国基地统一调遣。^⑩据日本2017年度《防卫白皮书》公布,2016年度日本战斗机紧急起飞次数1168次,为60年来最多。其中西南航空混成团紧急起飞次数最

多,为 803 次,并以此渲染日本西南方向安全环境日益严峻。

日本不断加强西南方向军力部署,提升海空作战能力,并以中国为假想敌展开联合夺岛演练,加剧了中日东海紧张局势,使中日发生海空摩擦的可能性增加。目前,中日就东海海空联络机制草案已基本达成共识,有必要尽快启动这一机制,以防止发生擦枪走火事件。在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40 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应从长远着眼,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加强危机管控,努力改善关系,使中日关系步入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这不仅符合中日两国的发展利益,也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本报告书根据防卫省的防卫白皮书等内容,介绍了日本的地缘政治学考量、军备增长情况以及防卫预算内容。因此在事实内容上,可以认为不存在重大误读。但是,例如有关防卫预算超过 5 万亿日元这一点,需要指出日本的 GDP 目前仍超过 500 万亿日元,因而国防支出仍维持在 GDP 的 1% 以下,而国防支出的增长率也维持在 1% 左右这一非常低的水准。将此情况和全球标准或者中国自身的情况比较起来去评价的话,可以说是数额相当克制的一个国防支出。

另外,本报告书中所指出的“增加实际员额主要用于增加防空反导力量、组建两栖作战部队、在西南诸岛部署地面部队等,目的是为了提升防空反导能力,加强西南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提高应对各种事态的快速反应能力”,这一点是正确的。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日本的国防政策主要是针对苏联而制定的,即重视北方的防卫政策,因此可以说目前日本是处于逐渐调整到应对朝鲜及中国的国防体制的过程。当然,这从中国角度来看的话,或许是日本对中国的敌视策略。不过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的军力增强,又由于朝鲜的核武器开发等问题,周边变化十分显著,因此从日本来看,日本也不得不采取重视西南方向的防卫政策。从这一点上来看,东亚地区正陷入安全困境的局面,现在已经到了日中等有关国家需要共同努力阻止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的时候。

此外,报告书中提到了“在海上,日本海保厅巡视船对中国执行钓鱼岛维权执法任务的海警公务船进行严密跟踪监控。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相互配合,共享情报,常态化派出舰机在包括我国钓鱼岛海域在内的东海海域实施不间断的警戒监视任务”,对于这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海上自卫队属防卫省管辖,而海上保安厅属国土交通省管辖,双方在相互联络和工作现场合作上还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未必能够充分地“相互配合”。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章基于日本《防卫白皮书》的内容进行了缜密的分析,特别是及时地把握了 2017 年日本的军事动向。不过,我认为理解日本的防卫力量不仅仅需要将注意力放在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上,同时还要加强对日美同盟关系深化的理解。

专题四:中日海上安全形势:挑战与合作

2017 年以来,中日海上安全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在围绕东海钓鱼岛、南海等海上争端持续进行的同时,海上安全合作也在加强,出现了消极和平状态下的复合型竞争与合作态

势,中日双方不断进行战略试探、挑战、摩擦与合作。

2017 年时值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中日两国良性互动明显增加,安倍首相 6 月对“一带一路”倡议发出合作的积极信号,9 月参加了中国驻日使馆主办的国庆招待会。此外,中日领导人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二十国集团(G20)等峰会期间进行了正式会谈。特别是安倍首相在 2018 年初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希望推动中日关系向新阶段发展,表示“与中国合作,应对不断扩大的亚洲基础设施需求”。对此,中方给予了积极回应,表示“中方愿与包括日方在内的各方一道,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繁荣。

一、中日海上争端持续进行

2017 年以来,在东海、南海问题上,中日之间呈现出对峙与协商并进的态势。根据日本内阁府综合海洋政策推进事务局的资料,^⑩中日海上争端出现新的特点。日本采取了海上警备快速处置的措施,中国海上执法船则出现大型化、活跃化的趋势,中日双方的海上对峙形势依然严峻。2016 年,西南航空混合团的紧急升空次数达到日本全国的 60%以上,2017 年 7 月 1 日,西南航空混成团改编为西南航空方面队,不分昼夜执行监视空中事态,进一步强化了西南地区的防空体制。2018 年 1 月 11 日,日本两艘舰艇先进入钓鱼岛海域,中方随即采取相应行动。日本媒体在报道该事件时,全部聚焦于中国核潜艇在这一海域航行,渲染“中国威胁论”。

2017 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在 2016 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批判中国的基调基础上,再次借助海洋安全问题鼓吹“中国威胁论”,渲染日本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详尽介绍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備计划等日本基本防卫政策,并汇总防卫力建设取得的进展、防卫支出连续 5 年增长、与多国签署防卫装备及技术合作协定等安倍政府扩张性防卫政策的最新动向。白皮书具体介绍了新安保法实施后自卫队拓展的新任务,包括解禁日本自卫队南苏丹维和队伍开展“驰援护卫”活动等。

根据日本内阁府综合海洋政策推进事务局“平成 29 年版海洋的状况及其海洋政策”报告,根据离岛的基本方针,在日本具有领海基线的无人离岛 431 个岛屿中,其中有无主离岛 273 个,作为国有财产进行登记。对于在具有领海基线的离岛中,具有专属经济区基线的离岛,2011 年 5 月对 10 个岛屿标注名称,2012 年对 39 个岛屿标注名称,2014 年对具有领海基线的离岛 158 个岛屿标注名称。

2016 年 7 月,日本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确定了“我国海洋状况把握的能力强化措施”(MDA)。所谓 MDA 是指,“搜集、整理、共享我国的海洋安全保障、海上安全、自然灾害对策、海洋环境保护、海洋产业振兴、科技发展等与海洋相关的多种信息,及时掌握海洋相关状况”。为此,2016 年 12 月 21 日,在阁僚会议上确立了加强海上保安体制的方针,即加强海上保安厅的“海上法制执行能力”、“海洋监视能力”、“海洋调查能力”。

2017 年度海上保安厅调高原先预算的 2100 亿日元,在 2016 年度预算基础上,增强 5 艘大型巡视船,设置钓鱼岛领海警备专属的巡视船影像传送设备,增加 3 艘测量船,加强海洋调查体制的功能,紧急实施体制强化工作。此外,2016 年度确定紧急增员,2017 年度共计增加 442 人。

二、中日海上合作切实推进

2017 年以来,中日之间建立了许多对话机制。到 2017 年为止,举行了中日两国政府的外

交和防务部门官员之间的十五次中日安全对话,十三次中日战略对话、八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

2017年12月5至6日,第八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在上海市举行,双方就建立并启动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取得积极进展。此外,双方同意继续加强防务部门间的交流,增进互信。双方就东海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并探讨了开展海上合作的具体方式。双方原则同意2018年上半年在日本举行第九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

另一方面,日本农林水产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强化合作,推进相应的资源管理。日本环境省、外务省在NOWPAP及TEMM(日中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的框架下,举办工作小组会议,参加了国际海岸清理活动。此外,中、日、韩等一起捐助“东亚海域环境管理伙伴关系(PEMSEA)”的事务局运营经费,并加强了与东亚各国的国际合作、合作体制。

CUES(《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由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首先提出,在2000年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会议上正式公布。2014年4月22日,中国海军承办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WPNS),日本海上自卫队参与了研讨会,并成为WPNS的会员国。目前,WPNS的会员国有中、日、美、澳、韩、俄等21个国家,观察国为印度等6个国家。

日本参与了以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为成员的地区合作框架——西北太平洋地域海洋行动计划(NOWPAP),为了保护日本海和黄海等海洋环境,构筑了应对大规模石油污染等的应对体制等,实现了国际性合作。

关于双边协商,在中日高级事务级海洋协议中,中日两国专家讨论了包括微塑料在内的海洋垃圾监控等领域的研究合作,达成了新的协议。

2016年4月,与北极有关的中日韩高级别对话(大使级)首次举行,3个国家的政府及相关研究机构有关人员也出席了会议,关于今后中日韩三国在北极的合作可能性等进行了意见交换。

三、中日海上安全形势的特征:从激烈对抗到消极和平

总体上,自2012年至2017年,中日海上安全形势出现了从激烈对抗到消极和平状态,进入了复合型的竞争与合作态势,总体上呈现出“斗而不破”的拉锯战格局。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决定钓鱼岛“国有化”之后,中日海上形势急转直下,中日之间进入了激烈对抗阶段。例如,2012年10月16日,中国军舰首次以距钓鱼岛80公里的最近距离驶过钓鱼岛,日本视为武力威胁。2012年12月12日,中国首次在钓鱼岛海空开展立体巡航,明确不退让态度。

此后,2014年11月7日,中日两国在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在上述共识基础上,中日双方努力寻求建立海空联络机制等方案,妥善解决中日海上争端,出现了既对抗又合作的消极和平状态。

出现消极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是,中日双方均认识到,中日关系保持稳定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必须从大局以及中长期角度出发,积极构筑包括安全领域在内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但是,中日之间的积极和平态势尚未形成,最大的障碍在于,中日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继续坚持各自主张的对钓鱼岛领土主权诉求,而且丝毫不让步。

四、中日海上合作的前景分析

综上所述,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有所改善,中日海上合作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的趋势,但是中日之间依然存在诸多分歧。

2017年安倍再次竞选自民党总裁后,对华政策呈现出强烈的两重性特征。一方面,日本高调示好,开始承认中国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希望加速推进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另一方面,日本依然保持制衡措施。例如,日本外相河野太郎2018年1月28日访华,称“日中关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要将东海变成“和平、协力、友好之海”。另一方面他也称将强化印太战略,与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准同盟国”加强安保合作以牵制中国。根据日本防卫省2018年度概算要求,将成立水陆机动团,引进两艘新型护卫舰,启动新雷达开发,强化监控东海,严防朝核攻击。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进一步明确海洋工作“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于国家安全和权益维护”的新定位,提出三大聚焦,即,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中日合作提供新的机会,例如,两国可以在财政、货币、基础设施升级及其他领域开展合作。2017年12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外务省、财务省及经济产业省等相关部门汇总了以“在第三国的日中民间经济合作”为题的方针,将通过日本政府下属金融机构实施融资等方式,在节能环保、提升产业水平、物流三个领域积极推进中日民间企业合作。^⑫

2018年是缓和中日关系的重要“窗口期”,是中日关系从消极和平转向积极和平的重要转折期。今后,中日海上合作空间巨大,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携手合作,在反恐、海上搜救、海上生态环境治理、海洋国际治理机制建设、“欧亚大陆蓝色围带”生态保护等方面均可以继续加强合作,这些合作不仅有益于中日两国,也将造福于东亚地区各国,促进东亚海上治理的全面实施与顺利发展。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专题四虽说是站在中国方面的视角进行分析,但也可以反映出日中两国之间相互作用这一特点。“2018年1月11日,日本两艘舰艇先进入钓鱼岛海域,中方随即采取相应行动。日本媒体在报道该事件时,全部聚焦于中国核潜艇在这一海域航行,渲染‘中国威胁论’”等非常耐人寻味。我们认为本报告书指出了重要的一点,即在观察某一事件的时候,需要首先考虑双方是如何认识该事件,而该事件又是如何被双方媒体报道的。

在这一点上,第一节“中日海上争端持续进行”的后半部分,有关日本政府对无人岛管理的进展等问题,如果将其与中国方面的举动互相比较的话,或许日中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变得明了。

确实,如报告书所评价的那样,日中两国围绕海洋的紧张关系是“斗而不破”。而关于“出现消极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是,中日双方均认识到,中日关系保持稳定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必须从大局以及中长期角度出发,积极构筑包括安全领域在内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一点,是否还存在其他改变中日之间关系的原因呢?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有以下一些原因:第一、2016年在常设仲裁法院上,中国九段线等主张并未被采纳,事实上是

菲律宾方面胜诉;第二、中国在此之后在南海停止了新的基地建设;第三、在南海等地美国持续实施了“航行自由”行动,但美方行动并未造成特别大的冲击,而是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之下。而在日中两国之间,2017年8月在钓鱼岛周边没有中国渔船活动,这也与2016年8月的情况不同。

同时,报告书指出,“但是,中日之间的积极和平态势尚未形成,最大的障碍在于,中日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继续坚持各自主张的对钓鱼岛领土主权诉求,而且丝毫不让步”,可以注意到这一点表现了中方的姿态。从日本来看,2017年度东海问题上需要指出的中国的动态是2018年1月“中国潜艇浮出水面”问题。由于该事件刚好在河野太郎外相访华之前发生,因此日本认为该事件体现了中方的态度:即便是日中关系行将缓和,中国在领土问题和海洋问题上也寸步不让。

另外,“一带一路”在海上秩序合作层面为日中关系也带来了新的契机。这一点正如报告书中所提及的那样。有关海上的“生态文明”的合作也包含其中。眼下的课题应该是如何去推敲出具体的计划。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章主要分析了海上安全问题,认为日中两国在该问题上已经进入“消极和平状态”,即“竞争且合作”的状态。这一见解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当前日中两国在海上安全问题的现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在日本方面看来,目前日本国民没有产生两国“合作”的认识。如果日中两国能够在竞争性的状态下,基于共同利益展开合作且这种合作能够为两国民众广为知晓的话,毋庸置疑对于改善两国国民的感情是具有推动作用的。

专题五:“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日关系

2017年的中日关系总体呈现出转圜的“回暖”迹象,安倍首相多次在公开场合释放善意,呼吁进行首脑互访,希望2017年和2018年这两个特殊年份成为实现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的机遇之年,并表示要“将中日关系提升至一个新高度”。

在安倍政府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举措中,最为瞩目的无疑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华丽转身,从过去的观望抗拒转向参与合作。2017年7月,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习安会”上,安倍亲自向习主席表达了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意愿。在11月越南岘港举行首脑会晤时,安倍再次表示愿以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同月下旬,日本经团联组织了250人的庞大代表团访华,就“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企业的合作进行了洽谈。

一、多方考虑的权衡结果而非权宜之计

安倍内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转向是经过多方考虑的权衡结果,而不是心血来潮的权宜之计。中日媒体和学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评论,概括来看主要有以下多方面的原因:

1.内政因素。2017年安倍内阁经历了上台执政后的最大信任危机,森友学园和加计学园的丑闻事件一度让安倍内阁的支持率降至30%以下,陷入执政“危险水域”。虽然安倍破釜沉舟解散众院举行大选,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这次胜选的主要原因是在野党的分裂和民众求稳的心态所致,安倍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依然严峻,他希望通过改善中日关系取得的外

交成果来巩固政权,提升支持率。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安倍如果继续执政,那么未来两年面临多项重大政治活动,2018年9月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安倍能否如愿当选需要内政外交的业绩加以支撑。2019年日本作为东道主举办G20峰会,2020年又要举办奥运会,这些重大外交活动都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甚至有人指出,安倍的夙愿是在他执政期间完成修改宪法,但日本国内护宪力量依然存在,实现修宪的阻力依然很大,而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对日本修改第九条极为警惕,改善对华关系可以缓解来自中国的压力。

2.美国因素。特朗普上台后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相继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气候协定,美国的“退群”行为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预示着未来国际秩序的重建可能以“美国不在”的方式演进。那么,安倍向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必须有所纠正。此外,中美越顶外交依然是日本的噩梦。安倍担心美国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先于日本与中国合作,更怕中美可能达成有损于日本利益的妥协和交易。所以,优先改善对华关系可以避免被“越顶”和被边缘化,同时也是对特朗普退出TPP、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消除贸易逆差的无声抗议。

3.中国因素。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响应和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项目建设也开始早期收获。日本财界首先坐不住了,开始向安倍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善中日关系,为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持和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据亚开行预测,2016年至2030年,“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在26万亿美元左右,“一带一路”开辟了通往东南亚、南亚、欧亚大陆到非洲的大市场,如果日本不积极参与其中,就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由此可见,安倍内阁调整和改善对华政策、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多方考虑和多层背景,是权衡利弊的结果而不是心血来潮的权宜之计。

二、地区战略和多边外交视角的积极意义

从日本地区战略和多边外交的角度来看,安倍内阁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这次转向,还隐含着以下几方面的积极意义。

1.对中国主导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从过去的全面抵触转向合作参与,开始用行动来认同中国主导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一直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担心中国坐大而削弱日美的地区影响力。以日本拓殖大学教授渡边利夫为首的一批舆论领袖提出“新脱亚论”,认为中国推动的地区一体化和东亚共同体建设包含着“中国称霸的野心”,是想排挤美国 and 离间日美同盟关系,并告诫日本政府不要掉入中国的“陷阱”。安倍2012年上台后提出新南向外交,重视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并呼吁企业界实行“中国+1”战略,也就是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寻找新的市场以取代中国,这种全面“脱中国化”的外交政策其实就是“新脱亚论”的反映。但实践结果表明,日本的抵制与不合作非但没有阻挡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地区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反而损人不利己,不仅双边经济贸易额持续下降,而且在东南亚地区围绕着高铁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恶性竞争,让中日企业都损失惨重。

2.日本企业先行先试,积极投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最大的货物运输公司“日本通运”早就开始同中国铁路总公司合作,协助在华日企借助中欧班列开展通往中亚和欧洲的定期运输业务。2017年9月,日通宣布将与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合作,提供连接中日港口、中亚和欧洲的陆海联运服务。日本企业的先行先试用实践告诉日本政府,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为周边国家提供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的平台,反映了地区经济

发展的现实和需要。日本政府也开始转变观念,并采取措施对相关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政策和金融支持,在节能环保、提升产业水平、物流等领域积极推进中日民间企业的合作,推动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合作能够早日落地。

3.对中国地区影响力客观和正面评价的声音开始抬头。面对近年来的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浪潮,中国积极进取,成为引领和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的重要力量。中国呼吁各国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为地区的互联互通及其发展注入新能量和新动力。中国的包容姿态和进取精神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保护主义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作为依赖自由贸易体系的国家,对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行动产生共鸣,积极评价和正视中国影响力的声音开始抬头。有日本政治家就认为,日本在 50 多年前创建了亚洲开发银行(ADB),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位第四或第五,现今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办亚投行(AIB)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亚开行对亚洲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那么,中国的亚投行也一定会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况且,亚投行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银行,而是有 80 多个国家参与,很多国家的金融精英在亚投行就职,亚投行是一个国际化、高标准的跨国银行,是一个透明、开放的国际机构。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呼吁要摒弃排斥和抗拒心态,应该客观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一些学者在东京发起创办了“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他们认为,日本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了解很不深入,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日本学界对“一带一路”的深入研究,为日本政府和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4.从地区和平安全以及日本的周边安全形势来看,安倍上台后一贯用“严峻”一词来形容周边形势,为他解禁集体自卫权和加强日美军事合作寻找理由。但从结果来看,这些安保举措非但没有缓解日本的周边严峻形势,反而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特别是朝鲜核问题的升级令日本坐立不安,随时都可能被卷入美朝之间的战争而做出牺牲。而此时,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力显得尤为重要,这不得不让安倍等人明白,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仅靠美国是靠不住的,没有良好的中日关系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周边环境。安倍不得不承认:“如果从长远视野考虑日本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与继续走大国道路的中国改善关系是当务之急”。

当然,中日关系的全面改善非一日之功,双边层面的老问题需要管控,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依然存在,我们不能期望太高但要脚踏实地。从地区合作和多边外交的角度来看,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安倍内阁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平台具有重要意义,经济领域的多边合作可以给两国带来双赢并增进政治互信。但至少目前来看,安倍的参与还是“有限度”和“有条件”的合作,对于加入亚投行也采取了谨慎态度。因此,我们要谨防安倍在地区多边领域对中国实行“政经分离”政策,因为牵制围堵和参与合作的平衡战略和两面政策不可能带来中日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河野外相在近期访问中国时用“并肩协力”一词来规划未来两国在东亚地区开展合作,他说要共同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事务中分担责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时也指出,中日关系现今已经超越了互惠互利,发展成了共同创造未来的“共创”关系,“日中合作不应仅局限于两国,只有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才是新时代的日中关系”。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真正放下冷战思维和围堵中国的政策,期盼 2018 年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之年,以“并肩协力”的姿态携手“共创”中日关系的“新时代”,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这是 2017 年的一个强烈的信号。日本正摸索与中国在区域合作、全球治理合作等多方面改善两国关系。但是,有三个大的问题必须要注意。

第一、安倍首相并非是积极地去评价“一带一路”。安倍首相过去的论述,可以用“对于 X 是持否定看法,这是因为存在 A、B、C 等原因”来比喻,而现在他的说法变成了“如果满足 A、B、C 这样的条件,就对 X 表示赞成”。虽然实际的内容并没有大的变化,但这给人的观感是相比过去而言,他的说法出现了与中国合作的意思。另外在 2017 年年末,日方提出了物流和环境等日中双方具体的合作行业,而在港口建设等与军事相关的问题上日本又表现出了反对的姿态。在本报告书中提到,“但至少目前来看,安倍的参与还是‘有限度’和‘有条件’的合作,对于加入亚投行也采取了谨慎态度。因此,我们要谨防安倍在地区多边领域对中国实行‘政经分离’政策,因为牵制围堵和参与合作的平衡战略和两面政策不可能带来中日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这点提及了安倍首相提出的条件,但没有提到中方应当提出什么样的相应对策,只是认为安倍首相对华的姿态还不够。不过从安倍首相角度来看,可以说日方已经对中方“让步”,因此安倍正在期待着中方的“让步”。然而,中国方面的理解却是“日本的让步还不够”。安倍首相提出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是否有让步的可能,学界和传媒舆论界都没有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本报告书亦是如此。这一点必须要注意。

本报告书批判日本的政策是“政经分离”。同样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是否就是“政经一致”呢?如果中国的“一带一路”是“政经一致”的话,那么中国究竟有何种政治意图,中国又是如何去让经济和政治一致起来的呢?而中国的政治意图是否向“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周边各国进行过解释呢?这一点希望中国方面能够进行说明。

第二、日本方面的误解。日本将“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相提并论,但是实际上亚投行的规模并不大,正如本报告书指出的,该银行尽管是由中国主导,但是还是一个具有国际色彩的银行。在“一带一路”中,反而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影响更大。所以应该说亚投行是按照国际标准开展业务的,不得不说日方的理解有些偏差。然而,安倍首相在“一带一路”上表现出了妥协,但并没有对亚投行释放这一信号。

第三、在考虑日本和“一带一路”关系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能够成为范例的合作计划。本报告书中,确实也已经指出了合作的范例,如“日本企业先行先试,积极投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最大的货物运输公司‘日本通运’早就开始同中国铁路总公司合作,协助在华日企借助中欧班列开展通往中亚和欧洲的定期运输业务”。而安倍首相所提出的希望能够同中方进行合作的领域,实际上在他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日本参与合作的先例了,物流(日通)、工业园区(伊藤忠)等便是其中代表案例。今后,在这些既有的范例之外,日中双方之间能够有何种程度的合作计划出炉,将会成为关注焦点。从我个人角度看,前述的生态文明将会成为关键词。

二、青山瑠妙 教授

安倍政权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释放出积极信号,可以说是中日关系改善的一大转机。如本章所述,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仍然存在支持或反对的不同意见。由此观之,日中两国在“一带一路”构想上的合作动向,会影响到今后日中关系的走向。

专题六:2017 年中日经贸合作的变化与趋势

2017 年,中日经贸关系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两国的贸易投资都重现增长势头,经贸合作呈现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态势。但是,这种较好的发展态势能否持续并更上一个台阶,则面临着严峻挑战。不言而喻这与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趋势有直接关联,特别是日本政府的战略取向对中日经贸关系至关重要。

一、中日经贸合作现状

贸易与投资呈现恢复性增长。2017 年,中日两国经贸合作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双方贸易重获较大幅度的增长,全年贸易额为 302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1%,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 7.4%,时隔多年重上 3000 亿美元台阶。其中,我对日出口 1373.3 亿美元,从日本进口 1656.5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6.1%和 13.7%。日本是我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二是日本对华投资增加,全年新设企业 590 家,同比增长 2.4%,实际使用金额 3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截止 2017 年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设立企业 51006 家,实际使用金额 1081.8 亿美元,是累计利用外资的最大来源国。三是经济合作保持增长态势。2017 年,我对日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5426 万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主要投资领域是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和能源矿产等。我企业在日本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金额 3.38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3.28 亿美元。我向日本新派出技能实习生 38670 人,同比增长 5.8%,主要分布在日本中小企业,涉及制造业、农林牧渔和建筑业等。截止 2017 年年底,我对日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为 34.8 亿美元;承包工程累计新签合同金额 40.6 亿美元,累计完成营业额 41.6 亿美元;我国在日技能实习生总数 14.3 万人,占我在外劳务人员总数的 23.8%,日本一直是我国重要的海外劳务市场。

两国交往及友好活动频繁。2017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5 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会议期间,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了高峰论坛,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转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笔信,希望以日中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为契机,秉承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理念,构建稳定友好的日中关系。9 月,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纪念招待会分别在北京和东京举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等以及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等人出席北京招待会并致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在东京的招待会并致辞。11 月 20 日,由日中经济协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组成的日本经济界代表团访问中国,此次访问汇集了众多日本知名企业家和高管,并创下 250 人规模之最。访华团希望寻求两国经贸领域合作新机遇,表明了日本经济界非常希望继续加强与中国的联系,推动中日经贸合作恢复并不断获得新的发展。

此外,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举办的研讨会以及为促进中日两国更多领域开展合作所举办的各种交流会、推介会等活动也不断增加,显示中日两国友好合作的气氛不断升温。

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两国关系呈现积极向好的迹象,特别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要改善中日关系。但是,中日两国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仍不容忽视。

一是政治互信欠缺制约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自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中国实

行改革开放以来,两国经贸合作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好的“蜜月期”,其后,两国经贸合作虽取得很大发展,但双方的经贸合作潜力仍受制约。可以说,良好的政治互信是中日两国经贸合作始终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但是,2012年日本“购岛事件”严重冲击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破坏了两国经贸合作的基础。尽管中国政府一直积极努力改善中日关系,但日本政府的做法并未创造促使两国关系好转的氛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当中日两国关系开始出现向好的迹象时,日本国内总是会出现干扰破坏两国良好氛围的事件发生,中日经贸关系必然受到影响。2017年,日本又向中国政府表示希望改善关系,促进中日经济合作,但以往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反复令人比较担忧,如何建立并保持两国的良好政治互信对两国未来经贸合作的发展非常重要。

二是中日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没有取得进展。2017年,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逆全球化思潮上升,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退出 TPP 后,令世界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未来疑虑重重。区域经济合作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无论是启动多年的中日韩 FTA 谈判,还是作为重要参与国的 RCEP,中日两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和突破性进展。其原因既有中国基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谨慎开放的结果,更重要的还是日本抬高了签署自贸协定的要价。而日本这种高要价无助于谈判取得进展,也不利于日本自身的发展。

三是日本构建“势力范围”意图非常明显。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增强,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这也是日本最终同意加入美国主导的 TPP 的原因所在。但是,美国 2017 年突然退出 TPP 重创日本战略构想,且这种高标准自贸协定一旦解体,单凭日本的力量短期内根本无法重聚这些国家开始谈判一个新的高水平自贸区。为此,日本积极承担起“主导”责任,极力劝说游说其他 10 国,在保持 TPP 协定主要内容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照顾到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诉求,有限冻结部分原 TPP 协定内容,实现了首次在亚太地区建立大型高标准自贸区的梦想,这是日本将高标准扩展到亚太地区迈出的重要一步。通过建立高标准的 CPTPP,日本自认为在争夺东亚地区主导权方面占得先机,更重要的是高标准的 CPTPP 为其他国家加入设定了“门槛”,而一旦美国重新加入,将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大型自贸区,中国则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此外,如何避免中日两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相互竞争导致两败俱伤也是面临的挑战,如中国高铁与日本新干线在东南亚以及南亚地区的竞争,受损的是中日企业,获益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而中日之间曾多次强调要加强合作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场,因此,如何加强中日企业合作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场是两国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展望

2018 年是中日签订友好条约 40 周年,可以说友好条约的签署对深化两国经贸合作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 年 12 月 19 日,安倍晋三在东京发表演讲时表示,将以明年(2018 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为契机,推动日中高层加深交流,将日中关系提升至一个新高度。从日本领导人的表态看,两国关系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中日关系,一直希望中日两国关系能够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但是近年来,日本政府的言行不一或出尔反尔不断损害中日关系,让中国非常失望。因此,建立良好的政治互信仍是中日两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审时度势,构建起中日两国未来友好关系发展的良好预期,逐步重建两国良好的政治互信。在逐步建立良好互信的同时,中日两国可

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有加强合作的空间。

就日本而言,日美同盟建立以后,美国借此牢牢地控制着日本,对日本的影响力非同一般。近来,中美关系趋稳,日本对此比较担心:美国会为实现其自身利益,暂时抛弃日本。因此,日政府内部主张积极恢复并发展中日关系的观点占了上风。2017年日本首相安倍给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就清楚地传递出这种信号。2018年,日本会积极寻求与中国加强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因为毕竟“一带一路”涵盖巨大的新兴市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可为日本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为了更好地顺畅参加“一带一路”建设,加入亚投行就成为日本的选项,因此,日本有可能提出并加入亚投行。就中国而言,日本参加“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发挥两国的各自优势,推动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

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预计中日韩 FTA 谈判和 RCEP 谈判仍将继续进行。不过,由于日本关注点在 CPTPP 且不会降低谈判要价,因此,2018 年中日韩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希望不大。对于 RCEP,中日是否能够加强合作同样不容乐观,但同时因为日本希望改善对华关系,或许在谈判中略降对华要求和标准。

总之,2018 年,中日经贸关系能否获得新的发展,关键看日本的表现。如果日本政府言而有信,在推进中日关系上有实质性的举动,两国关系还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如果日本政府又突如其来的“搞小动作”,则中日经贸关系必然再受影响。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报告书有关经贸合作的部分,很明显是从中国的视角去分析的。例如,“但是,2012 年日本‘购岛事件’严重冲击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破坏了两国经贸合作的基础。尽管中国政府一直积极努力改善中日关系,但日本政府的做法并未创造促使两国关系好转的氛围”等部分就是典型的观点,将两国关系恶化原因完全归因于日方。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当中日两国关系开始出现向好的迹象时,日本国内总是会出现干扰破坏两国良好氛围的事件发生,中日经贸关系必然受到影响。2017 年,日本又向中国政府表示希望改善关系,促进中日经济合作,但以往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反复令人比较担忧,如何建立并保持两国的良好政治互信对两国未来经贸合作的发展非常重要”,但这里具体不清楚 2017 年日本方面的何种行为造成了问题,反倒是表现出了日方明显希望改善关系,而中方的行为却损害了日方的对华感情,妨碍双方关系改善。日中关系既然是两国关系,就必须要从日中双向的观点去分析。

另外,没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就不存在良好的经济关系,本报告书的这一观点或在中国普遍存在。从日方来看,如果小泉政权时期的“政冷经热”的现象是当时中方将政治和经济分开考量的一个证明,可以看到中国逐渐地向“政经一致”靠拢,向着“没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就没有良好的经济关系”论点方向发生变化。又或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提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因此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进而强化政治影响力,要是如此那就是中方自身姿态的变化,难道不是中方对日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吗?就这一点而言,中方有自身的观点和意见,至少对于两国关系,难道不是需要根据双方的认识和观点进行分析吗?

关于区域经济合作,报告书提到“因既有中国基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谨慎开放的结果,更重要的还是日本抬高了签署自贸协定的要价。而日本这种高要价无助于谈判取得进展,也不利于日本自身的发展”,对致力于通过 TPP 将 95%以上关税项目都消除并实现自由化的日

本而言,“自由贸易”所表现的内容是追求相当高程度的自由化,可以理解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也是一种压力。但是在 RCEP 中,日本并没有提出如同 TPP 程度的高要求。并且,这一类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中也存在着过度降低自由化程度的举动。在此意义上来说,中国同日本一样追求比较高的自由化程度。而在日中韩三国的情况下,中国和韩国对日本要求更高的自由化率,对自己则希望适用低一些的自由化率,即希望达成一个不公平的比率。区域经济合作中围绕自由化率的交涉,需要进一步参照交涉现场的情况进行分析。

此外,本报告书中所用的“势力范围”一词略有不妥。确实 CPTPP 与一般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同,实现了贸易高度自由化和高度的规范性。推广这种规范的国家或许会带有一定程度的价值观,但是 CPTPP 并非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同时必须要确认的是,这是一个推广有关关税和经济活动规范的集团,其目的不是形成一个政治性的“势力范围”。

在展望部分,不断重复指出中国希望改善日中关系,却又不断批判不给予中方积极回应的日方,或者说日美同盟的存在造成美国钳制了日本外交等等,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对日的典型分析方式。同时,像“近来,中美关系趋稳,日本对此比较担心”等一类言论,在日本却从未听说。所以,关于“因此,日政府内部主张积极恢复并发展中日关系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一点,也是日本舆论界未曾耳闻的论断。反倒是美国特朗普政权不稳定,对东亚政策不明确,朝鲜局势瞬息万变,这些才可以看作是日本靠拢中国的背景。

并且,“因为毕竟‘一带一路’涵盖巨大的新兴市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可为日本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为了更好地顺畅参加‘一带一路’建设,加入亚投行就成为日本的选项,因此,日本有可能提出并加入亚投行”这类的论断,正如前述,亚投行的投资额在“一带一路”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不过可以看到的是,由于亚投行在同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地掌握国际标准,逐步形成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不同的运作模式。在这种意义上说,亚投行的影响力虽然并不算大,却是适用了国际标准的一个开放的机构,因而日本才应该加入,这样的讨论在日本还是存在的。

二、青山瑠妙 教授

如本章所述,日中两国的关系相对处于比较良好的状态。当然,日中两国出现较大程度的政治对立时,会给经济关系带来不良影响;而相对稳定的经济关系,同时也是支撑两国政治关系的支柱之一。

专题七:2017:“通商 4.0 时代”的日本

2017 年年末辞旧迎新之际,《日本经济新闻》满怀雄心壮志地宣告,全球经贸格局和日本通商政策已经进入了第四个时代。前三个时代分别是战前以邻为壑的壁垒时代、战后由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引领的多边自由主义时代、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逐渐崛起的双边 FTA 时代。所谓的第四个时代,就是“不同地区的数个国家结成‘巨型 FTA’(mega-FTA)的时代”,而日本被认为在其中起到了“主体性作用”。

全球经贸的新一轮跨区域热潮中,一度出现四个代表性的“巨型 F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日本 - 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欧 EP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日本是同时参与上述谈判数量最多的国家。特朗普执政后,美国退出 TPP 并暂停 TTIP 谈判,一时风云突变,但对于日本而言,

2017 年却是“巨型 FTA”的丰收之年,TPP(11)和日欧 EPA 相继取得重大的阶段性进展,这也成为日本经济外交在“通商 4.0 时代”的最大热点和亮点。

一、主导与引领

TPP 的“起死回生”,不无日本的苦心经营。2017 年 11 月 11 日,除美国之外的 11 个 TPP 成员国宣布“已经就新的协议达成了基础性的重要共识”,决定将 TPP 更名为“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8 年 1 月,在日本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后,原有四个领域的残存问题得到解决,这为 3 月 8 日在智利举行签字仪式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美国退出 TPP 之后,其他各方经历了接近一年的忧虑和彷徨。2017 年 5 月的部长级会议之后,共召开了 5 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7 月以后,日本在这一会晤机制中逐渐扮演起首要的推动者角色,主办了后续 4 次会议中的 3 次。CPTPP 的诞生,也由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茂木敏充与东道国越南的工商部长作为共同议长一同宣布。对于日本而言,第一次在如此重要的多边协定中坚定立场、多方协调且终成正果,日本也仿佛从传统的外压“受动者”变身为“施动者”。上述进程反映了各国对自由贸易秩序的高度依赖和期待,不愿轻易放弃 TPP 力图塑造的地区秩序。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淡出亚太多边经济合作的背景下,日本等国有意拓展自身在区域经济秩序中的自主表现、进取意识和战略空间。

当然,引领并非领导,更非主导。美国的缺位使 TPP 这一“巨型 FTA”缺乏真正的“领袖”。日本等国有意领导,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值得庆幸的是,各方终于利用 TPP 的巨大惯性,在日渐收拢的窗口期内完成了决定性的一步。

按照修改后的协议条款,CPTPP 的 11 国中只要有至少 6 个国家完成国内立法批准程序,在 60 天之后即可生效。原 TPP 生效条款中关于成员国 GDP 的门槛要求(85%)已不复存在。日本与新西兰已经率先完成了关于 TPP 的国会认可程序,在 CPTPP 的立法中也有望继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乐观估计,CPTPP 将在 2019 年正式生效。

二、先进与渐进

无论是中文还是日文都将 CPTPP 的新附前缀译为“全面且先进的”,意在突出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政府采购的无差别待遇、争端解决机制等高标准特质。回想起 TPP 诞生之初无数雄心勃勃的修饰词,更鉴于两者的相差无几,CPTPP 似乎并无必要“画蛇添足”般再作自我标榜。或许,11 国只是想通过新的命名与原有的 TPP 及其一直以来饱受批评和质疑拉开一些距离。

尽管冻结的候选条款据传一度达到近 80 项,但 CPTPP 的新架构共识将保留超过 95% 的原 TPP 项目,仅搁置其中的 22 项条款,大部分与著作权保护期、药品临床试验数据保护期等知识产权议题有关,最具争议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条款亦位列其中。TPP 的原有文本超过 8000 页,涉及愈千个项目,22 项目与之相比,确实难言变动巨大。谓之“先进”或无疑议。

更重要的是,这些条款的冻结,使 CPTPP 在保持“先进”状态的同时又具备了“渐进”的特征,而这或许也是与 TPP 相比最大的区别。一方面,其部长级声明强调,“CPTPP 在坚持高标准、总体平衡和 TPP 完整性的同时,确保所有参与方的商业和其他利益,保留规制的固有权利,包括在设定立法和规制优先事项上参与方的灵活性”。这种在较高水平的平台上谋求循序渐进的姿态对于获得参与国的国内广泛认同、乃至吸引和争取更多的后续成员不无裨益。美国的退出客观上也使部分国家在一些特殊议题上有了更大的缓冲空间和更多的调整时

间。另一方面,冻结并非修改,更非删除,意味着静待美国重返。因此,日本国内多将 CPTPP 称为“TPP11”。当然,美国的重返与议题的解冻之间存在着一个棘手的悖论:这些暂时冻结的议题的争议焦点本就源于美国,而如果美国重返 TPP,甚至提出更高的要价,那么对于其他 11 个成员来说无疑将是新的更大挑战。

三、形象与实利

经过近四年的谈判,日欧 EPA 于 2017 年 7 月 6 日达成框架共识,于 12 月 8 日正式结束谈判,有望在 2018 年签字并于 2019 年生效。2017 年 2 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也就设立“日美经济对话”达成了共识。随着 CPTPP 和日欧 EPA 谈判的相继结束,在国际经贸机制化建设和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日本正处于史无前例的有利地位,展示出一马当先的形象。无怪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施政演说中呼吁,日本要“继续作为自由贸易的旗手,将基于自由公正规则的 21 世纪型的经济秩序推广至世界”。

这些“巨型 FTA”为日本带来的并非只有虚名。根据日本政府的测算,CPTPP 对其实际 GDP 的收益尽管比 TPP 减少了四成,但仍将达到 7.8 万亿日元,并增加 46 万人的就业,而日欧 EPA 预计也将带来 5.2 万亿日元的经济提振。在 CPTPP 中,日本的 GDP 超过 40%,位列最大的经济体。对于日本而言,尽管 CPTPP 中新的 FTA 伙伴只有加拿大和新西兰,两者合计仅占日本贸易的 1.8%,但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市场仍值得期待,特别是其零售流通、银行、电信、娱乐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将为日本企业带来巨大商机。鉴于美国退出后 CPTPP 在体量上的骤减,其重要意义更体现在规则体系上。或许也正因如此,在从 TPP 向 CPTPP 的转型过程中,日本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市场开放决心和政策改革魄力,冻结条款和重新谈判的议题中几无日本的身影,特别是农林水产的所谓“圣域”并未乘机卷土重来,颇具示范意义。

借助 CPTPP 的东风,日本政府提出了更为远大的目标。2017 年 11 月 25 日公布的《与 TPP 等相关的综合政策大纲》提出,要以 CPTPP 和日欧 EPA 为契机,将日本建设成为“新的出口大国”,“强化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开创“农政新时代”。其中,到 2019 年度要实现一万亿日元的农林水产品 and 食品出口,到 2020 年要实现约 30 万亿日元的基础设施标的金额。根据《产经新闻》2018 年 1 月对日本企业所作的问卷调查,高达 75%的受访企业认为 CPTPP 有助于日本经济。当然,在市场开放和国内改革的进程中,日本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TPP 中日本的自由化率在工业制成品上为 100%,在农产品上却仅为 81%左右,要想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真正引领者仍任重道远。

四、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对 TPP 潜在福利效应的量化研究曾纷纷指出,TPP 在中短期内对中国贸易和整体经济的冲击有限,美国缺位后的 CPTPP 更是如此。尽管如此,大量保留在 CPTPP 中的规则仍带有强烈的“美式印记”。这些规则条款既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某种借鉴和启示,也在无形中对 中国施加了巨大的政策压力。

上述规则影响将突出地表现在 RCEP 谈判上。一方面,安倍政府提出,到 2018 年与 FTA 伙伴国的贸易要占其贸易总额的 70%。2016 年 TPP 签署之后,日本的这一比例一度达到 39.5%。但由于美国的退出,即便 CPTPP 付诸实践,日本离这一目标数值仍相距甚远。毋庸置疑,唯有中日韩 FTA 和 RCEP 的实现才能弥补剩余的缺口。这与 TPP 并不矛盾,甚至在一定意义上,RCEP 越早成功,对于美国企业的不利影响就越大,其力促美国政府在 TPP 问题上改弦易辙的压力也就与日俱增。这甚至让人想起一个并不遥远的历史类比:或许只有像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货币基金”等把美国“踢出去”的倡议,才能把美国“拉回来”。另一方面,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一直期待 RCEP 能够以 TPP 为榜样,提高规则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 RCEP 的雄心水平,但也进一步增加了其谈判难度和悬而未决的风险。如何真正处理好“先进”与“渐进”的关系,仍将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命题和挑战。

2017 年是否宣告“日本开启了新的经济外交的大幕”、是否真正代表着“通商 4.0 时代”的发轫之年,历史将给出答案。但将其视为日本经济外交的收获之年或许并不为过。平心而论,受制于农业等国内特殊部门利益,日本在既有的区域贸易一体化中往往表现出一种内视、谨慎乃至保守的形象,在多边层次的贸易自由化中也鲜有独到的倡议和实践,对此,日本自身也并不讳言。但 2017 年的有所作为和巨大收获,使日本一改往日的形象。在“美国第一”和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的背景下,CPTPP 和日欧 EPA 的达成无不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其他进行中的 FTA 谈判乃至面临困境的经济全球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和提振作用。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本报告书恰当梳理了从美国退出 TPP 到 CPTPP 形成的过程,并且比较了 TPP 和 CPTPP 的不同。特别指出了从 TPP 到 CPTPP 的过程实际上是自由化程度下降的过程,基本上是因为将美国过去要求的自由化部分删除所致,日方也能够理解这一点。同时,在报告书中提出了自由化程度在 95%以上和追求高自由化率两个 TPP 的特征,不仅如此,TPP 有很多对国内各种制度的规则设定、规范性很强的一点也是 TPP 的特征。

另外,报告书确实把握住了有关达成 CPTPP、日欧 EPA 以及日本 FTA 的整体构想。但是,对于 RCEP 则提到“另一方面,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一直期待 RCEP 能够以 TPP 为榜样,提高规则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又是从何说起呢?报告书从整体上看,对于日本的 RCEP 政策都是持批判性的,并且认为日本想要将 CPTPP 的规范搬到 RCEP 中来,对于这一点必须要有更为慎重的判断。例如从外务省中负责经济合作工作的经济担当审议官山崎和之近来的发言看,正在酝酿中的日中韩 FTA 将会维持一个比 RCEP 更高的自由化率。如果日本有对 RCEP 采用 CPTPP 相同程度自由化率的意图的话,山崎和之的发言根本不可能出现。日本确实批判 RCEP 的自由化度过于低下。另外在交涉阶段日本也有可能以 CPTPP 为模板提案。但是,印度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所追求的自由化程度极低。从这一点上来看,可以认为最终预估结果肯定不在 95%左右的水平。

同时,对报告书提到的“在‘美国第一’和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的背景下,CPTPP 和日欧 EPA 的达成无不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其他进行中的 FTA 谈判乃至面临困境的经济全球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和提振作用”。对此,我大部分表示赞同。希望日中韩 FTA 也同样能够深入讨论有关今后世界经济的未来理想状态,缔结自由化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协定。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章以 CPTPP 和日欧 EPA 为中心,重点分析了日本的经济合作动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没有美国参加的 CPTPP 而言,其影响力虽然还难以断定,但是对于 RCEP 的影响,却是比较大的。本章内容跟主题六具有关联性,中日两国对巨型 FTA 的立场如何协调和接近,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事项。

专题八：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日本对华认知的重启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日关系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第十二部分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题，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同时，在本次大会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被写进党章。2018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被写入宪法序言中。这是继被写入党章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上升到国家顶层制度设计高度，凸显举党、举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出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新路径。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突然生成或无中生有的一个概念，它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充实并水到渠成的一种理念。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开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谋篇布局。中国自十八大以来在对外政策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显然离不开这一理念的指导。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从本质上来讲都是着眼于包括中国在内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关怀而做出的战略决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

其实，在日本也并非没有类似的共同体理念，中日两国在地缘上接近、文化上亲近，不乏贤人志士力推“东亚共同体”等理念。在共同体的理论建设领域，中日两国本可以有更多的合作空间，但都因为日本右翼政客的对华偏颇认知或国内政治原因无果而终。中日关系在领土主权以及历史认识等问题上存在争端，但是中国一直以来都本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合作共赢”的理念，在对日政策上向着积极的方向引导。

2014年11月，中日两国就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为处于低谷的中日关系打开了机会窗口。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直都向日本敞开大门。

2017年的中日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转机，这些转机表现在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面，以及日本对华释放善意信号等领域。当然在笔者看来日本对华认知的变化或许更能够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强大生命力。

二、“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巧合的是，大约与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同期的2017年10月，《新闻周刊》(Newsweek)日文版刊登了记者高口康太的一篇名为《“中国崩溃论”崩溃的倒计时》(中国崩壊本の崩壊カウントダウン)的文章。作者写作这篇文章显然是意识到“中国崩溃论”预测的无逻辑性和无章法性，同时也直接批评了日本国内那些所谓“中国通”对中国崩溃的“科学判断”。

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该文作者的着眼点在于日本国内对中国经济走势预测发生的偏差(比如中国的失业率、经济增长率、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等)，但是不经意间从整体上给“中国崩溃论”的言说空间带来不小的打击。该文出版后，一些以“中国崩溃论”而闻名的评论家

们纷纷澄清自己从来都没有使用过“中国崩溃”云云,似乎一切都是出版社为了噱头而擅自使用的题目。但不容否定的是,在这些评论家们的愿望思维里面,毫无疑问是希望“中国崩溃”的,而且他们也认为潜在的读者群里面(据统计,196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日本人是主要阅读对象,这些人直接经历了19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又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萧条以及在此期间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并且实现对日本的赶超)也是希望看到诸如“中国崩溃”之类著作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应然式的结果,即“中国崩溃论”肯定在日本有市场。

不幸的是,这些“中国崩溃论”的作者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并不懂中文,对中国也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通过二手资料或者道听途说嫁接过来,以畅销书的名义摆在书店案头,这就基本实现了“中国崩溃论”从生产到销售以及最终印刻在日本人潜意识里的全过程。全程没有对中国的直接接触,就完成了一次“中国崩溃论”流水线创作,省时、省力、省成本,作者同意、出版社授意、书店乐意、读者愿意,“中国崩溃论”的言说空间就这样被塑造起来。

类似“中国崩溃论”之崩溃的讨论不仅限于普通大众消费群体,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已经有学者意识到“中国威胁论”的界限。近些年在日本国内被讨论最多的就是中国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中国,而不被中日关系的大环境所影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学者可以有个人取向和价值偏好,在研究中做到价值中立显然是很困难的,但是也要有积极澄清或者直面揭穿“中国威胁论”的勇气。显然,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随波逐流的是大多数。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应运而生,打破了既有的沉闷状态,给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新鲜的素材,也在某种程度上促生了中国论的认知重启甚至范式转移。

三、中国论的认知重启何以可能?

改变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对其他国家的固有认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需要从政府到民间、从学术界到舆论界的多重努力。对于日本而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契机,十分有必要改变“中国崩溃论”的定势思维,实现对华认知的重启,究其原因或许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中国崩溃论”不利于日本正确地认知中国。在2017年,日本舆论界针对“中国崩溃论”已经做了相当多的批评,这些批评的着眼点是认为“中国崩溃论”的蛊惑导致了日本对中国的战略误判。如果长期沉浸在“中国崩溃论”或者说“坐等中国崩溃”的虚拟现实空间里,显然不利于日本制定出更加积极的对华政策。日本应该意识到这种夸大其词的认知并没有给其带来实在的利益。

其次,“中国崩溃论”不利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推进。中国学(Sinology)是一门基础的、实际的学问,但是在“中国威胁论”的舆论空间下,中国学慢慢地从一种具有历史传统的学问便成为了一种应用性的观察对象(China Watcher),而且这种观察往往还交织着偏见。中国确实有着中国自己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需要日本的中国学界理性而客观的批判,而不是用一种近似于普适性的话语去定性。

第三,“中国崩溃论”不利于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当前,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出现了转机,高层接触较之前频繁,特别是日本政府对华的态度上开始往积极的方向转移。日本政府的这一态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日本的舆论以及日本民众。例如,自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积极态度之后,日本国内舆论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也开始变得积极。笔者粗略统计《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代表性报纸的相关报道,发现更加客观和积极报道“一带一路”的内容逐渐增加。导致这一积极趋势发生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日本政府

的积极态度,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坚定信念以及取得的一系列积极效果。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也需要锐意进取。“中国崩溃论”的作者们是看到了中国内部的短板而大做文章从而渲染中国崩溃的,而中国需要做的是以实际的成绩来消弭掉“中国崩溃论”的杂音。通过与日俱增的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来证明“中国崩溃论”是一个不攻自破的流言。“中国崩溃论”得以除魅,那么中日关系改善也为期不远。

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理念,要求中国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同日本的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双边关系框架,同时也要求中国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日本的交流与合作。对于中国在对日政策领域释放的善意,日本其实也需要放弃诸如“崩溃论”等僵化思维认知,实现对华认知的重启。

2018年能否成为日本国内对华认知重启的元年,我们拭目以待。

◆日方学者点评

川岛真 教授

这一部分认为,分析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日本的关系,会变成分析日本对华认识的问题。事实确实如此,从中国角度看确实会对日本国内轻易就流传开来的“中国崩溃论”感到担忧。“不幸的是,这些‘中国威胁论’的作者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并不懂中文,对中国也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通过二手资料或者道听途说嫁接过来,以畅销书的名义摆在书店案头,这就基本实现了‘中国威胁论’从生产到销售以及最终印刻在日本人潜意识里的全过程。全程没有对中国的直接接触,就完成了一次‘中国威胁论’流水线创作,省时、省力、省成本,作者同意、出版社授意、书店乐意、读者愿意,‘中国威胁论’的言说空间就这样被塑造起来”这一部分,同意之处颇多。

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和发出这种言论的评论家完全不是同一类人,并且日本本身在二战之前就存在 China Watcher 式的现代中国评论家,他们与学术上的“中国学(Sinology)”是不同的。China Watcher 并非是负面概念,他们是现状分析的专家们,这批人有不少都懂得如何使用中文并且深入地参与到了实务现场。但是,现在刻画“中国威胁论”或者“中国崩溃论”的并非是 China Watcher。中国正在不断壮大,已经在中国研究学者触手不及的地方被讨论着,成为了“一般性”的讨论对象。“中国论”已经不属于中国研究学者。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们也担心,中国研究学者之外的日本社会上的人所描绘的“新的中国论”在不断蔓延,一部分中国研究学者用言论对此坚决回击,其他人则选择与社会上的中国相关言论保持距离。这种现象,如本报告书中所提及内容一样,或许从中国也能察觉到。

同时,在这里要提出两点问题。

第一、报告书中提到中国崩溃论的读者主要是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人等等,即使所浏览的杂志确实如此,但也不应该轻易地预测持中国崩溃论观点的人就是在这一代人中。泡沫经济崩溃时,这一代人还是学生或者至多是刚刚踏入职场的人群。报告书提到“这些人直接经历了 1990 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又经历了长达 20 年的经济萧条以及在此期间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并且实现对日本的赶超”,但是“失去的 20 年”的受害者反倒是这一代人之后的一代人,即上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所谓“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在中国崛起的过

程中,无法获得正式职位的是迷惘的一代和稍晚于他们的一代人。上世纪 60 年代的人反而能够安定地从事工作,是“幸运”的一代人。

第二、如前所述,“中国威胁论”的言说空间被不懂中文、对中国并没有深入研究的人塑造起来,如果把日本换成是中国,又会如何呢?

“不幸的是,这些‘日本崩溃论’的作者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并不懂日文,对日本也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通过二手资料或者道听途说嫁接过来,以畅销书的名义摆在书店案头,这就基本实现了‘日本崩溃论’从生产到销售以及最终印刻在中国人潜意识里的全过程。全程没有对日本的直接接触,就完成了一次‘日本崩溃论’流水线创作,省时、省力、省成本,作者同意、出版社授意、书店乐意、读者愿意,‘日本崩溃论’的言说空间就这样被塑造起来。”

希望在中国不会出现如此情形。

附 录

(一)课题组成员简介与分工:

胡令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文化·文明与国际政治;课题组协调人、总论、统稿。

川岛 真:东京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国际政治;课题组协调人,总论、统稿。

臧志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日本政治、中日关系;总论,统稿。

田岛英一: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中国政治。

青山瑠妙:早稻田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中国外交。

冯 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日本历史、中日关系;专题一。

汪鸿祥:创价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日本政治;专题二。

江新风: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日本安全保障、中日关系;专题三。

高 兰: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日本外交、中日关系;专题四。

包霞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日本外交、中日关系;专题五。

宋志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中日经贸关系、日本经济;专题六。

贺 平: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合作;专题七。

王广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研究领域:日本政治外交;专题八。

(二)几点说明

1、本报告书及《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多层面和中长期战略的视角》、《中日关系:2015》、《中日关系:2016——低位徘徊与嬗变》的版权属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2、以上及今后的年度报告书(包括日文版)均登载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jsc.fudan.edu.cn>)。

3、如有引用,请务必注明出处。

4、本报告书日方学者的点评系由日语撰写,川岛真教授所撰部分由徐伟信翻译,田岛英一教授与青山瑠妙教授所撰部分均由王广涛翻译。

5、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服务中心陶轶烁主任、课题组秘书王广涛副研究员参与了本课题报告的统筹。

6、对报告书如有垂询,请与课题组负责人胡令远教授联系:lyh@fudan.edu.cn.

注 释:

①「歴代の大臣・副大臣・政務官」(総務省ウェブサイト、http://www.soumu.go.jp/menu_sosiki/an-

nai/soshiki/rekidai.html)

- ②「日本再興戦略」(详见首相官邸网站,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kettei.html>)
- ③『我が国の防衛と予算——平成 30 年度予算の概要』, <http://www.mod.go.jp/j/yosan/2018/yosan.pdf>。
- ④『我が国の防衛と予算——平成 29 年度予算の概要』, <http://www.mod.go.jp/j/yosan/2017/yosan.pdf>。
- ⑤『我が国の防衛と予算(案)——平成 30 年度予算の概要』, <http://www.mod.go.jp/j/yosan/2018/yosanan.pdf>。
- ⑥《日本新设太空和网络司令部:网络部队或扩大 10 倍》,参考消息网,2017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 ⑦防衛省『平成 29 年版防衛白書日本の防衛』防衛省、2017 年、342 頁。
- ⑧防衛省『平成 29 年版防衛白書日本の防衛』防衛省、2017 年、344 頁;『我が国の防衛と予算(案)——平成 30 年度予算の概要』, <http://www.mod.go.jp/j/yosan/2018/yosanan.pdf>。
- ⑨防衛省『平成 29 年版防衛白書日本の防衛』防衛省、2017 年、340 頁。
- ⑩《加强战斗机紧急起飞应对中国》,共同通信,2017 年 2 月 26 日。
- ⑪日本首相官邸,内閣府総合海洋政策推進事務局,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annual/H29/H29_cover.pdf。
- ⑫『『一帯一路』協力へ指針政府、対中関係改善狙う』『日本経済新聞』朝刊、2017 年 12 月 6 日。

(复旦大学中日关系(年度)战略报告书课题组)

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研究

梅冠群

内容提要 日本是对“一带一路”较为消极和抵制的国家之一,通过拒绝加入亚投行、推动TPP和CPTPP、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开展印日“亚非增长走廊”建设、打造美日印澳四国同盟等手段,对“一带一路”进行遏制、围堵、抗衡、竞争。其深层次原因既有看到中国快速崛起心态失衡、担忧在地缘格局和地区经济合作中被边缘化的内部因素,也有受美国影响、在对华战略上向美国看齐的外部因素。针对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行为,要坚持两手施策:一方面要抓住目前日本释放出的对华友好信号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契机,创造机会深化中日合作,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争取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化;另一方面,努力破解美日印澳四国同盟,打破日本抗衡“一带一路”的主要筹码,增强对日战略博弈能力,倒逼日本转变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做法。

关键词 日本 “一带一路” 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 亚非增长走廊 中日关系

一、日本对“一带一路”的基本态度

2013年下半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引发全球热烈反响,很多国家公开表示愿意积极加入。但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与各国截然相反,表现十分消极,不仅对“一带一路”报以质疑、反对,甚至千方百计阻挠、诋毁,可以说是全球各国中对“一带一路”最为消极抵触的国家之一。

(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日本态度总体十分消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日本政界、学界及媒体均表现出疑虑、反对、担忧甚至唱衰、诋毁的态度,对“一带一路”多有品头论足、负面质疑的消极心态,少有积极、开放、包容的正面言行。综合日本学者、媒体等各方信息来看,对“一带一路”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①

一是认为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与日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相似,正在从出口加工的经济结构逐渐转向“走出去”,“一带一路”是“走出去”的一种新形式,中国“走出去”的资金、产能、企业将与日本开展海外市场的争夺,特别是将冲击日本在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二是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中国正在通过基础设施对外援助等方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培育需求市场,建立生产基地,通过“一带一路”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大欧亚经济圈,而日本将在这一经济圈中处于边缘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将被越拉越大。

三是认为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抢购全球能源,中国“两头在外”的经济结构和有限的资源能源储备,决定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获取来自全球的能源供给,“一带一路”暗含全球

能源的抢夺计划,日本能源供应也高度依赖海外,未来将与中国形成竞争。

四是认为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突破美日在亚洲构筑的安全格局。“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经济扩张计划,也是一项系统的地缘战略,是为了和美国重返亚太、TPP、美日同盟相抗衡。日本认为,“一带一路”将构筑起包括欧亚大陆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内的“非民主国家大联盟”,是针对日本一直以来努力倡导的“价值观外交”的对抗性战略。

五是认为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重建“朝贡体系”。日本认为,中国所倡导并努力实现的“伟大复兴”实质是复兴历史上的“中华帝国”,要建立起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各国为其政治附属国的“朝贡体系”,将各发展中国家乃至日本纳入到中国的政治羽翼下来,“一带一路”是实现该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

此外,还有一些声音认为“一带一路”和日本并无关系,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名义上称日本为东方起点或终点,但实际上日本参与的并不多。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风险巨大,沿线政治复杂、法治观念淡薄、安全环境恶劣,日本完全没有必要参与其中。

(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后,日本态度有一定转变,但诚意仍然不足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由于美国对“一带一路”开始转向积极,并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加此次峰会,日本见状也迅速调整方针,派出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峰会,对“一带一路”态度较之前出现明显改观,显示出松动迹象。二阶俊博作为领队显示出安倍政府的“良苦用心”:一方面二阶作为自民党干事长,级别较高,且一直对华友好,派其参会能够释放出对华善意,为日后可能参与“一带一路”埋下伏笔,缓解之前安倍政府一直拒绝“一带一路”的尴尬,若出访成功安倍作为首相和自民党总裁可分其功;另一方面,安倍和二阶分属自民党内不同派系,如日后加入“一带一路”失败或遭右翼势力批评,安倍也可将责任甩给二阶。由于日本在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峰会上追随美国态度,看到美国决定派队参加而照样行事,非积极主动,在领队人选上又有双重考虑,因此尽管安倍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会,但显示出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诚意仍然不足。

“一带一路”峰会后,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向积极方向进一步转变。2017年6月5日,在东京举行的“亚洲的未来”会议上,安倍公开表示,若条件成熟,日本将同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这是安倍首次对“一带一路”给予公开积极表态。^②9月28日,安倍出席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在致辞中表示愿与中国改善关系和开展“一带一路”合作。^③11月4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倍公开表示,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将深化中日交流,把中日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并期待“一带一路”建设能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日本希望同中方进行合作。^④12月4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日本经团联共同举办的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会(中日“二轨”对话会)上,安倍出席并表示“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下,也可以与倡导‘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国大力合作”。^⑤目前为止,安倍释放了对“一带一路”的一些暖场信号,但有关表态均是口头上的,未提出合作方针和领域,而且表示日本参加“一带一路”都是有条件的,如必须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下”等等,尚未看出十足诚意。

二、日本针对“一带一路”采取的主要做法

从实际行为上看,日本对待“一带一路”态度消极。一方面拒绝参与亚投行,并提出与“一

带一路”针锋相对的“亚洲基础设施伙伴计划”等战略,与“一带一路”开展竞争,另一方面与美印等其他大国开展战略合作,提升对华博弈能力。对“一带一路”总体上以围堵、遏制、抗衡、竞争为主。

(一)拒绝加入亚投行,担忧日本所主导的亚开行遭受冲击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东南亚并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一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面向全球正式发出了共建亚投行的倡议。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世界很多国家的广泛响应和高度认可。但日本对亚投行一直明确抵制,拒不参加,原因有三:一是美国拒绝参加亚投行,并号召其盟友一同对亚投行进行抵制,日本政治上向美国看齐;二是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领域一直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负责,日本担心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与亚开行开展竞争,削弱日本在该领域的主导力和话语权;三是心态失衡,日本一直认为自己是东亚地区的领头羊国家,具有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能力,但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不但在经济规模上将日本远远超越,而且也开始涉足和主导国际规则和地区规则的制定,在亚投行筹建问题上就是中国主导规则的一次尝试,日本对此难以习惯。日本原本对亚投行发展并不看好,不断批评亚投行是中国政府主导的、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运作不透明、会出现大量腐败等等,但看到亚投行已有80多个成员国,特别是英、法、德、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等美国传统盟友均纷纷加入后,且亚投行已完全实现国际化、标准化、透明化、高标准运营,并得到穆迪、惠誉、标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最高信用评级,日本国内各界也表现出后悔和反思的态度。目前日本国内对亚投行的批评之声已大大减少,转而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加入亚投行中,态度出现一定变化,但日本究竟是否启动、何时启动加入亚投行程序仍不明朗。

(二)积极推动 TPP 和 CPTPP,与“一带一路”相抗衡

日本国内一直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针对美国亚太再平衡和 TPP 的战略设计,在经济领域,“一带一路”瞄准的战略对手是 TPP,因此抗衡“一带一路”的主要策略也就在于推动 TPP 谈成和落地。在奥巴马任期内,日本就是 TPP 的重要推动者,尽管在一些条款上与美国存在争议,但总体上对 TPP 持积极认可态度。特朗普竞选成功后,高调表态要废除 TPP,安倍政府对此十分紧张,不断通过多种方式向特朗普游说,希望改变其看法。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份行政命令就是废除 TPP,在一情况下,日本擎起了 TPP 大旗,取代美国扮演起了 TPP 牵头推动者的角色。日本团结除美国外的其他 10 个 TPP 成员国,开展 CPTPP(全面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谈判。目前 CPTPP 已发布并通过了最终版本,该版本以原 TPP 协定为蓝本,除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药品知识产权等 20 项条款被暂时搁置或修改外,其余基本延续原 TPP 方案。尽管 CPTPP 不包括美国,经济总量仅占全球的 15%,国际影响力大大缩减,但却依然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贸合作协定。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CPTPP 未来会继续将中国排除在外,日本意欲打造一个由其主导、整合太平洋沿岸部分国家、抗衡“一带一路”串联起欧亚大陆国家的意图十分明显。

(三)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与“一带一路”开展针锋相对的竞争

2015年5月,日本政府提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伙伴计划”,宣布在之后五年向亚洲各国提供 1100 亿美元援助,用于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其所谓的“基础设施”,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铁路、公路、能源等硬基础设施,还包括人才培养、文化交流、法治建设等软基础设施,

与“一带一路”所强调的“五通”内涵接近。其所谓的“高质量”，是指建设项目要重视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债务可持续、劳工权利等方面的问题，实质上想影射中国基础设施项目“质量不高”，使各国不被中国低价竞标方案所“诱惑”。由于日本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成本已难以与中国竞争，因此必须在该计划的名称中加入“高质量”字样，以掩饰成本劣势。其所谓的“伙伴”，主要面向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但其他的亚洲国家乃至非洲、美洲国家也可包括在内，体现出该计划是一个全球性计划，与“一带一路”沿线范围有大量交叉。该计划资金来源主要是日本开发性资金、政策性资金和对外援助，亚开行、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国际协力银行(JBIC)是主要实施机构。目前该计划已经参与支持了印度工业走廊、菲律宾马尼拉铁路、泰国曼谷城市铁路、越南岘港改造、印尼爪哇铁路、缅甸东西走廊、柬埔寨国道系统、老挝万象供水系统、越南胡志明市地铁和火电站等一批重要项目建设。该计划的建设内容、覆盖范围、战略目标、资金使用方式均与“一带一路”高度相似，其真实目的正是为了与“一带一路”开展竞争。

(四)与印度共同推进“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对“一带一路”形成牵制

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结束几天后，2017年5月23日，非洲开发银行年会在印度总理莫迪的老家古吉拉特邦举行，莫迪在会上发表演讲，对外高调提出了“亚非增长走廊”计划(AAGC)，宣称该计划将让亚非国家形成一体化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联盟，形成西方式的、民主的、自由的经济架构。^⑥该计划包括发展与合作项目、高质量基础设施和机构连接、能力和技能的提高、人与人的伙伴关系四个主要方面，同时还包括三个具体目标：一是以基建为动力，推动印日在非洲的经济扩张；二是在亚非合作的大框架下实现非洲与印度洋地区的融合；三是按照印日在2015年提出的“印度—太平洋2025发展愿景”，塑造以自由和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印度—太平洋秩序，实现非洲、印度洋、南亚、东南亚、东亚以及南太平洋的互联互通。印度在缺席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的几天后就提出这一计划，其用意明显是针对“一带一路”，而这一计划也得到了日本的高度认可，与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用意不谋而合。2017年9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访印，公开表示日本将和印度一道共同推进AAGC建设。据印度智库“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RIS)发布信息称，甚至早在2016年11月时，莫迪与安倍就形成了共建AAGC的想法，RIS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共同编写了AAGC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其中日本计划为AAGC投资300亿美元，投资期3年，印度计划为AAGC投资100亿美元，投资期5年。^⑦“一带一路”涉及东南亚、南亚、东非，这些都是印日两国的敏感地区，印日十分担忧中国影响力在该地区的加深和巩固。通过“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印日两国将共同的担心凝聚成共同的行动，将各自应对“一带一路”的乏力凝结成共同发挥牵制作用的合力，以求针对“一带一路”发挥更强有力的制衡作用。

(五)推进美日印澳四国同盟，通过“价值观外交”拼凑对华战略包围圈

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础，日本地处中美战略博弈和交锋的前沿地带，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日本坚定站在美国阵营，与美国保持战略一致。对待“一带一路”，日本积极实施一直以来力推的“价值观外交”，努力构建美日印澳四国同盟，意图以四国同盟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封锁“一带一路”。

“价值观外交”的理念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1992年日本修改《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时就提出要对日本的对外援助战略进行重大调整，要着重援助导入民主化和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家，体现出鲜明的价值观色彩。在小泉时代，日本就有意使用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字眼来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分开，其用意在于利用这些虚构的标准把中国排挤在日本主

导的东亚秩序之外,与中国争夺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在安倍和麻生时代,日本的“价值观外交”理念逐步演变为“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俯瞰地球仪外交”,即打造从西太平洋经欧亚大陆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直至西欧的“民主”国家联盟,安倍也多次向小布什建议打造“亚太民主联盟”,特别是力推美日印澳四国联盟。在安倍第二任期,由于看到“自由与繁荣之弧”涉及国家太多、战略难以落地而沦为空想之后,进一步提出了“民主安全菱形”概念,菱形的四角仍然是美日印澳四国同盟,四国同盟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基石。

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美国优先”、退出 TPP 并要求盟友肩负更多责任,在亚太问题上表现得漠不关心,这令日本十分担忧。安倍利用各种机会或主动创造机会向特朗普兜售四国同盟战略,直至特朗普访日,安倍依然在与特朗普积极沟通四国同盟建设。2017 年 11 月 10 日,特朗普在越南岘港 APEC 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印太”战略,在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把印度也拉拢进来,以重新构建印度洋—太平洋秩序,其核心依然是四国同盟,“印太”战略的提出和日本多年来特别是安倍政府的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

日本推进“价值观外交”、力推四国同盟,本质上是针对中国的,力图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拼凑一个对华包围圈,同时也会对“一带一路”特别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起到围堵和封锁的作用。此外,日本在力推美日印澳“大菱形包围圈”的同时,也积极鼓动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与日本一道构筑制衡中国的“小菱形包围圈”,希望增强在南海地区与中国博弈和抗衡的能力,强化日本在南海的势力和影响力。

三、日本抵制“一带一路”的主要原因

日本对“一带一路”采取消极态度,既有看到中国快速崛起心态失衡、担忧在地缘格局和地区经济合作中被边缘化的内部因素,也有受美国影响、在对华战略上向美国看齐的外部因素。但综合来看,内因为主、外因为辅。

(一)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心态失衡

二战以后,日本在经济建设上遥遥领先于中国,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国家,一直保持着相对中国的优越感。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近两年中日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引发日本的不适应乃至战略焦虑。日本的传统优势产业如机械设备、高铁机车、家用电器等已被中国赶上和超越,在互联网经济、现代商贸、航空航天、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一些关键技术领域,日本甚至已经远远落在中国后面。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日本“失落的三十年”形成了鲜明反差,日本各界普遍对中国崛起表现出心态失衡,担忧日本再如历史上一样成为中国的附庸,“中国威胁论”尘嚣泛起,这种心态直接影响了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行为。

(二)日本认为“一带一路”将进一步强化中日地缘冲突

日本流行观点认为,中日两国在东亚地缘格局中存在竞争关系,中强则日弱,日弱则中强,大陆型强国和海洋型强国难以共存。^⑥中国已成为大陆型强国,势必要在整合陆上周边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海洋霸权,日本作为海洋型强国势必要将政治经济影响力向大陆腹地延伸,中日两国发展战略和路径将迎头相撞。近年来,不断激化的东海和南海问题就是中国的海洋扩张与日本海洋战略的正面对撞。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长期主导东亚秩序,在东北亚、东南亚乃至南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如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将影响力延伸至这

些地区,势必会削弱日本的战略地位,使日本在东亚地缘格局中被边缘化。

(三)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南亚地区将面临较为激烈的产业竞争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长期成为日本最重要的海外投资国,由于中日两国要素禀赋差异、产业分工错位、经济互补性明显,中国成为日本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地。但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日经济结构日渐由互补性向趋同性转变,产业分工日渐由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转变,两国产业同质性竞争日益激烈,如高铁、机电设备、材料工业等领域。当前日本已将产业转移重点瞄准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而这些地区也是中国“走出去”的重点地区,是推进“一带一路”的优先和关键地区,中日两国在这些地区呈现出激烈的产业竞争,如在雅万高铁、新马高铁、泰国高铁、印度高铁等项目争夺上中日两国都开展了针锋相对的竞争,日本认为中国主导筹建的亚投行和日本主导的亚行也存在直接竞争,对竞争和失去市场的担忧也致使日本对“一带一路”采取消极态度。

(四)配合美国抗衡“一带一路”的需要

日本外交政策受美国影响极大,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中美关系,在日本处理“一带一路”问题上也是如此。由于中国与美国经济差距正在迅速缩小,美国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坐二望一”,谋求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一带一路”正是中国实现该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尽管美国未公开表示对“一带一路”的反对态度,但实质上正在通过“印太”等战略对抗“一带一路”的影响。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同盟国,需要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成为了美国抗衡“一带一路”的桥头堡。

四、几点建议

(一)引导国际舆论正确看待“一带一路”

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负面看法大多来源于对“一带一路”的不了解,多凭借其主观臆断、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一带一路”,认知不免负面和偏颇。实际上,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尽管两国部分产业和产品存在竞争,但一则这类竞争属于正常的商业竞争,没有涉及经济安全、地缘格局等国家根本利益,二则中日在产业链层面的合作一直非常紧密,中日两国联手开发第三方市场极具潜力,中日“一带一路”合作前景广阔。当前我国要积极引导国际舆论正确认知“一带一路”,把“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和互利共赢的本质特征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阐述清楚,纠正其不当认知和负面看法,使其能够用正确认识来调整行为、引领行动。只有我们首先能够恰如其分、准确合理的宣传好“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才能让日本等对“一带一路”持怀疑态度的国家接受和参与。

(二)继续深入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力争使其向好的方向转化

尽管近年来中日关系跌入低谷,但仍然有回温的可能和空间。从历史上看,中日关系曾经历过远比当前更为困难的时期,但仍然实现过峰回路转。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应借此契机,利用好近期日本对改善中日关系所展现出的向好势头,通过加强政治沟通、密切经济合作、增进人文交流等方式,不断扩大两国在经贸、制造业、节能环保、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推动亚投行与亚开行在业务上的对接,为中日关系回温创造积极因素,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深入发展,力争使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化,为推进中日“一带一路”合作营造积极氛围、创造有利条件。

(三)以 RCEP 为抓手,深化中日经济合作

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内需能力有限,发展经济极为依靠外部市场,日本经济结构呈现出突出的“两头在外”特点。长期以来,日本一直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经济整合,但由于中日韩自贸区、RCEP 等重要地区经济合作协定迟迟难以推动,日本转投 TPP,在美国退出 TPP 后,日本继续推动 CPTPP 建设。但由于美国的退出,CPTPP 市场容量大大缩水,含金量远不如 TPP,也无法与 RCEP 相比。可择机与日本共同商议推进 RCEP 建设,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是日本经济增长所无法或缺的,日本参与并推动 RCEP 对其也有重大经济利益。日、印是影响 RCEP 的关键国家,如能使日本对 RCEP 转向积极,将对印也会产生重大示范影响,RCEP 建成可能性将增大。当前应积极与日本开展沟通对话,力争营造良好政治氛围,在此基础上,如日本对待“一带一路”态度出现实质转向,可将 RCEP 建设作为推动中日“一带一路”合作的主要抓手。

(四)确保日本不要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负面因素

当前中日“一带一路”合作主要受制于政治因素影响,日本推进修宪、否认历史问题、推进钓鱼岛国有化等做法使中日关系长期陷入低谷。应该说,短期内推动日本政治风向转变、实现中日政治互信难度极大,但要确保日本不成为“一带一路”的重大阻碍力量。“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出太平洋的第一站就是日本,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都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如果日本高调唱反“一带一路”,再加之美国在后支持,我国推进“一带一路”阻力将大大增强。实际上,中日两国长期“政冷经热”,尽管当前解决“政冷”问题难度很大,但应力争恢复“经热”,使紧密的经贸联系成为牵制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影响日本民众对华态度的重要手段,为推进“一带一路”尽量营造良好环境。

(五)破解四国同盟,增大对日博弈筹码

当前在全球舞台特别是亚太地区,日本政治经济影响力已远远不能和中国相比,如要和中国抗衡博弈、对冲“一带一路”影响,所能依赖的主要是四国同盟。尽管当前美国已提出“印太”战略,日本一直在台上台下为四国同盟筹划准备,但四国利益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凝聚在一个同盟下并非易事。针对“四国同盟”,我国可采取拆分策略。中美关系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两国关系既有竞争的一面,更有合作的一面,要抓好两国利益汇合点,推动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印度坚持独立外交,对“四国同盟”并非真心实意,其加入背后有抗衡中巴经济走廊、维持其在印度洋主导地位等地缘战略的考虑,我国如能调整南亚策略、实行中巴平衡外交、努力向印做好沟通释疑,印度对“四国同盟”立场很可能发生松动。澳大利亚在四国中,政治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且中澳经济往来一向密切,在四国同盟中的重要性并不突出。如能差异施策、有的放矢,拆解四国同盟,日本对华战略博弈能力将大大下降,更无筹码抗衡阻挠“一带一路”。

注 释:

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日政经关系问题”研究组:《第二届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会观点综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报告》,2016 年第 65 期。

②中日关系是否迎来“春天”,http://www.sohu.com/a/147142211_260616

③日本首相安倍出席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国庆招待会,http://www.xinhuanet.com/2017-09/28/c_1121741726.htm

④日本首相安倍再就“一带一路”表态,称可“大力合作”,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91801

⑤安倍晋三在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会上的发言, <http://www.cciee.org.cn/Detail.aspx?newsId=14428&TId=8>

⑥梅冠群:《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变化及其战略应对》,《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1期。

⑦梅冠群:《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变化及其战略应对》,《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1期。

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日课题组:《构建新常态下的新型中日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报告》,2017年第10期。

(梅冠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贺 平)

日本城市的数量变化、人口规模与地域分布

焦必方

内容提要 在涉及行政区划时惯常使用的“市町村”中的“市”，是日本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日本共有此类“市”790个。就城市数量而言，小规模城市是日本城市的主体，其中尤以3万至10万人以下人口规模的“市”最多。日本城市人口分布，既有集中与分散并存的特点，也有在特定人口规模的城市中形成的双峰凸起型的特点。日本城市在地区分布上并不均衡，但小规模城市的存在对农村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规模过小的城市产生的“过疏化”已成为日本需解决的迫切课题。

关键词 日本 城市 数量变化 人口规模 地域分布

一、日本城市的诞生及城市数的演变

（一）早期的日本城市

1889年（明治22年）之前，日本唯有町村而无城市。1888年，全日本共有町村71,314个。^①当时，日本的町村主要是一些自然村落，^②是人们日常生活与劳动的场所。鉴于町村数过多，规模不大，功能有限，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建立现代地方自治制度，于1889年开始推行“市制及町村制”。

该制度具体实施时，由于日本采用了以每一地区建立一所小学为目标，以小学所需人口规模为导向的做法，因而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町村合并浪潮。这次合并，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首次大规模町村合并，因时间短、合并速度快，故被后人称为市町村的“明治大合并”。合并过程中，因部分町村经合并被国家直接指定实施了“市制”，所以，该年年底日本町村数降为15,820个的同时，首次形成了39个“市”。

（二）日本城市的增加与市町村数量结构变化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显示，1922年日本有了“町村”的分类数据。该年日本共有市町村12,315个，其中“市”91个，“町”1,242个，“村”10,982个。此后，日本城市数或快或慢地有所增加，特别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又有过两次大规模市町村合并：即1953—1961年的“昭和大合并”和2000—2009年左右的“平成大合并”。^③经过这两次大规模的市町村合并之后，日本的城市数量迅速增加。“昭和大合并”之后日本城市数由1953年的286个跃增为1961年的556个；“平成大合并”之后则由671个增加为783个。与此同时，市町村数量结构也随之变化。2016年4月，日本市町村总数降至1,718个，其中“市”790个，“町”745个，“村”183个。^④

二、日本城市的人口规模

(一)日本城市认定的人口规模标准

现代日本町村由“町村制”改行“市制”的必要条件如下:第一,集聚的人口要达到5万;第二,从事非农林渔业的人(包括他们各自的家庭成员)占总人口的60%以上;第三,在房屋等联排建筑形成的街区内居住的居民户数要占居民总户数的60%以上。^⑤

根据日本《地方自治法》要求,日本城市的人口规模最低应达到5万人。

然而,平成大合并期间日本为鼓励市町村合并,在“町村制”转“市制”方面降低了人口数量要求,规定凡符合其他条件,但人口不到5万,仅达到3万以上的,只要在2004年4月1日之前提出实行“市制”的申请,也可予以受理。^⑥如,静冈县御前崎市就是由原御前崎町和浜冈町于2004年4月1日经合并设“市”的。合并设“市”后,当时御前崎市的人口为35,000人。^⑦

因此,理论上讲,目前日本城市的人口规模至少应在3万或3万人以上。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二)日本城市的人口规模现状

笔者将2016年日本790个城市按不同人口规模分为16组,并由高到低排序形成表1。由表1可知,该年全日本城市中3万人以下城市95个,约占日本城市总数的12.03%。同期,位于北海道的歌志内市是当今日本人口最少的市。2016年10月1日该市人口仅3,426人。尽管现在日本有不少市已不符合人口规模条件的规定,但此类市的“市制”认定却并未因此而取消,这与日本许多地方公共团体考虑到居民的自尊心和积极性,未对这些市作“降格”处理有关。^⑧

表1 日本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数量、人口及占比(2016年)

按人口规模的分组	城市数(个)	占“市”总数比例(%)	人口数(人)	占“市”人口总数比例(%)
人口200万至380万人以下	3	0.38	8,740,497	8.12
人口100万至200万人以下	8	1.01	11,541,925	10.73
人口75万至100万人以下	5	0.63	4,376,215	4.07
人口50万至75万人以下	12	1.52	7,336,696	6.82
人口45万至50万人以下	8	1.01	3,794,525	3.53
人口40万至45万人以下	11	1.39	4,583,787	4.26
人口35万至40万人以下	11	1.39	4,080,407	3.79
人口30万至35万人以下	13	1.65	4,276,424	3.97
人口25万至30万人以下	19	2.41	5,162,427	4.80
人口20万至25万人以下	19	2.41	4,342,072	4.04
人口15万至20万人以下	51	6.46	8,928,763	8.30
人口10万至15万人以下	100	12.66	12,307,984	11.44
人口5万至10万人以下	252	31.90	18,623,099	17.31
人口3万至5万人以下	183	23.16	7,283,823	6.77
人口1.5万至3万人以下	87	11.01	2,131,496	1.98
人口1.5万人以下	8	1.01	88,444	0.08
合 计	790	100	107,598,584	100

资料来源:根据 <http://ja.wikipedia.org/wiki/日本の市の人口順位>制作。

由表 1 可知,2016 年全日本城市中城市数最多、占比最高的是 5 万至 10 万人以下城市组,共计 252 个,约占日本城市总数的 31.90%;其次是 3 万至 5 万人以下城市组,共计 183 个,约占日本城市总数的 23.16%。除此以外,依城市数量由多到少排列,日本 10 万至 15 万人以下的城市为 100 个,约占 12.66%;1.5 万至 3 万人以下的城市为 87 个,约占 11.01%;15 万至 20 万人以下的城市为 51 个,约占 6.46%;25 万至 30 万人以下及 20 万至 25 万人以下的城市分别为 19 个,约各占 2.41%; 30 万至 35 万人以下的城市为 13 个,约占 1.65%;50 万至 75 万人以下的城市为 12 个,约占 1.52%;35 万至 40 万人以下及 40 万至 45 万人以下的城市分别为 11 个,约各占 1.39%;100 万至 200 万人以下、45 万至 50 万人以下及 1.5 万人以下的城市分别为 8 个,约各占 1.01%; 75 万至 100 万人以下的城市为 5 个,约占 0.63%;200 万至 380 万人以下的城市为 3 个,约占 0.38%。

(三)小规模城市是日本城市的主体

1、1.5 万至 15 万人以下规模的“市”约占日本城市总数的四分之三

通过表 1 不难发现,就上述 16 个组别而言,若以城市数占全部 790 个城市总数的 10% 以上划线,则 2016 年占全日本城市数总和 78.8%的是人口规模在 1.5 万至 15 万人以下规模的“市”。这部分城市共计达 622 个,约占日本城市总数的四分之三强。

2、3 万至 10 万人以下的“市”则是日本城市主体中的主体

在上述 622 个人口规模在 1.5 万至 15 万人以下规模的“市”中,人口规模在 3 万至 10 万人以下的“市”占了 69.8%。毫无疑问,就城市数量而言,3 万至 10 万人以下人口规模的“市”绝对是日本城市主体中的主体。

(四)日本 50 万人以上人口规模的“市”较少

以上数据可知日本城市的人口规模普遍较小。其实,即使人口规模达到 50 万人以上,这样的城市日本也不多,2016 年仅 28 个,只占全日本城市总数的 3.5%。其中,作为人口规模分组中人口规模最大的一组,即 200 万至 380 万人之间组的“市”才 3 个,更是只占全日本城市总数的 0.38%。

这 28 个“市”若以人口规模数多少排列,则分别是横滨市、大阪市、名古屋市、札幌市、神户市、京都市、福冈市、川崎市、埼玉市、广岛市、仙台市、千叶市、北九州市、堺市、新泻市、滨松市、熊本市、相模原市、冈山市、静冈市、船桥市、鹿儿岛市、川口市、八王子市、姫路市、宇都宫市、松山市、东大阪市。

(五)日本不同规模“市”的人口分布特点

1、集中与分散并存的城市人口分布

由表 1 可知,2016 年日本 790 个城市集聚着 107,598,584 人的城市人口。若以不同分类组拥有城市人口占全日本 790 个城市所集聚城市人口的占比超过 5%为界,则 2016 年日本集聚城市人口较多的几组情况分别如下:

(1)5 万人至 10 万人以下组城市集聚的城市人口最多,达 18,623,099 人,占该年全日本 790 个城市所集聚城市人口数的 17.31%;

(2)10 万人至 15 万人以下组集聚城市人口 12,307,984 人,占 11.44%;

(3)100 万人至 200 万人以下组集聚城市人口 11,541,925 人,占 10.73%;

(4)15 万人至 20 万人以下组集聚城市人口 8,928,763 人,占 8.30%;

(5)200 万人至 380 万人以下组集聚城市人口 8,740,497 人,占 8.12%;

- (6)50 万人至 75 万人以下组集聚城市人口 7,336,696 人,占 6.82%;
- (7)3 万人至 5 万人以下组集聚城市人口 7,283,823 人,占 6.77%。

上述 7 个城市人口规模分组中,(1)、(2)、(4)、(7)4 组处于 3 万人至 20 万人以下人口规模的城市范围之内;而(3)、(5)、(6)3 组处于 50 万人至 380 万人以下人口规模的城市范围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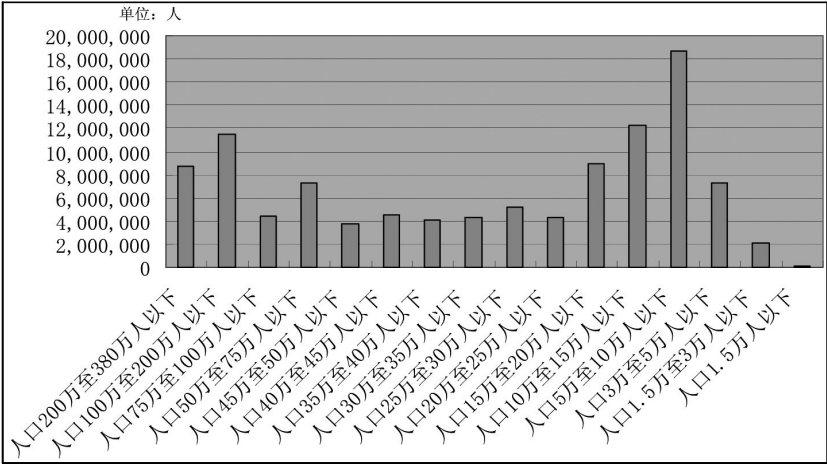
为便于说明,笔者将前 4 组城市定义为 A 类城市,后 3 组城市定义为 B 类城市。2016 年,A 类城市集聚的城市人口合计 47,143,669 人,占“市”人口总数的比例为 43.81%,其城市数共 586 个, 占全日本 790 个城市总和的 74.2%;B 类城市集聚的城市人口合计 27,619,118 人,占“市”人口总数的比例为 25.67%,其城市数共 23 个,占全日本 790 个城市总和的 2.9%。

占城市数总和 2.9%的城市集聚了全日本约 1/4 的城市人口,同约占城市数总和 3/4 的城市集聚了全日本 43.81%的城市人口相并存, 突显了日本城市人口的分布具有集中与分散并存的特点。

2、基本呈双峰凸起型的城市人口分布

另外,根据图 1 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不同人口规模“市”所集聚的城市人口基本上呈现了双峰凸起的特点,即以 5 万人至 10 万人以下人口规模“市”为代表的城市人口集聚的主峰凸起,及以 100 万人至 200 万人以下人口规模“市”为代表的城市人口集聚的次峰凸起。

图 1 2016 年日本城市人口在不同人口规模“市”的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 <http://ja.wikipedia.org/wiki/日本の市の人口順位> 制作。

若仅就集聚的城市人口数量而言,本文作如下假设,即将图 1 中 3 万人至 20 万人以下人口规模“市”假设为集聚日本城市人口的“主峰区城市”,将 100 万人至 380 万人以下人口规模“市”假设为集聚日本城市人口的“次峰区城市”。则 2016 年“主峰区城市”的城市数为 586 个,集聚的城市人口为 47,143,669 人,占该年城市人口总数 107,598,584 人的 43.81%。而 2016 年“次峰区城市”的城市数为 11 个,集聚的城市人口为 20,282,422 人,占该年城市人口总数的 18.85%。

日本城市化过程中,小规模城市的存在对农村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以兵库县南淡路市为例, 该市是 2005 年 1 月 11 日,由原兵库县绿町、西淡町、三原町、南淡町等 4 町经合并而形成的新市。合并前的 2000 年,这 4 个町的人口分别为 6,154 人、12,519 人、

16,602 人、19,704 人。2005 年,合并后诞生的南淡路市人口为 54,763 人。^⑨ 显然,前述静岡县的御前崎市也是原御前崎町和浜冈町町民就地城市化的案例。

三、日本城市的地区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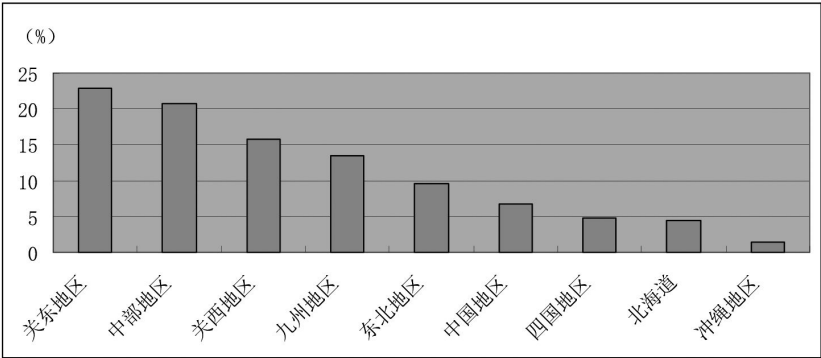
日本的行政区划共设有 1 都 1 道 2 府 43 个县。这些都道府县据其所处地理位置,通常又被划分入若干个大的区域,主要有北海道地区、东北地区、关东地区、中部地区、关西地区、中国地区、四国地区、九州地区和冲绳地区等九个。

在日本,除北海道地区和冲绳地区仅分别由北海道与冲绳县单独构成外,其他地区均由复数的都、府、县构成。如关东地区包括东京、茨城、栃木、群马、埼玉、千葉、神奈川等都、县;关西地区包括京都、大阪、三重、滋贺、兵库、奈良、和歌山等府、县。

(一)日本不同人口规模“市”的地区分布现状

如图 2 所示,2016 年日本 790 个市按所在地区拥有城市数由多到少进行的排序是:关东地区 180 个,占 22.8%;中部地区 164 个,占 20.8%;关西地区 125 个,占 15.8%;九州地区 107 个,占 13.5%;东北地区 76 个,占 9.6%;中国地区 54 个,占 6.8%;四国地区 38 个,占 4.8%;北海道地区 35 个,占 4.4%;冲绳地区 11 个,占 1.4%。显然,在日本全部九个地区中,关东、中部、关西、九州等四个地区拥有的城市数占日本总城市数的 72.9%,共计 576 个。而日本的其他地区,除东北地区城市占比接近 10%外,北海道、中国、四国、冲绳等四个地区拥有的城市数总共才 138 个,仅占日本城市总数的 17.5%。可见,日本城市在地区分布上是十分不均衡的。

图 2 2016 年日本各地区城市占日本城市总数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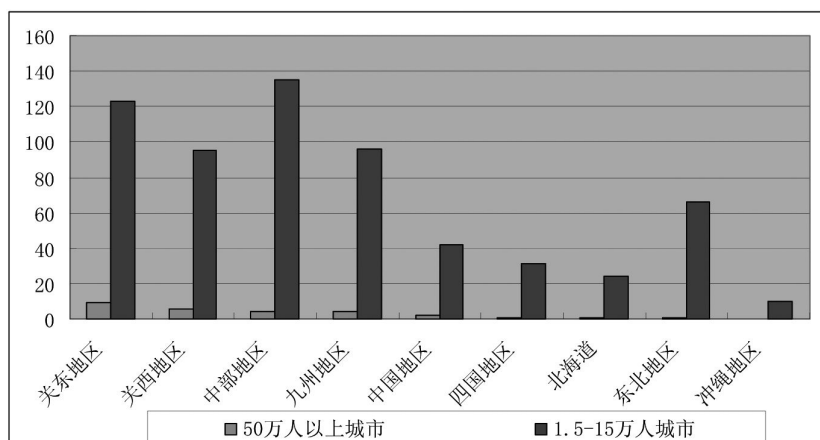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根据 <http://ja.wikipedia.org/wiki/日本の市の人口順位> 编制。

(二)日本 50 万人以上人口规模“市”的分布相对集中

日本人口规模达到或超过 50 万人的“市”数量虽少,但分布却相对集中。(参见图 3)

2016 年,日本上述 28 个人口规模达到 50 万人以上的“市”中位于关东地区的最多,共 9 个,占此类人口规模城市的 32.1%,主要位于神奈川、埼玉、千葉、栃木、东京四县一都;其次是关西地区,有 6 个,占 21.4%,主要位于大阪、京都、兵库等二府一县;第三,是中部地区和九州地区,各 4 个,分别占 14.3%,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爱知、新泻、静岡等三县和九州地区的福岡、熊本、鹿儿岛等三县。

图3 2016年日本50万人以上及1.5万至15万人以下人口规模城市的地区分布(单位:个)



资料来源:根据 <http://ja.wikipedia.org/wiki/日本の市の人口順位> 制作。

北海道地区、东北地区、四国地区等虽有超50万人人口规模的“市”,但数量十分有限,仅各1个,分别位于北海道、宫城县、爱媛县。整个冲绳地区则没有1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达到50万人,甚至连超过35万人的城市也没有。冲绳县那霸市是冲绳地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市,2016年人口也仅为32.1万人。

从都道府县层面看,除前述冲绳县没有人口规模达到50万人的城市外,存在类似情况的县还有27个。它们分别是日本东北地区的青森、岩手、秋田、山形、福岛等5个县;关东地区的茨城、群马等2个县;中部地区的富山、石川、福井、山梨、长野、岐阜等6个县;关西地区的三重、滋贺、奈良、和歌山等4个县;中国地区的鸟取、岛根、山口等3个县;四国地区的德岛、香川、高知等3个县;九州地区的佐贺、长崎、大分、宫崎等4个县。可见,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无50万人以上人口规模“市”的县多达28个,约占都道府县总数的60.0%。其中,不少县“50万人”的“杠杠”还可下调,有的更是连超过20万人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都没有。如中部地区的山梨县和中国地区的鸟取县就是这样。

(三)日本大量小规模城市与大城市相伴共存

观察日本城市的分布,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即在部分地区大量的小规模城市与大城市相伴共存。如图3所示,在28个50万人以上“市”中来自日本关东地区、关西地区、中部地区和九州地区的有23个,在这些地区也共存着大量小规模城市。

如前所述,2016年日本1.5万至15万人以下人口规模城市总数为622个,占该年日本城市总数的78.73%。其中449个,即占这一人口规模范围72.19%的城市位于日本关东地区、关西地区、中部地区和九州地区。具体分别为:关东地区123个,占日本城市总数的15.57%,占日本1.5万至15万人以下人口规模“市”的19.77%;关西地区95个,分别占12.03%和15.27%;中部地区135个,分别占17.09%和21.70%;九州地区96个,分别占12.15%和15.43%。

这一区域内人口规模差异极大的城市相伴共存现象,即使在东京都内也表现得十分明显。除23个中心城区以外,东京都还内含26个“市”。2016年,这些“市”聚集了4,172,227人,但人口规模在40万人以上的仅2个,分别是八王子市(577,180人)、町田市(433,345人)。20万人以下的“市”居多。其中,人口15万至20万人以下的如立川市等5个,10万至15万人以下的如多摩市等7个,5万至10万人以下的如稻城市等9个。^⑩

四、日本首都圈城市与过疏化“市”的比较分析

(一)日本首都圈城市的分析

就区域范围而言,日本首都圈主要是指日本关东地区的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群马县、茨城县、栃木县等“一都六县”和中部地区的山梨县。^①

(1)日本首都圈城市数量

根据 2016 年的统计显示,撇开东京都都心 23 个区,日本首都圈共有城市 193 个。按不同人口规模组城市数多寡排序,则前 5 位全部集中在 3 万至 25 万人以下组别范围内。排序处在在前 5 位的这些城市中,人口 5 万至 10 万人以下组 67 个,10 万至 15 万人以下组 32 个,3 万至 5 万人以下组 30 个,15 万至 20 万人以下组 23 个,20 万至 25 万人以下组 11 个,合计共 163 个,约占首都圈城市总数的 84.46%。

(2)日本首都圈城市集聚人口分析

2016 年,日本首都圈 193 个城市共集聚人口 32,585,735 人,占同期全日本 790 个城市所集聚人口总数 107,598,584 人的 30.28%。

该年,日本首都圈内 50 万人以上城市有 9 个,约占全日本 28 个 50 万人以上城市的 32.14%。这些城市分别是横滨市(3,732,539 人)、川崎市(1,486,578 人)、埼玉市(1,272,716 人)、千叶市(974,271 人)、相模原市(722,174 人)、船桥市(626,393 人)、川口市(580,302 人)、八王子市(577,180 人)、宇都宫市(519,217 人),共集聚人口 10,491,370 人,约占前述首都圈 193 个城市集聚人口总数的 32.20%。

综上所述,若将东京都 23 区 2016 年聚集的 9,357,221 人一起加总予以考察,则可以对日本首都圈“一极集中”的城市人口及其分布做出如下判断:即 2016 年日本首都圈共集聚城市人口 41,942,956 人,首都圈内核心的 23 区集聚人口约占 22.31%,9 个 50 万人以上城市集聚人口约占 25.01%,而其余的 22,094,365 人则被首都圈内 184 个 50 万人以下的城市所集聚。这 184 个城市中,3 万至 15 万人以下的城市占据多数,达 129 个。

(二)日本过疏化“市”的分析

日本自 20 世纪 50-60 年代就产生了过疏化问题。过疏化现象不仅存在于“町村”,也向城市蔓延,出现了不少过疏化“市”(下文中的过疏化“市”一律简化为过疏化市)。随高龄化程度不断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过疏化问题日益深刻,难以扭转。^②

(1)日本过疏化市在城市中的占比在提高

早期的日本过疏化现象,城市同町村比,过疏化市的绝对数少,在城市总数中的所占比例也较低。如 1985 年和 1995 年,被日本政府认定的过疏化市分别为 35 个和 41 个,在城市总数中的占比则分别为 5.4%、6.2%。但 2016 年,日本过疏化市的绝对数量高至 120 个,且在较前有所增加的城市总数中的占比也提高至 15.2%。(参见表 2)

(2)日本过疏化市的人口规模

2016 年,日本过疏化市共计 120 个,约占日本城市总数的 15.19%,但过疏化市人口 4,363,546 人,仅约占该年日本城市人口总数 107,598,584 人的 4.06%。同时,就人口规模的分组而言,日本的过疏化市全部处于 30 万人以下分组段。(参见表 3)

不过,尽管日本的过疏化市也存在于 5 万至 30 万人以下的大部分分组组别,但 2016 年

表2 日本过疏化地区市町村占市町村总数的比例变化

(单位:个、%)

年份	全日本市町村				过疏化地区市町村				比例			
	总计(a)	市(b)	町(c)	村(d)	市(e)	町(f)	村(g)	小计(h)	h/a (%)	e/h(%)	f/c(%)	g/d(%)
1985	3253	651	2001	601	35	739	377	1151	35.4	5.4	36.9	62.7
1995	3234	663	1994	577	41	774	384	1199	37.1	6.2	38.8	66.6
2016	1718	790	745	183	120	373	123	616	35.9	15.2	50.1	67.2

资料来源:焦必方:《伴生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过疏化地区现状及特点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8期。

表3 日本过疏化市的人口规模及其分布(2016年)

人口规模	城市		过疏化市		各类过疏化市占该类城市总数比例		各类过疏化市占过疏化市总数比例	
	数量(个)	人口数(人)	数量(个)	人口数(人)	数量(%)	人口数(%)	数量(%)	人口数(%)
25万至30万人以下的市	19	5,162,427	1	266,785	5.26	5.17	0.83	6.11
20万至25万人以下的市	19	4,342,072						
15万至20万人以下的市	51	8,928,763	1	175,184	1.96	1.96	0.83	4.01
10万至15万人以下的市	100	12,307,984	2	238,171	2	1.94	1.67	5.46
5万至10万人以下的市	252	18,623,099	13	802,187	5.16	4.31	10.83	18.38
3万至5万人以下的市	183	7,283,823	41	1,539,915	22.40	21.14	34.17	35.29
1.5万至3万人以下的市	87	2,131,496	54	1,252,860	62.07	58.78	45	28.71
1.5万人以下的市	8	88,444	8	88,444	100	100	6.67	2.03
	719	58,868,108	120	4,363,546	16.69	7.41	100	100

资料来源:根据 <http://ja.wikipedia.org/wiki/日本の市の人口順位>、《过疎地域》编制。

它们在同类城市中的占比并不高。^④过疏化市主要集中在5万人以下的市,如:3万至5万人以下的市中占比22.40%,1.5万至3万人以下的市中占比58.78%,1.5万人以下的市则100%是过疏化市。

进而,再就全部120个过疏化市作分析,则人口规模在1.5万至10万人以下的三个组别共占了90%。其中各自的所占比例分别为:5万至10万人以下组占10.83%,3万至5万人以下组占34.17%,1.5万至3万人以下组占45%。另外,过疏化市人口中的82.38%也主要生活在这三个组别的市。其中各自的比例分别为:5万至10万人以下组占18.38%,3万至5万人以下组占35.29%,1.5万至3万人以下组占28.71%。

(3)日本过疏化市的地区分布

日本过疏化市在地区间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2016年日本的过疏化市主要分布于日本的九州地区(39个)、北海道地区(18个)、中国地区(17个)、东北地区(16个)和四国地区(12个)。这些地区的过疏化市共占全日本过疏化市的比例高达85%。关东地区、关西地区和中部地区虽也有过疏化市,但数量不多,在全日本过疏化市中的占比也不高,如关东地区和关西地区仅分别占全日本过疏化市的1.67%和5.83%。不过比较意外的是,资料显示冲绳地区没

有过疏化市。^⑩

不过,若就地区内城市的占比看,则北海道地区过疏化市占该地区城市总数的比例最高。2016年这一占比竟高达51.43%,比位居第二位的九州地区的36.45%高出了约15个百分点。但若就全部的过疏化市而言,则九州地区的过疏化市最多,约占全日本过疏化市的1/3。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就城市数量而言,小规模城市是日本城市的主体,其中尤以3万至10万人以下人口规模的“市”最多。日本城市人口分布,既有集中与分散并存的特点,也有在特定人口规模的城市中形成的双峰凸起型的特点。日本城市在地区分布上并不均衡,但小规模城市的存在对农村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规模过小的城市产生的“过疏化”已成为日本需解决的迫切课题。

注 释:

①焦必方、孙彬彬:《日本现代农村建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古代日本的町与村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地理位置上町通常是位于“城”边较为平坦的地区。

③关于日本市町村合并可详见:焦必方、孙彬彬:《日本的市町村合并及其对现代化农村建设的影响》,《现代日本经济》,2008年第5期。

④焦必方、孙彬彬:《日本现代农村建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整理自维基百科:<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8%82%E7%94%BA%E6%9D%91>。

⑥焦必方、孙彬彬:《日本现代农村建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⑦整理自维基百科:<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E%A1%E5%89%8D%E5%B4%8E%E5%B8%82>。

⑧严格意义上讲,用“降格”一词并不合适,因为日本市、町、村均为独立的对等的自治体,“市制”与“町村制”之间的转换,无所谓“升”与“降”。

⑨引自南淡路市役所:<http://www.city.minamiawaji.hyogo.jp/>。另外,更多有关日本农村城市化的内容可详见,焦必方:《日本农村城市化进程及其特点——基于日本市町村结构变化的研究与分析》,《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⑩数据整理自日本【全国の市区町村】人口・面積・人口密度ランキング資料。

⑪引自<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8%82%E7%94%BA%E6%9D%91> 首都圏(日本)。

⑫据2000年颁布并经2015年修订的《过疏地域自立促进特别措置法》,当前,作为过疏化地区市町村认定的人口条件,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皆有可能被日本政府认定为过疏化市町村。这些条件主要是:(1)1965年至2010年的45年间,人口减少率在33%以上;(2)虽上述45年间的人口减少率只达到28%以上,但65岁以上者在市町村人口中的比例达到32%以上;(3)同样,虽上述45年间的人口减少率只达到28%以上,但15岁以上30岁以下者在市町村人口的比例低于12%;(4)1985年至2010年的25年间,人口减少率在19%以上。关于日本的过疏化问题还可详见:焦必方:《伴生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过疏化地区现状及特点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8期。

⑬表3资料显示20万至25万人以下组别中还没有过疏化市。

⑭数据来源于:<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8%82%E7%94%BA%E6%9D%91> 日本の市の人口順位、過疎地域。

(焦必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魏全平)

日本驻中国领事馆文化外交分析

王英良

内容提要 中日关系是东北亚地区相对特殊的双边关系。因为历史恩怨、现实利益纠葛、对地区和世界事务领导权的博弈等因素所产生的冲突一直影响着两国中央政府关系的缓和。为宣扬“中日战略互惠”，日本对华开展了诸多展示亲善、争取民心 and 认同的文化外交，日本驻华领事馆成为对华文化外交的桥头堡。本文以日驻华领事馆这一特殊机构为例，分析日本政府对华文化外交的价值取向、实施特征以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驻中国领事馆 文化外交 中日关系

一、文化外交研究回顾

文化是国家的象征与符号之一，是文明的重要体现。“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是管理国家间文化关系的活动，是一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文化外交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电视媒体的发展，文化外交有了超越传统报纸的新媒介，这一时期，文化外交主要服务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宣传。^① 学术界对文化外交、软权力、公共外交研究有走向交叉融合的趋势。软权力(Soft Power)倡导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文化作为软权力的构成要素是一系列具有社会意义的价值观和实践的组合，文化软权力是通过吸引力而非胁迫或者购买得以实现。^② 软权力主要由流行文化、价值观以及政策组成，软权力有助于塑造政策的可信性(credibility)以及合法性(legitimacy)。^③ 在外交形态上，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具有紧密的关联，因为文化外交可以较好地展现国家形象，所以被认为是“公共外交的关键”。可以说，文化外交尽管有别于公共外交，但作为铸造国家软实力的一环，同公共外交具有共同的旨向。

美国学者理查德·阿恩特(Richard T. Arndt)认为“文化外交”是利用文化资源进行对外宣传，尽管私人部门在创制文化上比政府更具有优势，但政府能将文化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④ 随着社会各主体文化意识的觉醒，文化的民族性和族群性决定了文化具有非垄断性，除了政府扮演主要角色外，私人部门也起到积极的作用。^⑤ 同时，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独特性造就了文化外交丰富的内涵。

在内涵上，文化资源包罗万象，诸如电影、舞蹈、音乐、绘画、书法、雕塑等形式。在实践中，举办文化展览会、开展对外语言传播、在海外设立学校、进行科学交流，在海外建立图书馆，对外进行文化广播展示一国的文化内涵，进行宗教交流，宣扬一国的理念和社会政策等都是文化外交的具体表现。^⑥ 长期研究文化外交的日本学者樱井孝昌认为日本的动画、时装秀、原宿时尚是日本开展文化外交的有力元素。^⑦

较早研究日本文化外交的中国学者周永生指出,1988年日本首相竹下登访问英国期间提出了“国际合作构想”政策,为推动这一政策,日本设立了“国际文化交流恳谈会”,日本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培养适合国际社会的人才;加强各国人员的交往;重视介绍日本文化;促进“发射型”的国际学术交流;对世界文化事业展开援助;做好留学生的的工作。^⑧姚奇志、胡文涛认为进入21世纪后,日本文化观念出现了变革,将“发信”、“受容”、“共生”作为文化外交的行动指南,试图不断提升国际形象,最终实现政治大国形象的建构。^⑨学者范勇鹏认为文化外交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基于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目标的长远性,对他国开展持续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渐进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推广等目标的活动。^⑩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论文,文化外交是主权国家通过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各个层级的官方或民间组织,围绕双边或多边文化事务展开的对外交往活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获得对象国政府和民众对本国文化以及外交政策的善意和认同,为经济、政治或战略利益的实现创造条件。文化与外交互为手段和目标,文化外交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文化外交是一国“文化”走出去,寻求对象国社会和民众的善意和认同的一种方式;第二、文化外交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官方外交可以相对独立或交叉融合;第三、文化外交中的文化元素是文化中的积极面,符合大众的审美和道德倾向;第四、文化外交是国家综合外交的一个环节,受制于双方的整体外交关系。

二、日本文化外交的历史实践

为寻求对象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而非单一政府层面的合作,日本政府长期重视文化外交。基于此,日本文化外交选择直接作用于外国民众,运用综合手段推进公共关系,培养亲和力,塑造理解日本外交政策的国际环境。^⑪日本外务省(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OFA)认为文化外交是与本国民间组织配合对外国民众和舆论施加影响以提高对本国的关注度,加深国家间理解、信赖的措施。^⑫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在进行政府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s, ODA)的同时又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并为此专门设立了规模庞大的“国际交流员项目”(The 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me, JET)。1972年日本外务省设立支持文化外交的特殊基金“国际交流基金”(The Japan Foundation)。在2003年基金成为独立行政法人,主要负责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海外日语教育、资助日本研究、知识交流等三个主要领域。^⑬日本外务省文化外交着重推介日本的传统文化、流行文化以及对其他国家有吸引力的元素,为日语在海外的传播提供条件。日本力图培养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类似的机构推动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合作。^⑭

日本国际交流员项目(The 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me, JET)“JET”项目是日本地方自治体为推进地区国际化而聘请外国青年访日的项目。“JET”参加者作为地方特别职务公务员受雇于日本地方自治体,任期1年,期满后,如该雇佣地方自治体和录选者双方同意可以最多再续约2次(对于特别优秀者可以作为特例最多再续约4次)。此外,很多“JET”参加者通过在日本的亲身经历,回国后起到了沟通本国与日本友谊的桥梁作用。^⑮

2016年5月在北京就任日本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一职的高桥耕一郎指出,不少日本人并

不太了解现代的中国和中国人,彼此之间的误解和缺乏理解将双方拉开了距离。^⑩ 作为专门研究基金作用的美国桑扶德公共政策学院学者乔尔·L·弗雷德施曼(Joe L. Fleishman)认为基金会会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三种基本角色:第一,当某种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目标清晰可见以及某种战略有发展潜力之际,基金会可能充当推动者的角色;第二,合作者角色。基金会以分权的方式和其他的合作组织一同做出重大决策,同时资助这些合作组织和其他执行基金会战略的组织;第三,催化剂角色。基金会可能不计回报地资助一些组织去解决因为战略不匹配、不可行或不成熟导致的问题。^⑪ “国际交流基金”覆盖了这些基本的角色功能。

国际交流基金内含三个主要活动:“中国高中生长期邀请事业”、“中国交流之窗事业”、“强化纽带事业”。^⑫ 对外援助以及国际交流基金的兴起适应了日本经济实力的崛起,既考虑历史又顾及与周边国家在历史、现实问题上所产生的龃龉和冲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扮演了推动者、合作者、催化者的复合角色,而且更加具有渗透性和隐蔽性。

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度,日本拥有独到的相扑文化,葡萄酒、清酒文化、祭祀文化、浮世绘、动漫、群舞文化,老年产业文化,饮食文化,工业设计文化等。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广宣传这些文化,并将这些元素作为领事馆文化外交的重要元素。

三、日本驻华领事馆对华文化外交分析

2013 年 1 月 18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尼雅加达演讲中阐述了“日本外交新的五原则”,提出努力充实日本与各国之间的文化纽带,加强日本与外国未来年轻一代人的交流。^⑬ 对华外交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方向,日本国驻华领事机构无论是驻华大使馆还是各片区的总领事馆都积极把对华文化外交作为重要的活动。

表 日本驻华大使馆、各总领事馆、办事处管辖地区一览表

日本驻华大使馆、总领事馆	管辖地区
日本驻华大使馆	北京市、天津市、陕西省、山西省、甘肃省、河南省、河北省、湖北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	上海市、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江西省
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	广东省、海南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	辽宁省(除大连市)、吉林省、黑龙江省
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馆	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
日本驻大连领事办公室	大连市
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	山东省
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图表来源:综合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官网信息自制。

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在 2012 年履新讲演中明确谈到中日关系面临的严峻局面,为实现“战略互惠”,他提出国家交流的基础在于两国国民,国民应该以主人翁姿态对两国友好关系给予大力支持。^⑭ 日本在 2004 年冻结了对华官方援助项目,但驻华各领事馆继续承担一定量的对华经济援助,援助更倾向于相对薄弱的基础设施修缮,比如开展村镇沟渠修浚、建设敬老院、河川防洪、建设小学等“民生工程”,作为文化外交和援助项目一样旨在推动和塑造

社会对日的好感。

日本驻华领事馆文化外交重点在于介绍日本文化、流行通俗文化、日语教育、日语学习以及文化交流。^①日本驻华大使馆官网在“文化交流 / 青少年交流”栏目下设立“新闻文化中心”、“文化交流”、“日本电影放映会”、“后援名义”、“文化用品借出”、“青少年交流”、“JET”。^②中国普通民众携本人身份证即可以免费进馆观看日本最新的杂志、书籍。

笔者选取日本驻上海和驻青岛总领事馆的文化外交实践为例：

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所举办的文化外交活动涉及面广，内容精彩纷呈。2015 年在其官网“新闻文化处”显示进行的活动有：南京日本文化交流会；领事馆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建筑学的内在尺度》研讨会；日本的文化讲座众人共享秋之乐——“享秋茶会”；日本乐器传统音乐之美；日本电影的介绍会；七夕茶会；剑道武士的“SPORT”；日中年轻人讨论交流会 & 恋爱故事；日本美食的荞麦面；日本的酒文化；和服与美妆新娘秀造型师大赛；商务礼仪与仪表讲座；日本樱花节；绘画漫画家林竹脱口秀；日本樱花展；摄影展；和服展；举办作家毛丹青演讲会等。^③在2016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各种文化外交活动主要包括：音乐和洗浴文化的讲座；花道；儿童剧观赏；在江西师范大学举办日本文化介绍活动；开展中日艺术家对话；彩妆；基础日语会话。在营销手段上，领馆采用公开报名参赛，鼓励民众报名，在内容上有电影放映会、儿童剧、女儿节人偶展示、育儿经交流等。^④总体而言，内容很贴近生活。

日本国驻青岛总领事馆文化外交结合了当地日侨多、赴日留学人员多的地域特征。内容包含：日本电影放映会、茶道表演、日本料理推介会、柔道表演、和服介绍会等。针对山东青岛地区留日人员集中，驻青岛总领事馆设立了“青岛留日同学会”以及在国际交流基金名下的“济南日中交流之窗”，每年定期开展交流活动。^⑤

2017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2018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为营造氛围，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开展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外交，并且对中国普通民众开放。以上海为例，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自 3 月份起举办了留学推介会、无锡樱花周、大使馆官邸春季茶话会、传统工艺美术展、COSPLAY SHOW、日本武士道文化、文学品评会等。^⑥

日本驻华各领馆在领事活动上各有特色，但万变不离其宗，都以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为其使命，力争实现日本政府所倡导的“战略互惠”。文化外交职能集中于：第一，与日本留学有关的事务，比如和日本文部科学省设立奖学金资助国费留学生；第二，定期举办介绍日本文化的活动，并用自媒体进行传播；第三，借出文化用品，面向学校、公共机构、民间非盈利机构等团体提供服务；第四，后援名义，以日本总领事馆后援名义经审查后进行活动并提供一定数额的经费支持；第五，有关日语事务，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学习日语，支持日语演讲比赛；第六，支持本辖区内与日本文化有关的活动；第七、按照所属区划的实际提供文化宣传，契合中国政府与民众的实际需要，将中国民众对日文化的好感尽可能地转化为商业契机。

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对华文化外交有以下明显特征：第一，在政府的名义下有计划地宣扬其在艺术、建筑、管理、语言等领域的文明成就，并以价值相对中立的“文化和艺术”为主题，避免涉及敏感的历史和现实政治问题以免刺激中国民众；第二，采用“营销型”的宣讲手段，面向社会几乎所有的阶层，日方很大程度地展示了儒家文化的“人情味”、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第三，日方注重培养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对日的好感；第四，各使馆相对独立地展开文化外交，并同领区的地缘结合，精心安排，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第五，日本政府设专门的财团基金提供支持，设立专门的新媒体宣传网站以及微信“APP”界面，

利用自媒体信息技术进行高效传播。

四、中日关系对日本文化外交的影响如何？

日本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并与美国保持“盟友关系”,这种“优越感”助长了日本社会一些人士的乐观,2010年日本学者大前研一(Ohmae Kenichi)在其著作《日本的未来》中充满自信地说日本寻求建设“最强外交和防卫计划”,美日同盟如今已是“圆熟夫妻”,日本有能力向全世界派遣“投资部队”和“发展部队”,在军事领域实行全民皆兵制的真正国防论。^②现实是,日本的外交与安保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实质性的受限于“美日同盟”这一特殊的结构因素,增加了日本外交独立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对美“一边倒”政策显然不符合日本长远利益,发展、缓和同中国的关系是日本平衡美国影响力的一种切实选择。

自民党代理政调会长盐崎恭久与弗朗西斯·福山在外交政策论坛上的对话中指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造成了日本地位下降,为实现国际地位提升就应该开展多层次的现实主义外交,需要软硬实力的复合使用,同时美国也期待日本在对华关系中发挥正面积积极的作用。^③中日分属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各自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奉行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日两国在国家软实力以及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方面展开竞争,日本政府对于中国迅速增长的军事实力倍感恐惧,而中国也担忧“美日同盟”有损中国周边形势的稳定并对本国军事力量走出去制造障碍。近年来,中国的雾霾以及经贸问题又引发两国新的争端。^④日本学者中野良子(Ryoko Nakano)认为中国通过国家战略调整,领土扩张等“现实主义”政策寻求大国形象,中日两国之间构建了一种怀疑和威胁的观念文化。^⑤

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在阐述“亚洲共同体”(Asian Community)概念时提出“亚太共同体”是作为市民、草根之间的场所而存在。^⑥日本政府提倡“积极和平主义”力图扭转自身国际形象既突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又明示国家战略路径,而中国部分学者认为“积极和平主义”实质是扩军备战的噱头,是日本政府力图以“普世价值”做掩饰的政治宣传,这种政策可能给东亚安全带来隐患。

以任晓、苏长和为代表的“上海学派”倡导全球“共生精神”,认为全球的“共生意识”集聚有助于人类形成更为强烈的多样文明共生意识。^⑦美日两国一直固执地认定中国是奉行武力和威胁的“修正主义”国家代表。日本政府对不断崛起的中国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力图以各种手段诋毁和遏制。“共生”以及“和平共处”,这两种价值在两国政府与民众中存在一定的市场,但中日两国间矛盾异常复杂,甚至可能因为某些突发的偶然事件陷入危机中。

日本防卫大学教授神古万丈(Kamiya Mataka)认为日本“和平主义”存在两种消极面:第一,日本仅发誓不再破坏和平,但是日本非常缺乏为实现和平采取行动的思考;第二,未能客观地看待为实现和平其军事力量可能发挥的作用。^⑧日本政府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南海问题、中国军力“走出去”、“萨德”系统部署以及朝鲜核武等议题上存在激发、塑造周边国家对华的“威胁认知”的行为,恶意抹黑并试图塑造舆论压力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这反应了日本国民在面对被中国赶超之际,国家“集体自尊”(collective self-esteem)的失落和无奈。

日本学者井上章一认为在次文化(Sub-Cultures)流行的社会,日本文化正从国际社会的主流舞台逐步边缘化已成为一种趋势。^⑨对于本国文化的担心,本质上是对日本国际地位边缘化趋势的担忧。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确实激发了部分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热情,推动了日

语学习、赴日留学、赴日消费购物热,这为日本疲软的经济提供了庞大的买方市场,强化了中日经济关联以及人文交流这一两国关系稳定的“地基”。但中日之间关系缓和需要一种机制性的政府沟通渠道与信任和高效的突发危机管控模式。

中日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方面。两国政治家长期处于“隔空喊话”的状态,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态度长期暧昧,在地区事务上表现出进攻性态势直接导致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在向“正常国家”过渡进程中在安全上依赖“美日同盟”,修改宪法第九条,制造机会塑造假想敌力图实现武力升级提升对外军事投送和事态介入能力,主观地激化地区矛盾,凸出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原本脆弱的中日民间关系紧张,更增加两国政治层面上的龃龉。

改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利益。但是中日关系面临着较大的不可预测性和非定向性,导致两国民众心态发生冲突,安倍政府利用这种不确定性增强民众对华的威胁认知导致中日关系的改善面对更多的复杂性,中日关系中“趋同”与“趋异”始终相随,中日政治关系的紧张带来两国经济利益的受损,两国民众和平交往是最大的“趋同因素”。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日本企业界更加显示出对华市场的依赖。2015年11月,日中经济协会派遣由会长宗冈正二(新日铁住金董事长)任团长的访华团出访北京,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三村明夫出任最高顾问,希望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谈,力图改善日本对华出口和投资的低迷。^⑤由此可以见,日本政府所奉行的“积极和平主义”并未得到日本社会广泛的认同,经济利益与社会面的关联依然是破局和改善两国关系的重点所在。

日本政府配合美国在亚太构建的对华“恐惧氛围”,可能会促使蛰伏的中国反日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激化,并和“历史仇恨”挂钩。日本自恃有“美日同盟”特殊关系的支持,有东南亚以及俄罗斯方向作为外交的新突破口。在东亚地区,中国的经济能量以及战略布局能力和成熟度已成为区域国家不可回避的因素,日本对一些地区进行“撒网式”援助,并不能决定性地改变局势。2017年伊始,媒体曝光日本驻英国机构收买英国智库杰克逊学会(Jackson Society)蓄意抹黑中国,表明日本政府为了丑化中国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如果没有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改观,放弃遏制中国、抹黑中国的行径,那日本驻华大使馆所进行的“文化外交”都有打折甚至失效的风险。战后的日本有着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这也正是整个日本的社会病理所在。“文化外交”如果是“和解与和平”的象征,安倍政府所构建的对华包围则是“对抗与冲突”的符号,这两种“镜像”将长时期伴随中日关系始终,日本使领馆的“文化外交”所做各种努力将难以摆脱日本国家总体战略的羁绊。^⑥

五、结 语

目前,中日关系无论是经贸领域还是在高层的政治信任方面都有待突破。中日关系面临“重构”与“突围”的选择,在东亚权力格局中,“美日同盟”因素的消极面正在压缩中日关系改善和信任建构的空间。中日之间民间力量的交往是两国政治互动的基础,中国应当辩证地看待日方领事馆“文化外交”上的努力,并从中日长远关系出发,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应这种“文化外交”。中日文化同属儒家文化圈,作为借鉴,中国驻日使馆亦可在各自领区开展对日民众的宣传提升中国的亲和力和对日本社会舆论的引导力、塑造力。在这种文化的互动中寻找中日关系回暖的契机。政治层面上的“冷”需要民间交往上的“热”,中日两国关系,在国家情感

上杂糅了“希望”与“羞辱”，“竞争”与“恐惧”，文化上的尊重和融合学习，是突破国家之间情感羈縻的有力方向。

在评析中日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中日两国政治上的分歧并未阻止双边在文化上的交流，其中日本驻华领事馆一直扮演着某种“善意”和“积极”的角色，日本政府对华“文化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日两国政治“僵持”关系，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冷静地看待日本领事馆在遍布中国领事区内进行的各种“文化外交”其本质依然是争取我国民心和认同。这种“文化外交”是长期的、有功利的考量而非是公共福利产品，不能否认其中部分也有深刻的政治韵味。在日本争取成为“正常国家”，修宪扩军、否定历史，中日关系现状与两大国国家身份并不协调。中日关系态势模糊时期，日本政府完全可能“居功自傲”以此为资本将中日关系的不正常原因推卸到中国政府头上。作为文明崛起的中国，中国政府亦应当借鉴和吸收其有利经验，积极培育日本民间对华友善力量，夯实中日关系改善的民心、民意基础。把有益的经验扩展到中国其他驻外使领馆，变革目前中国文化外交中比较单一的“孔子学院”和“HSK”考试模式，以更加多元、灵活的方式争取所在地区民众尤其是青年对华的善意和认同。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文化外交是不同国家民众与族群形成认同与善意互动的重要环节之一。近年，中国孔子学院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政府色彩浓厚，资金来源单一，被西方媒体宣传定性为意识形态宣教。可以说，日本在文化外交上有着精心的设计、精致的营销、精干的组织，精巧的基金支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我国“文化外交”应该适当地模糊官方背景，改变单一的政府资金支持的局面寻求参与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社会化。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对外展示中国的“文化美”和“国家美”，发挥比较优势塑造竞争优势生成认同优势。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文化和文明资源，我们要善于宣传、善于推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开放，展示大国自信，让中国的文化外交更好地承载和体现中国发展与安全利益。

注 释：

①Irving Settel, *A Pictorial History of Radio*, New York Press, 1960, p.146.

②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Perseus Books, 2005, pp.18-22.

③Joseph S. Nye, Jr.,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March 2008, p.107.

④Michael J. Waller, *Cultural Diplomacy,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Integrated Strategy in Strategic Influence: Public Diplomacy, Counter propaganda and Political Warfar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World Politics Press, 2009, pp.74-75.

⑤Nicholas J. Cull, “Public Diplomacy: Taxonomies and Histor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March 2008, p.33.

⑥Waller, *Cultural Diplomacy,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Integrated Strategy in Strategic Influence*, pp.82-87.

⑦櫻井孝昌是日本动画评论家、外务省动画外交咨询委员兼顾问，代表著作：《アニメ文化外交》、《世界カワイイ革命》、《日本はアニメで再興する》等。

⑧周永生：《冷战后的日本文化外交》，《日本学刊》，1998年第6期，第69-83页。

⑨姚志奇、胡文涛：《日本文化外交的观念变革与实践创新——以国际形象建构为中心》，《日本学刊》，2009年第5期，第86页。

- ⑩范勇鹏:《论文化外交》,《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第21页。
- ⑪日本外务省:<http://www.mofa.go.jp/policy/culture/exchange/index.html>.
- ⑫参见,http://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seisaku/11/03/pdf/shiryo_3.pdf.
- ⑬日本国际交流基金:<http://www.jpf.go.jp/j/about/index.html>.
- ⑭日本外务省:http://www.mofa.go.jp/policy/culture/public_diplomacy.html.
- ⑮日本驻华大使馆:http://www.cn.emb-japan.go.jp/cul_edu_1.htm.
- ⑯日本文化中心:<http://www.jpfbj.cn/about/>.
- ⑰乔尔·L·弗雷德施曼:《基金会——美国的秘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 ⑱日中交流中心简介:<http://www.chinacenter.jp/chinese/about/>.
- ⑲日本国驻华大使馆: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20130118speech.html.
- ⑳日本驻中国大使馆:http://www.cn.emb-japan.go.jp/greeting_j.htm
- ㉑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馆:http://www.chongqing.cn.emb-japan.go.jp/Japanese%20pages/top_page_j/Consulate-General/cyakunin-goaisatsu.html.
- ㉒日本外务省:<http://www.mofa.go.jp/policy/culture/exchange/index.html>
- ㉓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http://www.shanghai.cn.emb-japan.go.jp/culture/index.html#>.
- ㉔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http://www.shanghai.cn.emb-japan.go.jp/cn/culture/index.html>.
- ㉕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http://www.chongqing.cn.emb-japan.go.jp/itpr_zh/xinwen_wenhua_c.ht.
- 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http://www.shanghai.cn.emb-japan.go.jp/cn/culture/index.html#a>.
- ㉗大前研一:《日本的未来》,侯为译,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195页。
- ㉘<http://www.cn.japanpolicyforum.jp/archives/politics/pt20130306220000.html>.
- ㉙Michael Auslin, “The Bleak Future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the-bleak-future-sino-japanese-relations-5944>.
- ㉚Ryoko Nakano, “The Sino-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 and threat perception in power transition”, Pacific Review, 2015, Vol.20, No.4, pp.1-22.
- ㉛入江昭:《亚太共同体的可能性》,《外交》,第19期,2014年8月7日。
- ㉜任晓:《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页。
- ㉝<http://www.cn.japanpolicyforum.jp/archives/politics/pt20140807231440.htm>.
- ㉞Inoue Shoichi, “Special Feature: Shared Japanese Culture Manga Will Surpass Korin”, Apr 20, 2015, Japan Foreign policy Forum:<http://www.japanpolicyforum.jp/archives/culture/pt20150420235537.html>.
- ㉟《日本经济界代表团访华呼吁加强关系》,日本共同社,2016年12月1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5/11/108288.html>.
- ㊱吴光辉、肖姗姗:《想象与方法:战后日本的“中国形象”》,《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第151页。

(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广涛)

芥川龙之介《橘子》

——火车之身份的象征

朱一飞

内容提要 火车在现代文学叙述中不再是坚硬冰冷的交通工具，而是在文本叙事中起到不可低估的象征作用。在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橘子》中，通过从芥川的视角以及小说中“小姑娘”的视角进行分析，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得出结论：“火车”车厢这一密闭的空间成为一种身份的体现，不同等级的车厢空间划分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

关键词 火车 芥川龙之介 空间 身份 等级

一、《橘子》梗概

《橘子》创作于1919年，是芥川龙之介创作后期的短篇私小说。^①

在一个冬日的黄昏，自称为“我”的作者登上从横须贺出发的上行列车，在二等车厢的一个角落坐下，等待着发车，车厢里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乘客。“我”既疲劳又倦怠，心情就像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发车的笛声响起时，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的吧嗒吧嗒声，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大约十三岁左右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这是一个穷酸相的乡下姑娘，手里只拿着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和一个大包袱。与此同时，列车开动了起来。

小姑娘的不识时务让“我”感到不快，于是“我”闭上了眼睛。等“我”意识到时，那个小姑娘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当时的车厢里所装的玻璃窗四周的窗框自然是木制的，关上车窗时，玻璃窗下沿是与木质的窗框上沿契合扣上的。打开车窗则需要把车窗稍稍上提，让它脱离窗框后，才能下落打开。但不知道是不是她没有掌握窍门，车窗无论如何都无法上提。好不容易才打开车窗时，火车又进入了隧道。因为是蒸汽发动机牵引着车厢，浓黑的烟雾从车窗钻入车厢。“我”咳嗽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但是小姑娘却毫不介意地把头伸向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外面。正当“我”打算把这姑娘骂上一通，让她把窗户关好时，火车钻出了隧道，经过道岔。只见道岔的栅栏后并排站着三个小男孩，他们一边挥着手，一边不知嘴中叫喊着什么。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将揣在怀里的几个橘子朝窗口扔了出去。“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桔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

“我”和读者在这里应该都能理解这个小姑娘了吧！她应该就是为了出去赚钱，离开家乡。为了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她把用微薄的工资购买的橘子当作礼物送给了

弟弟们。

“我”心中对于小姑娘的怒气打消了。我对于卑俗的、平凡的人生所感到的不快、身心上的疲劳和倦怠都在一瞬间得以忘却。阴暗的天气,忧郁的心情,厌恶的情感,凄凉的世界,及难闻的气味,处处体现了一种寒气逼人的冷色调。小姑娘红红的脸蛋,三个弟弟红扑扑的脸蛋,五六个黄灿灿的橘子却体现了如太阳般温暖的暖色调。正是这温暖的色调掩盖了“我”内心的阴沉、忧郁、厌恶和凄凉。正是这一冷一暖、一暗一明、让“我”深深体会到在如此残酷的时代,仍有真情存在,仍有人性存在。只有最质朴、最真实的一面才是最温暖的东西。

二、芥川的视角

横须贺是位于神奈川县的一个城市,其上行列车是通往东京的火车。芥川龙之介从大正五年开始,就在横须贺的海军机关学校做教职工作,兼职教授英语。最初,芥川在镰仓寄宿,第二年搬至横须贺市内。大正八年(1919年)三月,芥川辞去这份工作后,将当时的生活体验写成了几部作品分别发表。大多数作品的主人公都自称为保吉,如今被称为是“保吉物”系列作品。《橘子》中的主人公以“我”登场,虽然没有出现固有名词,但是应该也可以被算为“保吉物”系列中的一部。

作为舞台背景的“横须贺线”现在已经全部变成承载旅客的电力火车。除此之外,情况均与小说中的描写基本一致。例如小说开篇提及的横须贺车站。虽然现在横须贺车站已经不再是终点,铁路线路已经延伸至了久里浜,但是车站的构造基本没有变化。进入验票口后,不用上下楼梯就可以直接抵达处于同一水平面的车辆站台,因此在发车前的短短片刻,乘客也是可以有机会登上火车的。

横须贺曾经是重要的海军军港,早在明治22年(1889年)——东海道线的新桥至神户之间全线开通的这一年,路线从途中的大船分支出去,经由镰仓,通往横须贺车站。明治33年(1900年)时,由大和田建树作词的《铁道唱歌》一举成名,歌中也提及从新桥来到大船后,“横须贺ゆきは乗換と/呼ばれて(去横须贺的话需要换乘)”,需要中途下车换乘。在镰仓游览古迹之后,可以乘坐火车前往横须贺,欣赏海军军舰的壮美。^②

从主干线途中特地脱离线路,另辟蹊径,可见横须贺线在当时的受重视程度。而且,从明治28年(1895年)起,大船至横须贺之间的线路也曾被称为东海道线,也许是觉得无视此线路有所不妥的缘故,之后在明治42年(1912年)开始,此条线路的称谓发生了改变,人们将新桥至神户之间的线路称为“东海道本线”,将大船至横须贺之间的线路称为“横须贺线”,该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橘子》这篇小说中故事发生的舞台就是位于在离开横须贺站,抵达下一站田浦之前的这段区间,除了当时还只是单条铁道线路之外,其他情况均和现在的状况相同。小山坡和山谷错综交汇,列车要穿过好多个隧道,隧道与隧道之间很短的间隔里,通过火车的车窗可以看到附近居民的楼房和草原、道路及交错的轨道等。车窗外的风景看上去是处于和铁路轨道一个平面中的。这样的风景曾经在日本全国各地都能轻而易举地看到。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楼房越造越多,火车速度不断提高,在道路中行驶的汽车陡然激增,现在已经很难看到《橘子》中的风景画面了。

现代的日本铁路轨道不是被架高,就是比周围的地势要低,变成了立体交错的轨道。铁

路轨道和外界隔阂的装置也从过去极为普遍的粗枝木栅栏变为了保护安全和防护噪音的钢筋混凝土围墙。对于乘坐在列车上、眺望窗外的人们而言,列车车厢成为了与日常生活完全阻隔,只是飞速奔走的移动空间。对于现代乘坐火车的人而言,如同《橘子》中的那样,车厢内的乘客与车厢外的人进行交流互动几乎不可能。横须贺与田浦之间的线路虽然从路线上是与《橘子》创作时期的路线相同,但是现在横须贺线的电车车窗无法打开,不要说是扔橘子了,连朝车窗外打个招呼这样的事情也是无法完成。

现在,所有的铁道旅行都更接近于乘坐地铁之旅或者是飞机旅行。火车车厢将乘客完全与日常生活隔离开来,将乘客封闭在看不到日常风景也听不到日常声音的密闭空间内,赋予了乘客一种密室体验。伦敦的地下铁中有一段被称为“tube(管道)线路”的部分就是在地下(有时是河底下)很深的巨型铁质管道里通行的。1890年在此线路中刚开始通行的列车车厢据说没有装车窗。铁路公司方认为,即便有车窗,外面也什么都看不见,因此车窗起不了任何作用。抵达车站后,依靠铁路职员在出入口大声报站名,即便看不到外面,也不会让乘客感到有什么不便之处。虽说如此,但是渐渐地,乘客开始有了不满情绪,纷纷开始抱怨起来,甚至将铁路车厢称为“类似于精神病院内关押残暴的精神病患者的隔离室”。于是,列车车厢才不得不开始装配车窗,造成了现代列车的模样。

由此可见,乘坐火车的乘客并不只是一味地追求速度与舒适度。如果长时间与外部日常生活隔绝,处于密闭的被监禁的空间内,就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安,有时甚至是精神错乱。透过车窗,现在自己正穿梭经过哪里,车窗外有什么样的风景,那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不仅仅是通过旁观,还能够通过声音和气味来体会。过去乘坐火车的乘客可以通过打开的车窗,听到附近居民楼里传来的婴儿哭啼声,可以闻到晚饭烤鱼的香味。夏日傍晚里那闷热的空气带给乘客的一定不是什么舒适的体验,但当时也并不恼怒。与之相比,如今的特快列车车厢内,乘客不会被外界的噪音所干扰,车厢内全部都设置有空调,车厢外也什么都看不到,然而人们却会对车厢内突然哭闹的婴幼儿,对于车厢内车站便当所散发出的烤鳗鱼气味感到厌烦。乘客们都开始默认火车车厢内的世界与日常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应该完全不同,车厢必须得是一个无菌无味无声音的空间。

芥川应该无法预想到昭和平成时代的新干线列车车厢,但是他当时乘坐的横须贺线列车的二等车厢应该接近于现代的列车车厢。也就是说,二等车车厢是与日常庶民的生活完全隔离开的另一个全新的空间。

从火车票价上来看,大正7年(1918年)7月涨价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物价上涨),横须贺线三等车厢50英里路程内的票价为每英里(约1.6公里)2钱,二等车厢票价为其1.75倍,一等车厢票价为其2.75倍。

不过,这也不能仅仅通过票价的金额差来理解和定论。横须贺线是为了日本海军特地建造的一条铁道线路。日本海军当时很多地方都在仿效英国的做法,因此火车车厢的等级划分也应该是从英国那里学来的。士官以上的军人为绅士,是绝对不能乘坐三等车厢的。反过来,士官以下的人无论再怎么有钱,也不能乘坐二等车厢,哪怕是因私旅行也不能越雷池半步。

另外,当时日本铁路虽然有一等、二等、三等车厢的区分,但是有一等车厢的列车只有东海道、山阳本线的东京——下关路段,东北、长磐线的上野——青森路段,函馆、宗谷本线的函馆——稚内路段的特急和急行列车,对于普通乘客而言,二等车厢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车厢了。

作为海军机关学院的兼职教师,虽然薪水并不高,但是从阶级层面上来看,属于与绅士、士官相同的级别,芥川内心应该自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必须得乘坐二等车厢。芥川身为从东京帝国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秀才,又是夏目漱石先生的弟子,对于英国的风俗习惯应该也有基本的了解。

即便芥川没有这些基本的等级观念知识,但是文中“我”对于平凡、无趣的下等人的厌恶,总是与之保持距离、处于旁观者位置的态度也不时在《橘子》中流露出来。对于抱有这种心态的作家而言,一定无法忍受自己乘坐三等车厢进行旅行吧!因此,乘坐在二等车厢内,透过玻璃车窗眺望远观日常生活的“我”发现有一个贫穷寒酸的小姑娘手里拿着明显就是三等车厢的车票,突然闯入二等车厢时,心中不由恼怒起来,无论是小姑娘粗俗的面庞,不整洁的服装,还是那连等级的区别都分不清的愚钝都令“我”感到生气。“我”点上烟,展开报纸,试图将自己与这个粗俗乏味的世界阻隔开来。

三、小姑娘的视角

那么,《橘子》中的小姑娘究竟是真的毫不知情,不小心走错进入二等车厢的吗?还是她是原本就知道,故意乘坐到二等车厢内的呢?

初读全文后,或许读者会得出以下的结论:

这个小姑娘应该是出生以来第一次乘坐火车吧。如果她是大正初期农村里贫穷人家的闺女,那就更应该是如此了,她应该甚至连二等车厢与三等车厢是有区别的这一点都不知道吧。因此,这个小姑娘会在车站卖票的地方只报一个目的地的地名,而车站卖票人员通过她的穿着打扮就直接断定她理应是想买三等车厢票。待她进入检票口后,由于恰巧听到列车员鸣笛示意火车就要发车启动了,这才急匆匆地慌忙跳上离自己最近的一个车门,而这碰巧是节二等车厢。虽然受到了列车员的大声谩骂,被告知了这里是二等车厢,她是不可以乘坐的,不过已经为时已晚。在小姑娘进入车厢的同时,列车已经开始启动了。

正因为没有乘坐过火车,小姑娘不知道如何打开车窗也无可厚非。在与很难打开的车窗斗争了好久之后,她才终于打开车窗,不料,火车却进入了隧道。身旁的乘客因此而不停地咳嗽,并向自己投去了厌恶的目光。但是,小姑娘却一心因为列车就快要经过自己家附近的铁道口而焦急不已。火车一出隧道口,果然看到了弟弟们的身影。于是,小姑娘便按照原计划进行——把橘子向他们扔去。这样就不留任何遗憾了。

以上的理解看似顺理成章,但总让人觉得有些牵强,因为偶然因素实在是太多了。例如:小姑娘过了检票口后,恰巧碰上火车即将发车。离小姑娘最近的车厢恰巧是节二等车厢。好不容易将车窗打开了,又恰巧在抵达目标铁道口前碰上了隧道。

如果没有这些连环扣的偶然因素,那将会是怎么样呢。小姑娘过了检票口,在火车发车前徘徊寻找时,列车员或者是其他工作人员应该会为她指路,并把她带至三等车厢吧。三等车厢里自然会有很多乘客,那就至少不会出现只有一位乘客乘坐的情况了。在三等车厢这样的空间内,如果想要开扇窗的话,肯定身边会有人提醒劝告说,已经快要进入隧道了,不能开窗,或者直接用蛮力制止。在为了开不开窗而争论不休的时候,火车就飞快驶过了弟弟们前来送行的铁道口,特地为他们买来的橘子就白白浪费了。

这样的情节其实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但偏偏没有这样,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小姑

娘事先早就预演了所有的场景,她是根据自己的预想而付诸于行动的。

当时的火车车厢是根据颜色来表明乘客车厢的:二等是蓝色,三等是红色,车窗下明确涂有不同的色带。即便是从来没有乘坐过火车的人,在附近的铁道口肯定也会经常看到过火车驶过,对于二等车厢和三等车厢的颜色区分应该是知晓的,包括二等车厢乘客较少,三等车厢乘客较多这一点应该也是知道的。

小姑娘为何会考虑从二等车厢向外扔橘子呢,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二等车厢内乘客稀少,开窗受阻挠的可能性较小。其二,是因为希望弟弟们能够看到她是乘坐二等车厢内,离开老家,迈向新的人生的,希望在弟弟们心中留下自己过上好日子的印象,让他们能够安心。橘子虽然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但是对于小姑娘而言,已经是竭尽全力,奢侈一把了,一切都是在刻意演戏给弟弟们看,让他们觉得自己过得很好。

为了确定自己能顺利进入二等车厢,小姑娘应该事先精准确认过二等车厢的停靠位置。为了不让列车员和车站工作人员阻挠自己闯入二等车厢,小姑娘还事先了解了火车发车的具体时刻,精确至分秒,然后计算了自己应该在发车前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必须在那个时间点通过验票口。粗看是这样一个卑微、愚钝的小姑娘,但其实应该是一个高智商的“作案犯”。当然,打开车窗的时机也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如果过早打开车窗的话,那么也许会被其他乘客又重新关上,如果过晚打开车窗的话,那么就要错过铁道口了。由此可以推测,这个小姑娘应该是在前一天乘坐火车至田浦站,事先预演过第二天会发生的场景。

然而,小姑娘的算计也就到此为止了,后面发生了自己也没有料想到的偶然因素。

当时乘坐二等车厢内唯一的一位手握正规二等车票的乘客、那位抽着烟在阅读报纸的、心情阴郁的中年男子竟然是位作家,^③ 自己的行动刺激了这位作家的创作欲望,这真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自己的行动被记载在《新潮》杂志上,记载在文学全集中,日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这一切的一切她应该都没有想到,实际上也应该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度过了一生吧。

芥川从小姑娘的行动中感受到了怎样的冲击呢? 鲜艳、明亮的橙色骤然跳跃入原本昏暗萧条的风景里,这样的色彩对比冲击就像印象派的画作一样。原本芥川认为的二等车厢是一个完全与日常柴米油盐的生活阻隔开来的密闭空间,突然,毫无章法地、毫无逻辑地,甚至是非常暴力地强行被外部粗俗的、无聊的生活打破。看来,二等车厢也不如自己所认为的那样,算不上是一个安全宁静的世外桃源。

如果这是英国铁路的话,铁道线路本身就和生活完全隔绝开来,几乎不存在什么铁道口,铁道线路也抑或是被高高架起,抑或是从地下穿过,完全是与外部的风景隔离开来的。铁道线路与外部生活之间的屏障是高大、坚硬的围墙,也就是说,建造格局模式就像现代日本的新干线或者是高速公路一样。

但是,大正初期的日本铁道虽然模仿英国铁路的做法,根据车厢等级的不同,来区分社会的各个阶层,但是一旦打开车窗,外部的风景、声音、气味都会直接闯入车厢,让人不得不接受。列车驶过贫民区域的房屋时,孩子们的哭闹声、用餐时烤鱼的烟味和气味,都是平等地侵入车厢,不会因为二等车厢还是三等车厢而区别对待,有所不同。这个十三岁左右的小姑娘残酷地将当时日本文明开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提升这一面呈现在了芥川面前。

再进一步分析,进入大正年代后,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不仅仅是政治? 政界? 政治家活

动? 还有艺术的世界。虽然芥川对于社会主义好像并没有产生共鸣,也并没有表示赞同,但是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应该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因为芥川在选取了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理论为题作为自己在东京帝国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论文。莫里斯是出生于英国伦敦富商家庭的孩子,他为了民众,投身入艺术革新运动,撰写了乌托邦文学理论,创建了民间艺术工场,还加入了运动游行。在伦敦东区发生警察与社会主义者的冲突事件时,莫里斯因为殴打了警官,而被带到治安审判官前。当在被审讯问道“你究竟算什么东西”时,莫里斯答道:“我既是艺术家又是文人。整个欧洲都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不光是英国,日本当时也有一位名叫堺利彦的文人,他将狄更斯和马克吐温文学介绍到了日本,“幽默具有社会改革的力量,必须具备幽默的能力。”是这位文人的名句。理应熟知当时时代氛围的芥川看到贫穷寒酸的小姑娘突然闯入二等车厢,自说自话地打开车窗朝着车厢外的孩子们扔去橘子的场景时,脑海中一瞬间应该掠过了无产阶级蜂拥而上的噩梦场景吧。

四、权力等级的车厢社会

火车车厢是一个流动的公共空间,在固定的时间内,车厢里的乘客禁止上下车,所有人都处在这个半敞的空间里,受到车厢制度的管理。人们被区隔在一个个半封闭的空间里,不仅打破了传统男女之间的关系与距离,形成新的人际交流与互动,而且作为一个半敞的公共场域,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同福柯笔下的监狱、学校、工厂等管理机构具有某种内在的同构性。虽然福柯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铁路,但他曾经谈到“铁路是一个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新面相。”^④

当时日本虽然并没有使用“等级”来区分各种交通工具的不同,如人力车、马车、火车,但乘车费用却是随着其舒适度逐渐增加。所以,作为现代文明表征的火车,本身就带有强势高贵的标签。火车车厢带给人的体验是一种具有等级关系的社会公共空间,车厢社会成为一个新出现的人际交往空间。亨利·列斐伏尔将社会性维度引入空间,指出空间形象背后隐含着不同的意义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图景,即存在一种“空间的意识形态”。^⑤ 火车车厢作为一种社会因素,反映社会等级与权力的界限,整个行走的火车内部小车厢可以说正是外部等级的社会缩影。

一等、二等、三等车厢是由隔墙被分隔独立,原本这种分隔已让人熟视无睹。然而这种习以为常的阶级区分却被一位连二等、三等车厢都无法区别的姑娘所打破,让“我”不得不看到这些原本不应该看到的阶级差别,引起了“我”的不愉快。火车的作用不再只是穿过山洞,而是通过车厢,划分了阶级。只要乘坐在一等、二等车厢内,是没有必要看到、也没有机会看到三等车厢的乘客的,也就可以避免所谓的“不愉快”。

“我”的“不愉快”自然是因为二等、三等车厢的阶级性差异所引起的,乍一看应该与精神分析无关,但是,社会阶级与精神分析模型的结合应该也有所关联。弗洛伊德在描述自己内心心理装置的结构时,做过如下的比喻:“潜意识的系统可比作一个大前房,在这个前房内,各种精神兴奋就像许多个体,互相拥挤在一起。和前房相毗连的,有一较小的房间,像一个接待室,意识就停留于此。但是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口,有一个人站着,负守门之责,对于各种精神兴奋加以考查,检验,对于那些他不赞同的兴奋,就不许他们进入接待室。”^⑥ “但是就是被允许入门的那些兴奋也不一定成为意识的,只是在能够引起意识的注意时,才可成为意

识。因此,这第2个房间可称为前意识的系统。”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是人的心理状态的最高形式,它控制无意识,使无意识留在最底层。^⑦ 弗洛伊德强调人的心理过程主要是无意识,而意识的过程则是由无意识的过程衍生的,但因为它的意识层又包括前意识层,所以实际上他把人格分为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个层次。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所谓潜意识的大前房无疑就是三等车厢,称为前意识系统的第2个房间就是二等车厢。由此可见,在潜意识的大前房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是无法从存在于另一间房间的意识中窥探到的,这也就和“我”内心认为三等车厢的乘客原则上是不允许出现在一等、二等车厢内的“内部规则”相重合。一等、二等、三等车厢间的隔阂就相当于弗洛伊德所说的两间房间之间的门口有一个人负责守门一样。火车的三层分层构造也可以理解为是意识、前意识、无意识的构造。又或者可以将一等、二等车厢与三等车厢的关系归结为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压抑与抵抗”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芥川龙之介《橘子》这篇短篇小说中,“火车”车厢这一密闭的空间是一种身份的体现,不同等级的车厢空间划分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火车这一空间可以说是身份的象征。

注 释:

①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3)』、ちくま文庫、1986年12月、2-23頁。

②『鉄道唱歌』摘要:汽車より逗子をながめつつ/はや横須賀に着きにけり/見よやドックに集まりし/わが軍艦の壮大を。

③芥川出生于明治25年(1892年),在横须贺工作应该是25岁左右。

④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⑤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⑥フロイト「精神分析入門」『フロイト著作集 1』、懸田克躬、高橋義孝訳、1971年9月、人文書院、121-126頁。

⑦同上。

(朱一飞:复旦大学日语系博士、外事处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静波)

中心大事记

2018 年上半年

- 1 月 13 日 胡令远教授出席上海市日本学会新年会并作主题报告。
- 1 月 19 日 高兰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2017 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研究专项“四种海权发展模式互动中的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海洋政策及其中国对策研究”(批准号:17VHQ007)开题报告会。
- 3 月 6 日 日本京都产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东乡和彦教授来访。
- 3 月 12 日 日本山口大学植村高久教授、葛崎伟教授来访。
- 3 月 15 日 徐静波教授访问浙江工商大学,并做“日汉·汉日翻译之我见”、“东亚文化圈的实像与虚像”的讲座。
- 3 月 19 日 日本创价大学汪鸿祥教授、创价大学北京办事处上野理惠女士来访。
- 3 月 21 日 日本桥报社段跃中社长来访。
- 3 月 24-25 日 第十二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博士生日本研究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贺平副主任、王广涛副教授带领本校三位博士生代表参加了本届论坛。
- 3 月 27 日 胡令远教授陪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席王伟光访问日本共产党总部并于与该党领袖不破哲三座谈;在中国驻日使馆与原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座谈;拜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就 6 月在上海由中华日本学会与复旦大学共同举办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40 周年邀请福田先生出席事宜进行商谈。
- 3 月 27 日 徐静波教授访问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并分别做题为“东亚文化圈的实像与虚像”的讲座。
- 3 月 30 日 徐静波教授访问华侨大学,并做题为“东亚文化圈的实像与虚像”的讲座。
- 4 月 8 日 徐静波教授访问山东大学,并做题为“东亚文化圈的实像与虚像”的讲座。
- 4 月 10 日 中心举办复旦·三井物产冠名讲座“川端康成的文学世界”,北京大学李强教授主讲。
- 4 月 11 日 国际问题研究院在日本研究中心举办《中日关系 2017——战略对峙中的转机》报告书发布会。报告书总负责人胡令远教授主持,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日本学者大田英昭做点评。胡令远、臧志军、高兰、冯玮、包霞琴、王广涛等课题组成员介绍了报告书主要观点。新华社、澎湃新闻、上海社科报等媒体出席发

- 布会。
- 4月18日 胡令远教授、高兰教授出席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第十届“名家论坛”，胡令远做基调报告、高兰做主题发言。
- 4月22日 中心举办复旦·三井物产冠名讲座“中日之桥——为了中日文化交流”，全国首播日语电视节目《中日之桥》创办人、上海欧美同学会留日分会常务副会长吴四海先生主讲。
- 5月12日 徐静波教授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做题为“20世纪20年代中日文人在上海的邂逅——以村松梢风和谷崎润一郎为中心”的讲座。
- 5月22日 徐静波教授访问沈阳建筑大学，并做题为“东西方交流中的日本饮食文化”的讲座。
- 5月26日 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长河村建夫先生莅临上海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并到访日本研究中心，与中心和校内日本研究学者座谈。河村建夫先生是日本著名政治家，曾担任文部科学大臣、内阁官房长官等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党内要职。
- 5月27日 贺平副教授参与接见日本防卫研究所片原荣一教授。
- 5月28日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田村晓彦教授、亚细亚大学范云涛教授来访。
- 5月29日 日本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校庆报告会，主题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新机遇与新挑战”。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主持报告会，高兰、贺平代表日本研究中心作发言。
- 5月27日 胡令远教授、高兰教授、王广涛副教授参加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2018年中日关系研讨会”，并分别做发言。
- 5月31日 中心举办复旦·三井物产冠名讲座“国际视野——中日书画印三人谈”，华东师范大学张索教授、旅日书画艺术家王俊、旅美书画艺术家王鸣文主讲。
- 6月7日 徐静波教授访问浙江财经大学，并做题为“佛寺与神社：日本人的宗教世界”的讲座。
- 6月9日 胡令远教授出席辽宁大学校庆高端讲座，作“新时代中日关系顶层设计”演讲，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代表、辽大师生120人出席。
- 6月9日 贺平副教授参加复旦大学、庆应大学、延世大学访问交流活动。
- 6月23日 中华日本学会2018年年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本届年会由日本研究中心承办。胡令远副会长在年会上做主旨发言，高兰副秘书长做中心年度报告。
- 6月23日 日本原首相福田康夫一行访问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会见了福田康夫一行。当天下午，福田康夫一行出席了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外交与人生——政治家、外交家、学者多人谈”活动。活动结束后，福田康夫访问了日本研究中心，

并题词留念。

6月24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华日本学会主办，中国社科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承办的“推动构筑新型国家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日本原首相福田康夫出席会议并在特别纪念演讲中发表了对亚洲未来的思考。中国社科院学部主席团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王伟光，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日大使徐敦信也在会上发表特别纪念演讲。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刘玉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片山和之，前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日本兵库县立大学理事长、日本防卫大学前校长五百旗头真在开幕式上致辞。

（王广涛）